

www.duxiu.com
下 家

【作 者】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共黄县县委宣传部《下丁家》编写组编

【形态项】 166 ; 19cm

【出版项】 山东人民出版社 , 1977

【ISBN号】 1252

【原书定价】 0.36

【主题词】村史 报告文学(地点:中国 年代:当代)

【参考文献格式】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共黄县县委宣传部《下丁家》编写组编. 下丁家.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77.

毛主席语录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农业学大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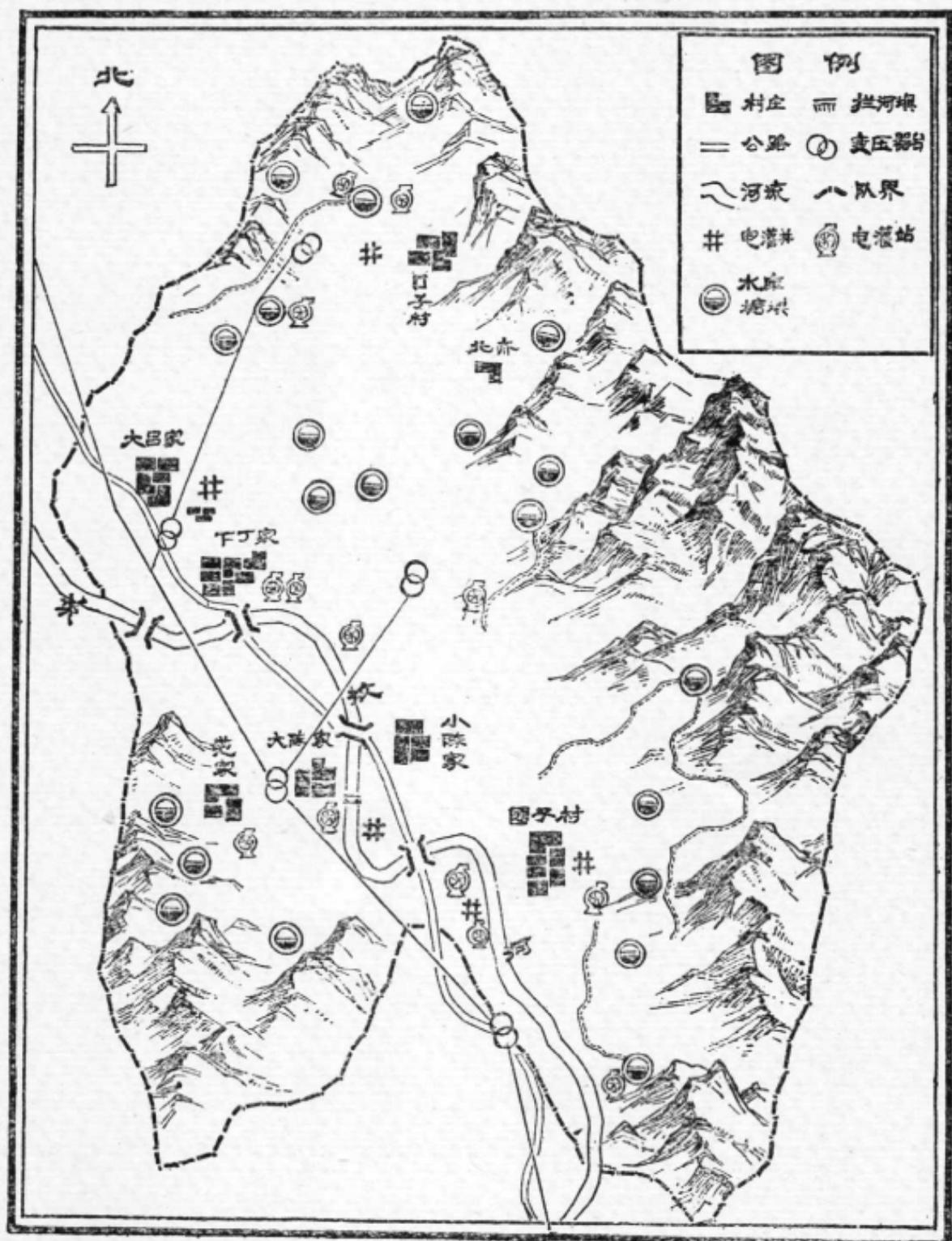
我相信，会议之后，在全国广大农村，深入揭批“四人帮”，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必将迅猛兴起一个新高潮。

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担当起来，进行到底。

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下丁家大队示意图



出版说明

黄县下丁家公社下丁家大队，是我省“**农业学大寨**”的一个先进单位。为了推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我们特请中共黄县县委宣传部和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革命师生编写了《下丁家》一书。

下丁家大队地处山区，自然条件很差。解放以前，劳动人民受尽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压榨和穷山恶水的折磨。解放以后，这里的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各级党委和大队党总支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持久地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开展了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以刘少奇、林彪和王、张、江、姚“四人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一场又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使人的精神面貌和自然面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不断深入，把一个贫困落后的穷山沟建设成了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今的下丁家大队，看人们精神焕发，看大地水秀山青，到处莺歌燕舞，气象万千。

下丁家大队，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无产阶

级对资产阶级专政，坚持走“**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上前进的。要前进要革命就要斗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他们不仅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斗，同大自然斗，更重要的是同修正主义斗，同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斗。下丁家人民的斗争历史，充分说明在农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存在。一个生产大队，不单是一个生产的单位，而是一个全面落实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多快好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坚强阵地。它还告诉我们，共产党内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只有抓住了同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进行斗争这个重点，才能粉碎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发展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下丁家》一书中的人物、事件，都是真人真事。内容丰富，事迹感人，语言朴实通俗，适合工农兵群众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和知识青年阅读。

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中共烟台地委、黄县县委、下丁家党总支和曲阜师范学院党委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一九七七年三月

目 录

泳汶河畔话今昔.....	(1)
金光大道.....	(11)
顶风战浪.....	(36)
心红胆壮.....	(63)
山村风雷.....	(90)
红旗在前.....	(114)
战斗新篇.....	(133)
勇攀高峰.....	(151)

泳汶河畔话今昔

在胶东半岛层峦迭嶂的山区，飘扬着一面“农业学大寨”的红旗——黄县下丁家公社下丁家大队。

下丁家大队包括八个自然村，三千一百余口人。在方圆三十华里的范围内，耸立着凤凰山等三十六座山头；山谷里，泳汶河从东南向西北，流贯全境。全大队的八个村中，口子、范家、北夼座落在离泳汶河几里远的深山里，大吕家、下丁家、小陈家、大陈家和圈子村，倚山枕河，排列在泳汶河的两岸。

你如果第一次来到下丁家，下了汽车，放眼四望，眼前的景象一定会使你惊喜不已。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斗争的战斗洗礼，到处都在胜利前进的下丁家大队，处处莺歌燕舞，遍地热气腾腾！汽车停车站就在泳汶河边，河的南岸，下丁家接待站的大楼依山傍水，明亮的窗子反射出灿烂的阳光。河的北岸，半山腰里，大队自力更生建造起来的学校大楼高耸在青松翠柏之中，山脚下下丁家村一座座白石青瓦的新房子，栉比鳞次。宽敞的公路上，一辆辆运石运肥的拖拉机，不时地来往奔驰，看着那虎势彪彪的机手，听着那轧轧作响的机声，你仿佛看到：下丁家人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勇往直前的坚强意志和百折不挠的决心！离开

眼前的景物，移目四面耸峙的群山，则是另一番景象：烟柱腾起，炮声隆隆，那是下丁家人民正在开山炸石，修造山上公路和山间平原。在下丁家村东南、大陈家村北的一块人造小平原上，挺立着一根根红色的喷灌竖管，那转动自如的喷头，吐出条条银丝，织成万道雨帘……。看着这一切，你一定会情不自禁地赞叹：下丁家，这是一个多么火红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山村！

置身于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新山村，你怎能看到，解放以前，这里却是另一种凄惨景象……

解放前的下丁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穷山沟，苦山沟。那时，抬头看山，山是和尚头；低头看地，地是乱石窝。一些土质较好的山根、河滩地，全部霸占在地主、富农的手里；贫下中农仅有的一点土地，瓢一块碗一块，斜挂在山坡上，一个个山头，象是披着补丁连补丁的破衣烂衫。地里夹沙带石，怕涝又怕旱，三天无雨苗发黄，一场大雨土冲光，贫下中农别说吃饭，逢到旱天，就是喝口水也是大难事啊！解放前范家村二百口人，村里只有一眼小井，稍微一旱，井底朝天，人们就得到几里外的南山根去挑泉水。那泉水几乎是一滴一滴地流，一天一宿只能接五六担。为了吃水，人们要蹲在泉边等，担水磨破肩，真是滴水贵如油。当年有一首反映这艰难生活的歌谣说：有女不嫁范家村，吃水挑到南山根，去时穿着绣花鞋，回来露出脚后跟。

在那豺狼当道、虎豹横行的旧社会，贫下中农不但受穷山恶水的折磨，更凄惨的是还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八个自然村

中，百分之三十的劳力给地主扛活，百分之六十的劳力靠卖短工糊口。贫下中农在地主富农的土地上磨破肩膀累断筋，到头来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也混不上，八个村四百五十户人家中，常年拖着要饭棍的就有五十多户。范家村有一个贫农，一落生父母给他起了个吉祥的名字叫“永存”。可在那时节，天高容不得穷人伸伸腰，地广容不得穷人站站脚，哪里有贫下中农的“永存”之地！范永存整年累死累活给地主扛活，还是养活不了家口，老婆给地主当佣人，惨死在地主家。撇下的三个孩子，大儿子在地主家当“小人”，因为摔坏了三个碟子，被地主活活逼死。二儿子当了和尚，闺女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范永存有一次在地主门口吆牛的声音大了些，狗地主怕惊了他那刚生下的小崽子，把范永存按倒就打了一顿。范永存怒火胸中烧，铁拳紧紧攥，恨不得砸烂这吃人的旧世道！夜里，他跑到地主的院子里，放了一把火。可是，在那万恶的旧社会，一把火只能烧毁魔鬼的宫殿，又怎能烧毁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第二天，地主就勾结官府，把范永存抓进了黑牢。后来，永存虽从牢里出来了，但看到一家人死的死，亡的亡，自己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怀着满腔悲愤，在村头一棵大树上上了吊。“永存”，“永存”！好端端的一家人，一个也没有存下来。这样悲惨的遭遇又何止范永存一家？仅人们记得的，解放前七个村被地主逼得流落外乡的就有九十二户，逼死的就有五十二人！滔滔泳汶河，流不尽穷人的血和泪；巍巍凤凰山，载不动穷人的仇和恨啊！

一九三八年，胶东燃起了革命的烈火，山沟里来了八路

军，下丁家这一带山区，成了抗日根据地。从此，党的阳光照心头，穷苦人走上了革命的路。现在的党总支书记王永幸，就在那时扛枪上战场，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现在的党总支副书记张书勤，也是那时入的党，当了地下交通员。万众一心跟党走，打日本，除汉奸，搞土改，打老蒋，直闹到全国大解放。

全国解放后，贫下中农虽然在政治上翻了身，但他们还没有挣脱私有制的枷锁，还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时，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及时为五亿农民指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下丁家的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一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铁柱子”王永幸和下丁家大队党总支的带领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把一家一户风雨飘摇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了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大寨红旗在下丁家人民的前头迎风招展，他们前进的方向更加明确了。他们深深懂得：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人民的命根子。因此，他们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斗争。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努力开展斗争，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于社会主义。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同刘少奇、林彪、同无恶不作的“四人帮”这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斗争，斗得人变、地变、产量变，下丁家旧貌变新颜！

在二十多年斗争的烈火中，下丁家大队党总支和各村党支部，坚持在斗争中建设党，发展党。在各级领导班子中，有一些老同志解放前就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同拿枪的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他们继续革命不停步，又带领贫下中农同不拿枪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下丁家大队党总支和各村党支部中，还有一批青年干部。人民公社成立时，他们还是些小娃娃；文化大革命前，他们只是一帮跟在大人后头抢活干的“小石匠”、“小炮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迅速成长起来了。他们同老干部一道，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党的基本路线，认识越来越明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越来越自觉，成了领导班子中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

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斗争，下丁家贫下中农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解放后，他们由旧社会的奴隶变成了新世界的主人。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在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二十多年的斗争中，他们斗得阶级敌人丢魂落魄，斗得走资派闻风丧胆。他们自己也在斗争中逐步斩断了私有制的锁链，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桎梏，一心扑在革命上。有多少人被人们称为“活愚公”、“老铁人”、“铁肩膀”、“铁姑娘”！一批亘古未有、意气风发的社会主义新农民，为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正战斗在凤凰山下，泳汶河畔。

在斗争中前进的下丁家大队，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鲜花竞相开放。文化大革命以后，贫下中农的优秀子弟肩负着阶级的重托，走进了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在村里，贫下中农管理了小学、中学；革命接班人茁壮成长。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回乡当了新型农民，一支贫下中农理论队伍，活跃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大队合作医疗越办越好，赤脚医生全心全意地为贫下中农驱赶着瘟神，……**战地黄花分外香**。这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亿万群众在清除资本主义旧基地的斗争中生气勃勃的伟大创造，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崭新成果。这些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使战斗的下丁家更加生机盎然！

革命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二十多年来，下丁家大队党总支和贫下中农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他们在同党内走资派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作斗争的同时，又向穷山恶水开战。他们在农田基本建设上投入了一百五十多万个工日，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改造成了美丽壮观的画山绣水。

如今，你如果沿着大吕家村到口子村的山路北行，走到大吕家村北，就会看到两列青山中间，横卧着一道气势雄伟的大坝，将山沟拦腰截断，这就是下丁家大队建造的第一座水库——大吕家水库。从这里往北，地势越来越高，到了口子村，又一道大坝连接着两边的青山，这是口子水库。正当你惊叹贫下中农的创造时，站在口子水库大坝上北望，只看见在两列青山相接的山顶的下边，又一道大坝，水库竟然修到了高山上！这三座水库，一个更比一个高，社员称为“三层楼”。水库里，波光粼粼，山影辉映，宛如青山怀抱着的三块

明镜。清澈的流水沿着石砌的渠道，从水库分层流向山上、山腰、山下的梯田和果园，恰似条条银龙绕山间。这三层楼水库，只是下丁家许多水利工程中的一项。二十多年来，下丁家大队贫下中农大干苦干，先后修建水库十九个，拦河坝四条，扬水站十几个，打井一百五十三眼，开挖环山渠道十条，总长三十多华里。近几年来，灌溉实现了机械化和电气化，遇上天旱，低处自流，高处扬水，的确是天旱地不旱，旱涝保丰收。社员们豪迈地说：“一双手，两个肩，一把镢头一张锨，库坝井塘自流渠，牵着龙王上高山。毛泽东思想来指引，敢教日月换新天。”

站在下丁家任何一座山下抬头上望，你就会看到从山根到山腰，一道道石墙把山围了一匝又一匝，好象青山束上了一条条玉带。等你爬上山腰，回首俯视，那一道道石墙又忽然不见了，展现在你眼前的，是一层层禾苗翠绿的水平梯田，好象在山上铺开了一层层地毯。二十年来，下丁家贫下中农在治水的同时，又大规模地进行整地、造地，把过去“阴阳膀，大斜坡，土层薄，石头多”的一千九百亩山耩薄地，改造成了“两平、石堰，能排、能灌”的高标准梯田。过去最大的地块不超过二亩，最小的只能种几墩花生，这些年来，已逐步将小块并成了大块。近几年来，更是越干越想干，越干越敢干，越干越会干，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治理，取直修路，路旁造田，一方十几亩，几十亩，大的一块竟有五十多亩，都成了能跑“铁牛”的“小平原”。

山根梯田上边，是果树林带。二十年来，下丁家大队在

山腰不适宜种粮的地方，种植了四万五千棵果树。春天，山上的梨花、桃花竞相开放，红白辉映，蔚若云霞。到了果子成熟的秋天，梨树上结出了千万只金葫芦，山楂树缀满了密密麻麻的红宝石，柿树枝头挑着无数的红灯笼，更加令人心驰神往！

果园上边，直到山顶，是松柏林带。下丁家治水是三层楼布局，治山，也是“三层楼”：山根粮田，山腰果园，山顶松林建成片。下丁家三十六座山头中，凤凰山最高，因此人们往往把下丁家的山统称凤凰山。过去，穷山秃岭，满目荒凉，蛇虫不下蛋，兔子不拉屎，哪里落过金凤凰！如今，你登上山顶，就会看到：山上松翠柏青；山腰，花团锦簇；山下，绿波滚滚；一个个山头都好象真的变成了凤凰，一下子抖开了它那五光十色的羽毛！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教导，下丁家大队在对山、水、田、林、路进行综合治理的同时，大步迈向机械化。文化大革命以前，下丁家大队动力机械只有一百多马力，现在增加到一千七百马力，其中包括拖拉机十一台，汽车两辆，动力机四十台，电动机六十多台。并且自力更生架起了二十五华里高压电线，基本上实现了电力排灌。大队还办了烤干厂，开了石英矿。世世代代的山里人，手里拉过要饭棍，握过锄杆、锨柄、放羊鞭，做梦也没想到过会开机器，驾汽车！老贫农们看到自己的后代开起了汽车、拖拉机，个个笑在脸上乐在心里，齐声赞颂社会主义好！文化大革命好！

由于治了水，整了地，大办农业机械化，下丁家大队粮食、水果的产量逐年提高，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粮食产量一九五六年超“纲要”，一九五九年过“长江”，一九七〇年跨过千斤关，一九七六年亩产达到一千九百多斤，比解放初期提高了十倍！一九五六年，水果产量每年只有九万斤，现在达到了三百多万斤，增加了三十多倍！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啊！下丁家贫下中农深深懂得：今昔巨变靠的是党的领导，靠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每年丰收后，他们总是把最好的粮食、水果交给国家。仅从公社化以后，到一九七六年，他们就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七百万斤，花生米一百万斤，水果二千七百多万斤，有力地支援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随着生产的发展，集体经济日益强大，社员生活逐步提高。昔日白手起家的下丁家，现在公共积累达到了一百二十万元，集体储备粮七十万斤；解放前，贫下中农住的是破草房，吃的是糠和菜。如今，你走进每一家，几乎都能看到他们住的是新瓦房，不少社员家里有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座钟，百分之七、八十的户银行有存款，社员的年收入平均达到了一百五十元。过去贫下中农很少识字的，现在大队办了小学、中学，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掌握了文权，贫下中农的子弟都得到了上学读书的机会。每当提起这巨大的变化，贫下中农总是眼含热泪望北京，无限感激伟大领袖毛主席！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

入夜，村村队队，电灯齐明，泳汶河谷里，仿佛撒下了

繁星万点。这时，你走进每一个村子，都会看到在政治夜校里，明亮的电灯下，贫下中农正在认真地学习着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看着眼前斗志昂扬的人们，联想白天看到、听到的一切，你一定会深深感到：下丁家大队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真是一派大好啊！你如果和贫下中农攀谈起泳汶河畔的今昔巨变，他们都会告诉你：这大好形势是在斗争的风雨中迎来的，你的眼前，就会展现出一部气壮山河的下丁家人民的战斗历史。

金光大道

一

一九五二年，下丁家的贫下中农迎来了土地改革以后的第五个春天。

五年前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给下丁家贫下中农带来多大的欢乐和多么美好的希望啊！人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斗倒了地主，分得了田地，开天辟地头一回成了自己家园的主人。世世代代给地主当长工、打短工的老贫农，第一次在党和毛主席分给自己的土地上播种时，手里攥着土，眼里热泪流。人们象侍候孩子一样侍候土地，把地里的石头拣出去，把冲塌的地堰垒起来，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地辛勤劳动着，希望能够种出好庄稼，过上好日子，让时时刻刻关怀着贫下中农的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

如今，五年过去了。在看起来和和平平的日子里，又出现了新的两极分化。

一天，圈子村的一个老贫农来到了村干部王永幸的家里。老人坐到炕沿上，两手抱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王永幸吃惊地问：“大叔，你又要卖地了吗？！”

老人抬起头，脸上挂着两行泪，又难过又羞愧地说：“永幸，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共产党啊！”

这老人的情况王永幸是十分熟悉的。解放前老人全家六口人，只有三分山坡薄地，一家人成年拖着要饭棍东乞西讨。大闺女十几岁就给人家当童养媳，大儿子十三岁时上山拾草摔断了胳膊。土改时，老人分了六亩地。可是老人六十多岁了，儿子摔成了残疾，又没有牲口，怎么能把地种好呢？一家人虽然每天顶着星星出，戴着月亮归，打下的粮食仍然不够吃，土改后第二年就卖了一亩半地。一九四九年，一场台风刮倒了邻居的一棵树，把老人的房子砸塌了。为了修房，又卖了一亩半地。如今，家里有了病人，又要卖地了。地，这是庄稼人的命根子，是毛主席、共产党给贫下中农的。卖地怎能不使老人心痛心愧呢！

听了老人的话，看着老人痛苦的表情，王永幸思绪万千，心潮难平。这个贫农的儿子，八路军的战士，在战争中英勇杀敌，曾三次立功，身负重伤。一九五〇年，怀着建设新农村的宏伟志愿回到家乡。两年来，王永幸看到一些贫下中农因为底子薄，生产条件差，或遇天灾人祸，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土地，而一些富裕中农乘机买地、放债、雇工，心里十分焦急。这样下去，一些贫下中农不又得重新当长工吗？农村中不又要出现一些新的地主、富农，压迫、剥削贫下中农吗？我们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经过几十年英勇奋斗，才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如果听凭两极分化的现象发展下去，新中国不是又要变成旧中国了吗？王永幸回乡前在荣军学校里就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一次又一次翻开那时的笔记本，重温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毛主席在《组织起来》一文中说：“在农民群众方

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王永幸从下丁家的现实中深深体会到，只有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组织起来”，才是贫下中农的唯一出路！可是，令人气愤的是，上边却有人提倡发展富农经济，鼓励农民发家致富。他不明白：党里边为什么竟有人同毛主席唱反调呢？前几天，收到了党中央发出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指出“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王永幸读着读着，激动地流下了热泪。现在，看着眼前这个两次卖地的老贫农，王永幸更感到党中央、毛主席是全国人民英明伟大的领路人！

王永幸转身走进屋里，拿出党中央的文件，高兴地对老人说：“大叔，你过去两次卖地，那是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如今，党中央作出了决议，给咱指出了一条金光大道，咱村马上就要办互助组，以后还要办合作社。咱贫下中农就再也不用卖地了！”

老人猛地抬起头，目光灼灼地望着王永幸。他虽然不识字，仍然从王永幸手里接过党中央的文件，横看看，竖看看，热泪扑嗒扑嗒落到文件上，这已不再是难过的泪，而是激动的泪，是和一九四七年从政府工作人员手里接过土地证时一样的泪！老人呐呐地说：“毛主席、党中央的话，真是说到咱贫下中农的心坎里去了！永幸，你就领着咱贫下中农沿着毛主席指出的金光大道往前奔吧！”

送走了老人，王永幸又读了一遍党中央的文件。为了同贫下中农一起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为了巩固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他，一个共产党员，下定决心，要沿着毛主席指出的金光大道走到底！

从此，王永幸背着粪筐，走东家，串西家，见人就说，逢人就讲，热情宣传组织起来的好处。他还打了个比方说：“小农经济象狗尾巴上的露珠，一甩就掉；只有组织起来，才象大树一样，风吹雨打不动摇。”他的话，说得贫下中农个个心里热乎乎的，大家啧啧不休地赞扬说：“永幸是带领咱贫下中农走幸福路的好苗子！”

不久，区委书记到下丁家乡帮助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在区委领导下，下丁家乡的贫下中农批判了“发家致富”的反动口号。他们说：鼓吹“发家致富”，只能是发一家，穷万家，只能是地、富和一部分富裕中农发起来，贫下中农重新做牛马。我们受够了剥削的苦，决不走那条道！当山花开放时，圈子村第一个互助组成立起来了。接着，大吕家村的张书勤、张秉义和口子村、下丁家村的贫下中农，也都在自己村里办起了互助组。下丁家乡的一个个互助组就象那烂漫的山花，把一九五二年的春天打扮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

王永幸的互助组一开始只有九户，但九户人，一条心，大家劲往集体上使，心往集体上操，决心办好全村第一个互助组，显示出互助合作的优越性，为贫下中农争气，为毛主席争光！

春耕时，没有牲口，他们就用镢刨。工具不够，就黑白

轮着干。

春种时，种子不够，他们就发扬互助合作的精神，你凑一碗高粱，我凑一瓢玉米，省吃俭用，及时地种上了春庄稼。

组长王永幸更是把一颗心交给了这个九户的集体。他从部队复员时，上级发给他一部分复员费，互助组刚建立，他就买了一头毛驴，以后又换成一头小马驹，交给集体使用。

抗旱时，互助组打井遇到了大石头，王永幸又用自己的复员费买来了炸药，炸掉了石头，打成了水井，战胜了旱灾。

互助组每人平均只有九分地，为了扩大耕地面积，王永幸又用复员费买来了镐头、抬筐，领着组员在村北一片乱石窝里扒沙起石，造出了一亩多地。

有一次组员们在王永幸家里开会，看到王永幸家里连个风箱都没有。王永幸的媳妇做饭时，伏在地上吹火，弄得满屋里都是烟。大家又想到不久前王永幸结婚时，一点家具都没有，木床、门板都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复员费他一分也没用在家里，全部用在集体事业上了！

组员们含着眼泪，说：“永幸，你的一颗心都掏给大伙了，你也该顾顾自己家里啊！”

王永幸笑笑说：“办不好互助组，咱贫下中农就得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哪里还有我这个家！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别说一点钱，就是连命搭上，我也心甘情愿啊！”

这一年，互助组获得了亩产四百二十七斤的好收成，比单干时提高了将近一倍。互助组的丰收，充分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

但在实践中王永幸和组员们也感觉到：互助组集体劳动和土地私有存在着很大矛盾。就在第二年，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王永幸又响应党的号召，带领群众办起了初级社，入社的农户由互助组时的九户扩大到二十一户。这时，已是下丁家乡党总支书记的王永幸又被选为社主任。

二

合作社的成立，给山村带来了更大的欢乐。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办互助组的时候，一亩地就打了四百多斤粮食，有了合作社，就不愁由穷变富了！”“办好了合作社，咱贫下中农就不会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

合作社的成立，却使一小撮阶级敌人惊恐万状。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就好象走到了坟墓边沿一样。以后，他们看到共产党内也有人提倡“发展富农经济”“发家致富”，有的贫下中农重新失去了土地，心头又升起一点希望，窃窃自喜地盘算着：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少年，穷小子又得给我们当长工，到那时，天下就又是我们的了！没想到《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一下来，王永幸带头办起了合作社，合作化运动就象一场迅速漫延的山火，使他们睡不安，坐不宁。他们日夜琢磨着：怎样给他们泼上瓢水，让这场山火熄灭下去。

当时，圈子村日伪时期的伪村长、恶霸王万更，窃据了村

贫农团主席的职务。一天，他把王永幸找到家里，假装关心地说：“永幸啊，干工作可得多长几个心眼，不能一个劲地往前冲。现在，上边叫办合作社，可也有人叫发家致富啊！以后说不定——”

王永幸没等他说完，就气愤地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告诉你，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就是只有一个心眼，谁要是反对毛主席的章程，我就和他斗到底！”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天，王万更在街上碰见了富裕中农王老头，便阴阳怪气地说：“伙计，你怎么还不入社呢？”

王老头是农村里的一个“能人”，解放前，就一心想发家。可那时节，有地主富农挤着，他窜不上来。解放后，地主富农给打倒了，听说上边又有人提倡发家致富，王老头认为发家的时机可到了。谁知他还没发起来，就来了合作社：如果人们都入了社，就没有卖地的了，也没有打短工的了，王老头又怎能发家呢？一九五二年，他看到互助组搞得红红火火，互助组转社时，也曾想入社。后来考虑了一下那些入社的户，不是土地少，就是农具缺，虽说有几头牲口，可算起来一家还摊不到一条牛腿。而他自己，有骡子，有劳力，有土地，跟他们互助合作，不是拿自己的肥肉让人家去咬吗？他才不干那种傻事呢！今天，听到王万更问他，便说：“千算万算，不如单干，这个社我不入。”

“可就怕由不得你啊！”

“怎么由不得我？”王老头不解地问：“政府的政策不是

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吗？”

“那是不假，”王万更眨巴着三角眼说：“你不想想，互助组产量就达到了四百多斤，合作社的优越性不就更大？庄稼人看到优越性，还不挤着往里钻！过不了两年，社外就剩你自己。要想长期单干，就得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人家显示合作社的优越性，你不会想法显示显示单干的优越性嘛！要是单干比合作社还优越，谁还去入社！”

王老头听了说：“你是让我跟他们比赛？”

“政府提倡劳动竞赛嘛！”

不几天，王老头要跟合作社比赛的消息就在全村传开了。

有的富裕户说：“王老头家底厚，肥料多，能比过社。”

有的说：“社里人心齐，互助组的时候就能打四百多斤，王老头还没打过这么多呢！”

社里的小伙子摩拳擦掌，说：“比就比，越比越能显示出合作社的优越性！”

王永幸听说王老头跟合作社比赛的消息，心里沉思道：“这表面上是生产竞赛，实际上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啊！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件事，打击敌人，教育群众！”

正巧王老头有一块地和合作社的地挨边，比赛就在这里开始了。

听说社里要在这里种玉米，王老头也就种玉米。播种前，王老头赶着骡子，往地里送了几十驮子圈肥，又到城里买了

豆饼、香油渣，偷偷地上到地里。

合作社这边，牲畜少，圈肥少，但是人心齐，干劲大。他们拆旧炕，刮墙皮，肩挑车推，地里土杂肥堆得象小山一样。

到了播种季节，王老头又提前两天下了种子。

合作社种得晚了两天，可是将土地深翻了一遍，种得质量高。

过了半个月，王老头地里一片葱绿，合作社的地里也是苗粗叶壮。

正当比赛不相上下时候，上级派王永幸到莱阳学习去了。恰在这时刮来一阵风，说各地办的合作社“冒进了”，要“反冒进”。

那个王万更正担心王老头比不过合作社，自己落个弄巧成拙，这回听说合作社要“反冒进”，高兴得简直要发疯了！他乘机在村里放风说：“王永幸办二十一户的大社，冒进了！犯错误了！到秋后合作社就得解散！”

村里一阵风，社内一层浪，几天之内，有四户从社里退出去了。留在社里的多数是在旧社会受了半辈子苦的人，他们把合作社当成自己的命根子。可是，过去谁也没办过合作社，谁知道能不能长期办下去？如果上级真的要散社，又该怎么办？人们心里嘀咕着。

人心一浮动，田间管理也就松了，玉米地里长满了草，王万更和一小撮阶级敌人又编了诬蔑合作社的歌谣，叫小孩满街唱：“合作社好，合作社好，地里不长庄稼光长草；单干孬，单干孬，吃陈粮，烧陈草，两天一顿面，三天一顿饺。”歌谣

传到社员耳朵里，真象万箭钻心呀！王老头高兴地昂着头，逢人就说：“合作社这回是输定了！”

一个月以后，王永幸学习回来了。在莱阳，王永幸就听说有人提出来要对合作社“反冒进”，心里十分想不通。来到下丁家，王永幸没回村，就到区里去找区委书记。

区委书记握着王永幸的手说：“永幸，你回来的正好，现在，合作化运动正遇上一股顶头风啊！”

王永幸接着说：“书记，阶级敌人反对合作化，为什么党内也有人要‘反冒进’呢？”

区委书记从桌子上拿起一本毛主席的书，翻开其中一页，说：“永幸，你先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

随着区委书记的手指，王永幸的目光落在几行金光闪闪的大字上：

“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王永幸看了，心里一下子开朗了，说：“你是说，我们党内有斗争？”

“在我们党内，从来就是有斗争的。”区委书记回答说：“你想想，现在这股风，和前两年的发家致富风不就是一股风吗？我们共产党员，可要经得住斗争的考验啊！”

从区委出来，王永幸身上充满斗争的热情，脚步咚咚，一会儿就到了村。

晚上，王永幸召开社员会。可是，人们一个个耷拉着脑袋，没有一个说话的。过了好长时间，一个社员抬起头，含

着眼泪说：“永幸，咱的社秋后真的要散吗？”

“就是倒了南山，合作社也散不了！”王永幸斩钉截铁地说。接着，他又给大家讲了为什么要办合作社和合作社的优越性。最后，王永幸说：“咱贫下中农要想共同富裕起来，要想牢牢掌握农村的印把子，就只有组织起来这一条道！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一天也不能停，合作社永远也不会散！合作化的道路我们走定了，套上八个韁子也甭想拉回去！”

王永幸的话就象一把火，把人们心里的疑虑一下子赶跑了。社员们纷纷说：“永幸，你上天，我们就跟着你摘星星，你下海，我们就跟着你擒龙王！走合作化的路，我们棒打不回头！”

人们的思想统一了，生产很快就上去了。男女老少齐上阵，锄的锄，拔的拔，中午也不歇晌，不几天就消灭了草荒，又在玉米地里追了一次化肥。这时正好下了一场雨，墨绿墨绿的玉米眼看着往上窜。

王老头的地里本来草不多，可经过这场雨，杂草一下子冒了出来。

这时，开始收麦了，社里的劳力合理分工，统一安排，有的收麦，有的管理春庄稼，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王老头，满家只有个半劳力，顾了地里顾不了场里，顾了麦子顾不了玉米，挨门求了好几家单干户，谁家也没有闲劳力，只好眼睁睁地望着玉米地里的杂草往上长。

秋天，玉米上场了。社里的玉米亩产将近四百斤，王老头的每亩还不到二百斤。

比赛的结果，震动了全村。山上、村里，人们到处都在议论着：“王老头这样的户都比不过社，搞合作化真是毛主席指给咱们的金光大道啊！”“扩社时，说什么我也要加入！”躲在家里的王万更，隔墙听着人们的议论，脑门上一阵一阵地出冷汗。

合作社顶住了“反冒进”的妖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胜利前进。冬天扩社时，合作社一下子发展到四十六户，王老头也牵着牲口扛着犁，加入了合作社。那个窃据了村贫农团主席职位的伪村长，也在势不可挡的合作化潮流面前，原形毕露，不得不向贫下中农低头认罪。

三

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了“小脚女人”的右倾思想，下丁家乡的合作化运动来了一个大发展。经过干部群众的热烈讨论，全乡七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组成一处四百六十户的高级社。王永幸又被选为社主任，同时担任党总支书记。

县里个别右倾思想严重的人，一时还没转过弯来，当他们听说这个社包括八个自然村，四百六十户时，不禁吃惊地叫起来。王永幸带头办的大社请示了三次，都不批准。

贫下中农坚定地说：“小脚女人不批，我们自己批！”

在干部会上，大家给高级社起名字，有人说：“咱的合作社是大集体，走的是社会主义阳关大道，咱们社的前途远



民大體十五年秋之第一月 一二七二年八月十一日 畫

大，我看什么最高最大，就起什么名。”

“咱社的凤凰山，可算是又高又大的了，就叫凤凰山社吧。”

“凤凰山能有多高多大？哪有太阳又高又大！”

“对呀！太阳又高又大，又亮堂，咱就叫阳光社吧！”

“我同意！”王永幸说：“毛主席就是咱们贫下中农心里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就是灿烂的阳光。咱们办合作社，走社会主义道路，哪一步也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叫阳光社，有意义！”

阳光社的成立，在人们面前展现出更加辉煌的社会主义前程。社大了，人多了，取消了土地分红，公有制的程度提高了，这一切，使人们胆更壮，志更豪。贫下中农决心充分利用高级社的优越性，改造大自然，为建设社会主义打下一个好底子。

改造自然，应该从哪里下手呢？党总支认真分析了本地的情况：这里是十年九旱，十年九歉。遇到大旱，不用说庄稼，连人吃水都很困难。俗话说：有水没肥一半收，有肥没水看着丢。要彻底改变大自然的面貌，治服“老天爷”，首先得治水！

认识统一了，从一九五五年冬天开始，阳光社便在全社范围内打大井。

山区打井可不象平原那么容易。有的地方揭开地皮就是石头，有的大石头象铁板一样硬，一天还钻不到一尺深，打一眼井得花一千五六百个工。一冬一春，打了二十眼大井，

一眼井可以浇五六亩地。

五六亩，这是一个微小的数字。但在下丁家贫下中农的心里，激起了巨大的信心和力量。他们高兴地说：“二十眼大井，能浇一百多亩地，这么干下去，实现山区水利化，有指望！”

可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这些井，多是依靠山上渗下来的水，一九五七年春天遇上了罕见的大旱，许多井底朝了天。虽然紧靠汶河的几眼井还没干，但水位越来越低，拉水车的牲口，越拉越吃力，竟一连累死了两头。

实践使干部和广大贫下中农认识到，要实现山区水利化，光靠打井是不行的。实现山区水利化还必须“以蓄水为主，蓄排兼顾”。这时，县里又派来一个水利工作组，帮助下丁家制订治山治水的计划。这下子人们心里开了窍，我们把地下的水挖出来，再把天上的水蓄起来，这办法准能行！

王永幸、张书勤几个总支的干部和工作组的同志一连转了好几天，选中了大吕家村后那条山沟，要在这里修一个小水库。修水库，不只是人和自然打交道，这里充满了复杂的斗争啊！地主、富农不愿看到贫下中农过上好日子，当然反对修水库，就是拥护合作社的，也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因循守旧的思想，同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适应。大吕家村老社员吕清忠找到干部说：“修水库，弄两把土怎么能挡住水，这不是大白天说梦话！要搞水利，还得按照老辈的办法，打大井！”这事使党总支的同志意识到，我们要办好高级社，不光要同大自然斗，同地主、富农斗，还必须同人们头脑里的旧习惯

势力斗。他们决心要把水库工地变成打击阶级敌人的战场，教育农民的课堂。第一个样板水库，在斗争中上马开工了。

离麦收只有一个多月了，水库要争取在麦收前完工，这是一个紧急任务。各村都抽调了精干劳动力，带着铁镐、大锤、筐篓、炸药，象战士一样，开到工地上来。沸腾的工地，就象战场一样热火。王永幸和总支委员们，都来到工地和大伙一起干活。王永幸在一九四八年解放兖州的战斗中，头部受了伤，左臂被炮弹打成了残废。可是，如今抡起镐来，和年轻小伙子一样，有时候，那伤了骨头的左臂剧烈作疼，但他仍然不停地挥着手中的铁镐。他知道，这又是一场激烈的战斗。

一镐又一镐，一锤又一锤，一炮又一炮，社员们日日夜夜轮流突击，不到二十天，坝基就清好了。

大坝在不断地加高，斗争在不断地深入。

有一天上午，工作组的同志带着水准仪，在工地上测量渠道。他们准备让这条水渠，穿过梨树行，沿着梯田，一直流到人们叫做战家莹的地里。

这事又叫吕清忠看见了。他看见技术员架着水准仪，闭着一个眼睛测量，从心里觉着不顺劲。他问技术员：“你们往哪里量呀？”

“往战家莹。”

“怎么，水能流到战家莹？”吕清忠眯起两眼，瞄了一阵，把手摆了摆说：“战家莹那么高，水就能上去了？我看你们净拉些花架子瞎照量！要是水流到战家莹，我在手心里煮碗

稀饭给你喝！”

“你的眼有误差，不如这仪器看得准呢！”

“我两个眼还不如你一个眼看得准？”他嘱咐本社的干部说：“咱俩眼的别叫他那一个眼的给糊弄了。”

过了几天，大坝砌起了一丈多高，渠道也挖了一大段。这天夜里，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很多人一夜没睡觉，不知水库里是个什么样。第二天一早，人们跑到水库上一看，已经蓄了小半库的水。

干部们认为这正是用事实向社员们进行教育的好机会，决定试放一次水。

这天，工地上挤满了人，因为放水洞还没修好，临时安了一个虹吸管。水越过大坝，象一股清泉直泻下来。人们欢呼着，跟着水头，沿着弯弯曲曲的渠道往前跑。

水啊，水！一九四二年大旱时，就是为了到地主的井里挑一担救命水，口子村吕明仁的老伴惨遭毒打，不几天就送了命！

水啊，水！旧社会，为了你，人们向观音菩萨烧了多少香，磕了多少头？有一年，为了求雨，人们在烈日底下整整跪了三天啊！

如今，清清的库水流到了高级社的麦田里，这是毛主席带给贫下中农的幸福水，尝一口，甜如蜜！

放水这天，吕清忠老汉也来了。他一看水真的流到了战家庄，热泪噗嗒噗嗒掉进了水渠里。回到村里，见人便说：“上级到底有章程，高级社到底力量大，我算信服

了！”

实践证实了真理，事实教育了群众，旧思想败了阵，阶级敌人的阴谋破了产，水库工地上掀起了新的劳动热潮。为了争取水库在麦收前基本完工，各村调来的社员们，自动展开了竞赛。大陈家村贫农社员陈凤科，两大筐土，挑起来就走。一筐土百十斤，两个人抬着上坝还气喘吁吁，他一下挑起了四个人的担子。

年轻人干得热火，老一辈的人也不落后。老贫农刘新春，老烈属吕太岱等一批老将都上了阵。刘新春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他铲满一筐土，说道：“来，给我发上！”扛起来一溜小跑上了坝。

吕清忠老汉也一下子积极起来了。他丢下抬筐拿起铁锨，搁下铁锨又拿起镐头，一刻也不肯闲着。有一次休息时，他看见开溢洪道的小伙子正对付一块大石头，便走过去，想帮他打两锤。小伙子朝吕清忠笑了笑，心想：你老的没牙了，还打得动？

吕清忠说：“你笑我老了？来，咱俩比比锤！”转身对一个老石匠说：“你给掌钎，俺俩比比。”

一老一少，两把大锤，叮叮当当地抡起来了。

由于社员干劲大，工效高，水库终于抢在麦收前完工了。这个水库，可以浇灌沟两旁的七十亩梯田。人们齐说：“水库修得好，高级社优越性大！”

四

正当阳光社贫下中农齐心协力修建大吕家水库的时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党内整风之机，向无产阶级专政发起了猖狂进攻。下丁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看见天空中出现了一片乌云，以为就要变天了，一个个象毒蛇一样钻出洞。他们吐毒舌，喷毒液，胡说：“合作社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他们又明使风，暗使雨，煽动一部分对社会主义三心二意的富裕中农闹粮闹社。口子村有一个富裕中农刚在家里藏好一二千斤小麦，几百斤大豆，就拿了一条空口袋，跑到集上，抖着空口袋吆喝：“合作社的社员口袋底朝天了，合作社饿死人了！”还有一个一直没有入社的富裕中农，养了一口二百来斤重的大肥猪，也不杀，也不卖，成天在街上赶来赶去，说是要显示显示单干的“优越性”。

阶级敌人对合作化的恶毒攻击，使贫下中农怒火高万丈。自从有了合作社，人们高兴得合不拢嘴，成天价肩不离扁担手不离锨，一心依靠合作社，挑走几千年的苦日子，栽上社会主义的幸福花。可是，为什么有的人从互助组到合作社都是吹着喇叭使劲攻击合作化呢？为什么一部分富裕中农也跟着帮腔？人们议论着，思索着。

六月十九日，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了！王永幸把总支委员们召集在一起，一字一句，认真学习着。

毛主席说：“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毛主席的话象一把金钥匙，打开了人们心头的锁。干部们认识到：当前摆在人们面前的不就是一场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吗？解放后，地主、富农虽然被我们打倒了，但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时刻刻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越要进行垂死挣扎，阶级斗争也就越激烈。农村中一部分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富裕中农，他们的人入了社，思想还没有真正入社，一有机会总想往资本主义邪道上跑。这虽然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可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啊。我们当干部的，决不能因为建立了高级社，就可以埋头抓生产，如果不抓阶级斗争，高级社就不能巩固。

党总支认为：必须迎头痛击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的挑战，在斗争中巩固合作社。

在党总支领导下，一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大辩论在阳光社展开了。人们开会辩论，白天劳动时间在田间地头也辩论，一排排革命大批判的炮弹，在阶级敌人的头顶上爆炸。

“合作社不好？你睁开眼看看阳光社！俺社里一冬一春就打了二十眼大井，单干时能办得到吗？俺社里四十多天就修了一个水库，单干时见过吗？俺现在一亩地打六百多斤粮，比单干时提高一倍多，这是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啊！以后，我们还要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一步一步登上共产主义的天堂！谁反对合作社，抽掉俺登上天堂的金梯子，我们贫下中农就和他拼！”

“合作社不好？说这话的坏家伙真是黑了心肝烂了肺！要不是合作化，这几年贫下中农又得有多少卖地的？那还不是富了一家穷万家？合作社是俺贫下中农的命根子，谁敢拆合作社的台，我们就砍断他的狗爪子！”

“合作社不好？这是想堵死社会主义的路，敲开资本主义的门，真是虎狼肠子蝎子心啊！旧社会，贫下中农吃猪食、干驴活，哪一家没有一本血泪账！逃荒、要饭、扛长活、打短工，在苦井火坑里受煎熬。现在，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阳关道，过上了社会主义的好日子，谁要是再想让我们去啃资本主义的大苦瓜，我们坚决不答应！”

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中，人们也教育着那些闹粮闹社的富裕中农：

“你呀！是叫鬼迷了心窍了！单干的时候，你家一年能吃多少粮食？每人四百斤，到天了！现在，咱社里每个人一年分五

一百多斤粮食，你还说合作社饿死人了，你这是说的亏心话呀！”

“你呀！人是入社了，眼睛还老是往资本主义的路上瞅！那是一条死路，还是跟我们一起走社会主义大道吧！”

社会主义大辩论，象熊熊烈火，烧毁了阶级敌人的复辟梦；象荡荡春风，催开了社会主义思想的花！

辩论的结果，阶级敌人一个个耷拉下了头。

辩论的结果，闹粮闹社的富裕中农受到了教育。

辩论的结果，贫下中农中社会主义思想犹如春潮滚滚，越来越高涨，他们说：“阶级敌人越是反对合作社，我们越是要办好合作社！”“今年我们再办几个大工程，让人们看看到底是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

十一月，在大辩论的高潮中，到省里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总支书记王永幸，参观了毛主席亲自表彰的莒南县大山农业社的厉家寨大队，带着毛主席的光辉批示回到了下丁家。“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十六个金灿灿的大字，照得人们心明眼亮。贫下中农好象火上浇了油，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更高了。

他们围住王永幸，纷纷说：“厉家寨的贫下中农能够开山劈岭，我们也能改天换地！”

“厉家寨的贫下中农能够做愚公，我们也要做愚公！”

看着这些斗志昂扬的贫下中农，王永幸高兴地说：“说得对！毛主席的光辉批示给全国人民指出了改天换地的光辉道路，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厉家寨学习，把咱下丁家的山河重新安排！咱要把合作社办得好上加好，把社

会主义的根基打得牢又牢，以实际行动粉碎阶级敌人对合作化的诬蔑攻击！”

社会主义大辩论和毛主席对厉家寨的光辉批示，使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他们经过讨论、勘探，对战天斗地的计划做了大修改，决定十二项水利工程同时上马。五百名社员怀着保卫合作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雄心壮志，举着红旗，扛着钢锹，浩浩荡荡开上水利工地。

下了家的山山岭岭，红旗招展。下了家的沟沟壑壑，战歌嘹亮。

大陈家村东，总支副书记张书勤带领一支青年突击队，要在泳汶河修一条拦河坝。泳汶河，河面十几丈宽，天旱时，一丝水星都没有，下大雨时，又象一头猛狮，狂啸怒吼，几千斤重的大石头，都被河水冲得叽哩咕噜地乱滚。解放前，河南沿有南邢家地主的一块地。那地主怕地堰被河水冲垮，便雇了一批石匠，在地头上结结实实地砌了一道石坝，又在一块大石头上刻了“龙王在此”四个字。可是不久，一场大雨，山洪暴发，汹涌的河水把那石坝冲得稀里哗啦，“龙王在此”的大石头也被冲得无影无踪了。如今，人们就要把泳汶河拦腰截断，抬高泳汶河的水位，让河水自流灌溉河南岸二百多亩坡地。高级社，好气派！

要修好大坝，首先要清好坝基。将近二十丈长的拦河坝基，要一律清出石底，还要在石底上凿出三尺深的石槽。基础挖得越深，水流越大，人们一边用水斗往外戽水，一边轮

流下到水中清基。衣服被河水浸透，上岸后冷风一吹，冻得硬邦邦的，走起路来嘎嘎啦啦的响。抬头望，“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几幅大标语象一团团火焰，人们心里暖烘烘的。

春节过后，大坝顶凌合龙。合龙口水深流急，一小车土倒下去，一眨眼就被冲走了。这时，只听噗通一声，一个彪形大汉跳了下去，大伙定睛一看，原来是张书勤。这个一九三八年的老党员，一九四〇年就当村里的自卫团长，带着民兵割敌人的电线，袭击敌人的据点，藏军粮，送情报，出生入死。如今，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他又带头上阵。人们跟着张书勤，一个一个跳下去。齐腰深的冰水里，竖起了一道热血沸腾的人墙！他们先用装满泥土的麻袋堵水，又用石头和水泥砌坝，轮番大干了三个小时，大坝胜利合龙，喜怒无常的汶河，终于被人们驯服了。

和拦河坝同时动工的，还有口子水库。口子水库和大吕家水库同在一条山沟里，比大吕家水库高二十九米。两个水库将形成一个“两层楼”的灌溉系统，使山根，山腰的梯田都能自流灌溉。口子水库工地上，同样是热火朝天。

修水库，要掀掉村西头一座土地庙。个别迷信思想严重的人说：“土地爷爷是一村之主，掀了土地庙，可不成。”

贫下中农说：“旧社会，咱给土地爷烧了几千年香，磕了几千年头，它也没给咱带来好日子。咱不信神，不信鬼，信的是社会主义！”大家一齐动手，不一会就把土地庙拆掉了。

筑大坝，要用土地庙后边一条大土垄上的土，阶级敌人造谣说：“那土垄，是龙背，动了上面的土，揭了龙王的鳞，村里要死青年人！吕明新过去就是因为惹翻了龙王才死的！”

党总支委员吕文厚气愤地站出来说：“吕明新是因为动了龙背土死的吗？不！是让旧社会害死的！那时吕明新在家穷得生活不下去，下了狠心到北海去拉鱼。那时有句话说：能到南山当驴，不到北海打鱼。为渔霸打鱼那是九死一生啊！有一天吕明新在海上遇到暴风雨，累得筋疲力尽，渔霸还说他耍懒，用棍子没头没脸地把他毒打一顿，吕明新又苦又累，加上受冷受气，不几天就死了！……”

吕文厚在那里谈着，还记得这些事的老社员就在一旁不住地点头。他还没讲完，人们就议论开了：“咱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大干社会主义，决不让吃人的旧社会再回来！”

批驳了阶级敌人的谣言，激起了人们更大的革命干劲，工地上，抬石的抬石，运土的运土，铁锤叮当响，铁镐闪闪光亮，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

一九五八年春天，下丁家十二项水利工程先后完工了。一冬一春，他们付出了三万多个工日，使水浇地面积一下子扩大到九百亩，比原来增加一倍多，为建设山区水利化打下了基础。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越走越宽广！

顶风战浪

—

一九五七年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斗争的胜利和在农村广泛开展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提高了群众的觉悟，解放了群众的思想，推动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猛发展。一九五七冬天到一九五八年春季，下丁家阳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黄县各地一样，出现了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一九五八年五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伟大领袖毛主席集中了全国人民的意志，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喝令三山五岭开道，大跃进的胜利凯歌，响彻祖国山河！

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下丁家贫下中农办起阳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人们曾觉得：这可真是个大社呀！现在，在大跃进的热潮中，人们想得越来越远，农田水利建设的规模越搞越大，就觉得原来的高级社还是太小了。正当广大贫下中农积极酝酿办“联社”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及时地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伟大指示，于是，人民公社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生事物，就象喷薄而出的一轮旭日，在亿万人民

的欢呼声中，不可阻遏地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日，是下丁家人民最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下丁家人民公社诞生了。山山水水都沸腾了起来，那激动人心的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震天动地。从此，王永幸带领阳光社的全体社员和周围二十二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成了一个大集体，跨进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历史阶段。

人民公社一诞生，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一大二公的无比优越性，为发展集体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创了无限广阔的前景。公社成立后的第一个冬天，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的新高潮。第二年夏天，人民公社又夺得了小麦大丰收，下丁家大队获得了亩产二百九十七斤的好收成。

夏收季节，层层梯田里翻滚着金光耀眼的麦浪，微风传送着沁人心脾的麦香。望着这满坡的丰收景象，贫下中农乐在心里，喜在眉梢。他们纷纷赞颂说：“毛主席指引咱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如今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真是天堂大路步步高，一年更比一年好啊！”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正当下丁家人民满怀胜利豪情喜庆丰收的时候，一小撮阶级敌人却看到那满坡丰收的小麦，浑身不自在。

一天晚上，一个黑影钻进了小陈家村头漏划富农于作元的院里。他是党总支副书记丁玉年。

这丁玉年，土地改革以前，抱着升官发财的投机思想混入党内，不久就被地主、富农软硬兼施地拉了过去，成了他



们的忠实代理人。土改时他公然包庇富农分子于作元，把他的成分定为中农。全国解放后，刘少奇提出“发展富农经济”，丁玉年恣得一蹦三尺高。谁知道丁玉年的好梦没做完，党就引导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丁玉年虽然在王永幸的动员下加入了合作社，但他心里老是憋着一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邪劲儿。集体经济越是搞得好，他心里就越是不舒服。于作元看准了他的心病，就把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破坏集体经济的坏点子一个劲地往他耳朵里灌。于是，他和于作元靠得更紧了，两个人成了合穿一条裤子还嫌肥的好伙计。一九五六年，两个人就勾结起来往东北盗卖集体的大梨，人民公社成立后，丁玉年又让于作元当上了小陈家村的保管，两人合伙盗窃集体的玉米种子，还把玉米撒得满街都是，栽赃陷害，制造混乱。然而这一次次的破坏都没有达到复辟变天的目的，社会主义的航船顶风破浪，胜利前进！丁玉年不死心，仍然在寻机会，瞅空子，要在社会主义的船上凿个洞，妄想让这大船沉下去。

在于作元的屋子里，丁玉年恶狠狠地说：“十年了！这十年我没喘过一口顺当气啊！现在又来了什么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听到这些就气得发昏！你不是保管吗？咱就……”

“对，就这么干！什么大好形势，咱给他搅成一锅粥，让他们再咋唬！”两个鬼影发出“嘿嘿”的狞笑。

阳光明媚的一天，小陈家村第二生产队的社员在队长老陈的指挥下，把一袋袋金黄的小麦扛到保管室，以便交售给

国家。老陈虽然没文化，但他阶级觉悟高，工作一丝不苟。今天小麦入库他格外仔细，每扛进一袋就叫人写下注明小麦斤数的条子。扛来小麦一袋又一袋，纸条留下一张又一张，小麦扛完了，老陈让人把纸条上的数字加起来，不多不少正好两万斤。听到这个数字，老陈心里是多么高兴啊！这还是解放后第一次向国家交售这么多的小麦呢，人民公社就是好啊！

可是丁玉年、于作元自以为这麦子老陈心里没数，于是就利用于作元窃取的保管职务，从中搞了鬼。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他们从仓库中盗出了两千斤小麦，运到了家里。

向国家交售小麦的任务完成了，丁玉年开始宣布结果：“二队一万八千斤！”

“一万八千斤？”老陈一听，立刻愣住了。明明是两万斤，怎么变成了一万八？老陈赶紧把那些条子拿出来，让会计合计了好几遍，还是两万斤。老陈马上找到王永幸，把情况作了汇报。王永幸得知这一消息后，深深认识到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敌人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两千斤小麦，他们这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拆人民公社的台。

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全国以彭德怀为首的一小撮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庐山会议上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他们胡说什么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一时间，刮来了一股攻击三面红旗的黑风。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可乐坏了下丁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于作元等几个地主、富农分子一打照面，就挤

鼻子，弄眼睛，喜形于色地相互庆幸：“听说上头出了青天大老爷了！这回呀，有了咱的出头之日了！”

丁玉年也在人前人后装模作样地说：“这人民公社好是好，可就是办得早了点。看起来，这人民公社是有问题呀！”他满以为上边有彭德怀在那里刮邪风，下边有他们这伙人鼓黑浪，社会主义的大船就要往下沉了。

听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贫下中农肺都气炸了！田间、地头、村里、庄外，到处都是激动的议论，到处都是愤怒的批判：

“这些家伙简直是瞎子，人民公社成立后这喜人的景象他看不见吗？”

“他们和咱贫下中农走的不是一条道，这是拉咱再往那火坑里钻！”

“他越反，咱越干，跟着毛主席走，没有错！他们攻击三面红旗，只能是狗咬日头，白费劲！”

在大队党总支委员会里，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王永幸严正质问丁玉年：“丁玉年，你凭什么说人民公社办早了？”

丁玉年吱唔道：“我看到小麦被偷了，担心社员没有搞人民公社的觉悟啊！”

“偷小麦的事，你安不到社员身上，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我们一定会查清的！”

听到这斩钉截铁的语言，丁玉年几乎吓瘫了。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在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的鼓舞下，为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

动，保卫三面红旗，下丁家大队党总支对偷仓库的事件进行了调查，真相终于大白了，盗窃分子就是丁玉年和于作元。经过群众进一步审查，并且落实了一九五六年偷贩大梨和一九五七年偷盗玉米种的事件。查明了丁玉年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将他开除出党，于作元重新戴上富农分子帽子，交群众管制劳动。

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下丁家大队党总支听了上级党委传达的党中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联系下丁家大队出现的斗争，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并没有止熄。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阶级敌人不但直接出马搞破坏，而且还千方百计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党内既有象丁玉年这样在基层兴风作浪的坏家伙，也有象彭德怀那样的大头子。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不但要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斗，更重要的是以百倍的警惕，同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斗！

又一场斗争胜利了，下丁家人民干社会主义的劲头更足了。秋庄稼又获得了大丰收，全年亩产达到了八百五十六斤，过了“长江”。秋收以后，下丁家大队党总支决定在圈子村东南的柳沟，再修一个库容十三万方的水库。

这个水库，库容大，地势又高，用工用料比以前修的几

座水库都要多。可是，当时精壮劳力大部分开到了县办的水利工地。怎么办？是迎着困难上，还是被困难吓倒？党总支组织社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坚定地说：“有三面红旗指路，依靠公社的集体力量，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尤其是妇女们更是信心百倍，一致表示：“男劳力走了有我们，困难就是一座山，我们半边天也要把它搬掉！”几个上了岁数的老大爷也纷纷发言：“为保卫三面红旗，我们老当益壮，一个顶俩！”就这样，以妇女为主力军，外加一些老年人的水利大军，浩浩荡荡开上了工地。

水库工地上，大坝清基的工程很快完成了，筑坝工程又轰轰烈烈地进行。这条长达一百多米，宽四十八米的大坝所需要的土石，都要从几百米以外的地方运来。队里的小车不够，社员们就用自己编的抬筐抬。可是修这样大的坝，用筐一筐筐地抬土，进度毕竟是太慢了。怎么办？在工地上带工的圈子村第三生产队副队长王中学说：“我们要按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办事，大家要想办法，出主意，让工程更快更好地完成才行！”

大伙群策群力地出开了主意：

“我们过去用的那些木轮小车不是可以用吗？”

“咱仓库里那些破车胎，破车圈，破车架，修起来照样能推啊！”

社员们七嘴八舌，点子出了一大堆。

就这样，有的把早已淘汰的旧式小木轮车推上了工地；有的从仓库里翻腾出了一大堆旧车轮，旧车架，该修的修，

该补的补，铁丝捆，绳子绑，使十几辆胶轮车子推上了工地。

工具解决了，可还有一个困难摆在大家面前。这个水库工地上大部分是女同志，过去大都没推过车子，乍一驾起装满几百斤土的车子，东倒西歪，一不小心就翻个跟头，运土的速度还是不快。

“怎么办？怎么办？”几个性急的姑娘急得直跺脚。

“怎么办？我们学！”有几个刚强的姑娘站出来来说。

“对！”王中学给她们鼓劲说：“实践出真知，干什么也没有天生就会的，只要在干中学，就一定能学会。”

妇女们的信心树起来了，几个年轻的姑娘带头学起推车子。她们干活时学，休息时学，终于练出了推车的硬工夫。一个个登山爬坡，架车如飞，运土的速度大大加快，大坝一天天高起来。

工地上的胜利鼓舞着大家，社员们抖擞精神，越战越勇。有一个曾经在战争年代冒着生命危险救护过八路军伤员的老党员，已经五十六岁了，身体又不好，可他一点不服老，在工地上给打夯的人们喊号子。喊号子看起来很轻松，可喊起来很累人，常常喊得唇焦舌干。他装上两瓶子白水带在身上，喊干了喉咙就喝上两口水，润润嗓子再接着喊。“拉呀拉起来呀，使劲往下砸呀，一砘挨一砘呀，修个大水库呀。三面红旗好呀，公社万万年呀……”一人喊，众人和，激越的号子声，响彻了整个工地。

经过四个多月的奋战，付出一万二千多个工日，一座能

灌溉四百亩土地的水库，出现在凤凰山半腰！

由于在修水库中妇女们充分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全体社员一致赞成把水库命名为“三八”水库。

二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我国连续遇到严重自然灾害，给下丁家人民也带来了新的困难。

一九六〇年夏季，瓢泼般的大雨连日不停。一天早晨，王永幸正在家里吃饭，只见门外冲进一个人来，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三八’水库的大坝冲坏啦！”这话象晴天霹雳，王永幸丢下饭碗，冲出大门，撒腿就往水库跑去。他一边跑着，一面叫人打电话通知沫汶河下游各村封锁道路，防止冲走行人。

当王永幸赶到水库的时候，放水闸附近已被冲开了一个大洞，只听“轰隆”一声，大坝裂开了一个大口，水象脱缰的野马，吼叫着向外奔腾。那水闸楼，“哗啦”一声倒进水里，接着大坝一扭，一眨眼不见了。

王永幸被惊呆了。他看着那滔滔滚滚的洪水从水库里涌出来，就象血液从他身上流走一样。脸，一下变得煞白；心，疼得如同刀绞。

王永幸在战场上负过伤、流过血，可是他从没有感到象现在这样痛苦。这水库是集体的财产，这流走的是社员们的血汗啊！

正在这时，一阵嘈杂的声音由远而近。王永幸抬头一看，原来是张书勤和党总支的全体委员，带领着三百多名社员，扛着抢险工具赶来了。王永幸看着那源源不断涌来的人群，心中的热血又沸腾起来了。

王永幸问大家：“河下游有没有冲了人去？”

“没有！”大家纷纷回答。

“这就好！”王永幸转身对大伙说。接着，他招呼大队总支委员，管委会委员，走到水库大坝下，检查了决口的原因，由于连日暴雨成灾，水库的放水洞没有修好，漏出的水渗透了大坝粘心墙，因而发生大坝决口事故。

王永幸问大家：“水库冲了，我们应该怎么办？”

“坝冲了，咱们不能灰心丧气，还要干！”

“它能冲，咱能修，今年秋天再把它建起来！”

“对，咱们再把它修起来！”王永幸分析了重修大坝的有利条件：第一，这次有了经验教训；第二，再修不用清基了，同时还有部分坝身没有冲毁；第三，群众热情很高。最后总支做了两个字的决定：重修！

总支又把赶来抢险的社员们召集起来。王永幸登上一个高坡提高嗓门问大家：“现在水库被冲了，咱要不要把它重修起来？”

“要！”人们都争先响应。

“咱们大家有决心吗？”王永幸又问。

“有！”随着宏亮的回声，三百多只有力的拳头，象宣誓一样，一起高高地举起来。党总支的决定变成了群众的决

心。

他们说干就干。兵分两路：一路为重修“三八”水库备料，一路突击玉米追肥，夺取秋季大丰收！

就在这时，一场比自然灾害更大的困难摆在了下丁家人民面前：苏修叛徒集团乘我国遇到严重自然灾害之机，背信弃义，撤走了专家，撕毁了合同。正当下丁家上千亩玉米迫切需要速效肥料的时候，化肥的供应比往年大大减少了。

没有化肥能不能夺取秋季大丰收？这是对下丁家人民革命骨气的严重考验啊！

贫下中农都说：王永幸是铁打的骨头钢铸的人。在党总支会上，他把铁锤一样的拳头往桌子上一擂，声若沉雷地说：“撤专家，撕合同，吓不倒中国人民！让那些无耻的叛徒看看中国人民的志气吧！”党总支一致认为：夺取秋季玉米大丰收，不但是生产斗争，也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总支决定全力以赴，打一场积肥造肥的“争气仗”。紧接着召开了社员动员大会，会上，王永幸激昂地说：“同志们，修正主义卡我们的脖子，国家暂时有困难，我们应该怎么办？是站着看，还是任上肩？”贫下中农坚定地回答：“我们一定任上肩，有化肥我们能增产，没有化肥我们也照样增产！越是在国家困难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多作贡献！”

社员大会一散，王永幸就急急匆匆地往家走。一进家门，他就搬箱挪柜地忙起来，屋里的家具、炕上的被褥，全都搬了出去，连正在熟睡的最小的孩子也从炕上抱到院子里。搬腾完了，他就动手刮墙皮。原来，老庄稼把式都知道，炕洞

即、老屋土都是速效肥料，眼前要解决玉米追肥的问题，王永幸恨不得一下子积起一座肥山。

王永幸正在撒泼地干，他妻子从外边回来了，一见这般情景，吃惊地问：“哎呀！你这是干什么！”

“争气！”王永幸抹了一把汗，硬梆梆地回答。

“争什么气？”他妻子不解地问。

“给咱中国人民争气，给咱贫下中农争气！”王永幸停下手来，把苏修如何背信弃义，化肥如何缺少，我们应当如何大搞土杂肥，多打粮食回击帝修反，一五一十地向妻子讲了一遍。妻子一听，顿时志壮劲足，拿起工具和王永幸一块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他们刮了墙皮，拆了土炕，扒了锅台。一时没有现成的大型盘炕，全家人就打地铺；扒了锅台暂时没空垒新的，他们就在院里起灶。就这样不到两天的功夫，就积起了一大堆肥料。

在王永幸的带动下，不几天，几百户人家的炕土、墙土等都运到了地里。

与此同时，大队还组织了一百四十人的拾粪队，展开了群众性的拾粪活动。当时大部分男劳力正在县办水利工地上施工，家里剩下的多数是妇女。妇女拾粪，在当时还是稀罕事。但是为了同修正主义斗争，为了给中国人民争气，她们毅然与旧的传统决裂，不嫌脏，不怕羞，纷纷背起了拾粪筐。

玉米追上了炕壁屋土，又遇上了几场大雨，楞生生地长起来。拾粪活动也越来越热火。当时，在距下丁家八十华里

的蓬莱县城，有一批民工在那里修筑海港，下丁家大队就派了一个共产党员带着一个拾粪小分队到了那里。他们睡在工地旁边的露天地里，起早贪黑拾粪，克服了种种困难，随拾随晒，一直在那里拾了两个月，共拾了十几万斤大粪干。

在县办北邢家水库施工的下丁家大队民工，听说家里掀起了积“争气肥”的高潮，也磨拳擦掌找民兵连长请战。他们白天施工，晚上拾粪，大家你一筐，我一筐，不几天就积了几万斤肥料。

就是靠了这么一股劲，这么一种拚命精神，下丁家的人民，打了一场大积“争气肥”的漂亮仗。一九六〇年的秋天，夺得了玉米丰收，又为秋种小麦施足了基肥。

秋收刚结束，重修“三八”水库的准备工作也已完成。人们第二次开上“三八”水库。他们接受了上次的教训，把原来设在中间的放水洞改在一旁，在大坝北头的山嘴上，炸开岩石，把放水闸修在岩石上。不久，巍巍大坝，重又耸立在山间。

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下丁家的干部、社员迎着困难前进的时候，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乘我国遭受自然灾害和国际上帝修反猖狂反华之机，刮起了一股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

这股黑风，很快吹到了下丁家。一些自发资本主义倾向

严重的富裕户交头接耳地传送着“情报”：

“俺表弟那里，有的干部已经吐口同意自由买卖赚大钱了！”

“听说有的地方把公社、大队都劈开了！”

“咱这里什么时候让‘自由’‘自由’啊！”

一天，上边来了一个领导人把王永幸叫了去。王永幸一进门，他就说：“老王，你们大队八个村，太大啦！领导的意见是：一个村，一个队，范围小，好领导，能调动积极性。”

王永幸一听，愣了半天，然后说：“你让俺劈队？不行！”接着他象放连珠炮似地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没有人民公社，没有我们八个村的力量，‘三八’水库能修吗？一些大的农田基本建设项目能搞吗？想把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越搞越小，这是走回头路，俺下丁家贫下中农坚决不答应！”

这人见王永幸把他的意见顶了回去，心里虽然老大不高兴，还是耐着性子劝说道：“老王啊！这两年我国连续遭受特大自然灾害，苏联又撤走了所有的专家，上边有人说，我国的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形势严重，应当休养生息。劈了队，干活轻松，这有利于休养生息啊！”

不说则已，这一说王永幸更加气愤了！他理直气壮地说：“谁说我们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胡说八道！这两年连续遭受自然灾害是不假，可我们大队的粮食产量连年保持在八百斤以上，就是再有几年自然灾害，我们也有信心战胜它！国际上帝修反搞反华大合唱，我们也不怕。把话说在明处，要拉我们走回头路，除非把地球倒转！”

来劈队的人灰溜溜地走了。

来劈队的人前脚走，后脚又来了一个工作组，说是要贯彻“三自一包”的精神，在这里搞“山岚下放”的试点。

当时王永幸外出开会去了，工作组便去找总支副书记张书勤。他们开门见山地说：“老张，过去山岚都是归私人所有，合作化以后，成了集体的。现在咱们要搞‘山岚下放’，再把山岚分给各家各户，这样有利于发展林业生产。”

老张不大会发火，可他是个柔中有刚的人。他听说要搞“山岚下放”，便慢悠悠地说：“今天搞山岚下放，以后是不是又要搞土地下放？”

组长一听张书勤对他们带来的“精神”领会得这么好，不禁十分高兴，连忙说：“对对对，以后土地也要搞包产到户。中央有人说了，工业要退够，农业也要退够！”

张书勤“唰”地站起来，义正辞严地说：“他要我们退到哪里去？把集体的山岚、土地分给各家各户，这不是恢复单干吗？集体化的道路我们决心走到底，倒退的路，我们一步也不走！”

组长一看老张是这个态度，急了：“老张，退几步，你怕什么呢？上边有人说，眼下是救灾要紧，什么办法都可以试试嘛！”

老张更气愤地说：“越是有灾越要依靠人民公社！毛主席教导我们，‘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我们不信拆散集体经济那一套！”说完，一甩手走了。

第二天，张书勤找到了在外开会的王永幸，一见面，老

张就说：“搞山岚下放的工作组让我给顶了！”

“顶得好！”王永幸对战友的行动给予了极大的赞扬。

接着，这两个风雨同舟的老战友在灯下又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人民公社好”的指示，越学感到越亲切，越学心里越亮堂。他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搞劈队，搞山岚下放，就是要搞垮人民公社，复辟资本主义，是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的！他们不解的是：我们党刚刚揪出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现在又是哪个坏家伙出了这些复辟资本主义的坏主意呢？他们虽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他们坚信：社会主义的根子深深扎在贫下中农的心里头，要想复辟资本主义，办不到！不管这些人职位多高，权力多大，只要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就要同他们斗到底！

搞山岚下放的工作组一看干部成了挡头，就把干部甩开，亲自去搞所谓发动群众的工作。他们大会说，小会讲，什么“山岚下放好处多，能发展林业生产呀”，“对集体有好处，群众不吃亏呀”，他们还亲自跑到山上丈量山岚，划分地块，风吹得一阵紧似一阵。然而贫下中农总是不信他们的话，不买他们的账，结果折腾了好几天，一个报名分山岚的也没有。有几家富裕中农虽然想把山岚分到手，一看贫下中农坚决反对，也没有人敢伸那个头。

没想到干部顶，群众也抗；工作组搞山岚下放工作毫无进展，于是又向干部使开了劲。

一天，他们派来两辆大卡车，把大队小队的干部全部集

中起来，拉到外地一个已经搞了山嵒下放的单位去参观，声称去学习“经验”。

这个单位山上的树长得可真是好！山前山后没有一块空地方，那碗口粗的树，栽得整整齐齐，行距和株距都是量过的。下丁家大队的干部们看了啧啧称赞。

参观完了，工作组让大家讨论。组长启发说：“人家山上的树长得怎么样？”

“长得好啊！”干部们齐声说。

“看看还是山嵒下放的优越性大吧？”

张书勤站起来，指着工作组长气愤地说：“我问你，这里山嵒下放才几天，树就长这么大了，这是山嵒下放以后栽的树吗？这满山的树长得齐唰唰，一看就知道这是合作化时期人家依靠集体的力量，统一规划栽种的。这里的树长得好，丝毫不能说明山嵒下放有什么优越性，恰恰证明，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管好山嵒，绿化荒山！”

张书勤一带头，讨论会上就象开了锅，干部们纷纷议论说：“山嵒下放走的是资本主义的道，我们坚决不执行！”讨论会开成了批判会。

在刘少奇“三自一包”的黑风刮得最凶的时候，刚刚被开除出党的丁玉年又神气活现起来。他暗地里放出一股风：“公社不如合作社，合作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这‘三自一包’、‘山嵒下放’都是上级的新精神，王永幸不执行，完全不顾群众的利益！”

这时，一个隐藏在下丁家党内的叛徒，名叫丁学考，也

活跃起来了。他以“老区长、老党员、老贫农”自居，处处摆出个大架子。刘少奇“三自一包”的黑货很符合他的心思，他便积极地充当推销员，逢人就说，见人就讲：“现在，我们国家是处在非常时期，上级有了自由买卖的新精神，真是处处为群众着想啊。钱多了不咬手，大队的水果、粮食要是拿到自由市场上卖高价，一家就能多盖几间瓦房呢！”

在丁学考、丁玉年的煽惑下，有些富裕中农动了心。他们越算越觉得到自由市场上卖水果、卖粮食这笔买卖划得来。还有的提出来，到黄县城开羊肉馆，卖肉包子，也比在地里捣石头蛋蛋有出息。

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在丁玉年、丁学考的怂恿下，有一个生产队装了满满几车集体的大梨，准备到龙口的自由市场卖高价。

神不知，鬼不觉，小车偷偷上了路。没想到刚出村，两个高大的人影拦住了去路。原来是大队“红保管”陈恒富发现了这个生产队要到自由市场卖大梨，及时告诉了王永幸。

下丁家大队人人都知道王永幸是一个斗资本主义不留情面的红脸汉子，推车的社员一看拦路的是陈恒富和王永幸，心里不禁害怕了。没想到王永幸没有批评他们，却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王永幸语调深沉地说：“同志们想一想，咱大队水果的丰收是咋来的？在旧社会，我们山上虽然也有几棵树，但那时是：‘破梨山楂，不如地瓜，有树不结果，结果不卖钱’。解放后，靠集体的力量，我们才发展了果树。我们丰收了就把国家给忘了，这走的是资本主义道

路啊！同志们，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咱贫下中农的亲戚只有两家，一家是集体，一家就是国家……”

王永幸这触人肺腑的话语，一字一句打动着人们的心。那几个社员惭愧地低下了头，他们承认了错误，表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面对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对着一部分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倾向，王永幸带领总支委员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的教导，深深认识到：广大农民虽然早已入了社，但其中的一部分富裕农民，思想还没有真正入社，资本主义倾向还很严重。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和党内几个反对社会主义的坏家伙，时刻都在鼓动他们往资本主义的道上跑。因此，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以农民已经组织起来为满足，更重要的是需要付出心血，以满腔的热忱，引导广大农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帮助他们解决思想入社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战胜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巩固和发展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已经取得的胜利。

王永幸和总支委员们为了对群众进行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的教育，回击阶级敌人的无耻谰言，不分白天黑夜地深入到群众中进行广泛的调查。他们走了一家又一家，访了一户又一户，他们把社员群众解放前后的生活变化，政治地位的变化，尤其是集体化以来比单干时各方面的显著提高，都调

查得一清二楚，并抽出了三个典型户做了明显的对比。

一天夜晚，王永幸把全大队社员召集了起来，他翻开自己多少天来精心填制的调查表，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现在有人竟让我们走单干的回头路，那是条要命的路，我们一定不能走！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摇三摇，走下去我们又要掉进那苦坑火海了！”他当众把一户富裕中农，一户中农，一户贫农在解放前、解放后单干、人民公社化以后三个时期的粮食和经济收入，一笔一款地摆了出来，摆完后王永幸理直气壮地说：“从这三笔账上，我们可以看出，不管口粮还是现金，还是政治地位，这三家都是解放后比解放前高，人民公社更比单干高。现在却有人想让我们搞三自一包、山岚下放，回头搞单干，退到解放前，这是把我们往资本主义斜道上拉呀！我们决不能上这个当，要时刻认清方向，要和资本主义一刀两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

王永幸的这个“三类户，三笔账”的调查报告，象子弹一样地射向了阶级敌人，使他们浑身发抖，哑口无言；它又象教科书一样地教育着贫下中农，他们激动地说：“人民公社好，一步一层天，谁要断路拆桥，俺就和他拼到底！”“集体化道路我们走定了，宁搞石蛋蛋，不卖肉包子！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山区，多为人类做贡献！”

经过激烈的斗争，在黄县县委的支持下，搞山岚下放的工作组撤走了，“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黑风在下丁家销声敛迹了，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更加坚定不移。

四

在同苏修的经济封锁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激烈斗争的日子里，下丁家大队党总支深深感到：要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刮起的黑风，不光要顶，还要大干！就是说要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努力发展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用铁的事实显示三面红旗的正确和伟大。同时，党总支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的教导，认识到：大自然降下严重的灾害，社会上刮起一股反对三面红旗的黑风，这些都是坏事。但是在战胜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必定会进一步激发起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雄心壮志，必定会出现农田基本建设的新跃进。同资本主义黑风的斗争也必定会进一步擦亮人们的眼睛，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只要我们党组织在自然灾害和资本主义黑风面前不弯腰、不低头、善于组织和发动群众，就能够劈风斩浪向前进，战胜灾害夺丰收。

怎样大干呢？党总支分析了本大队的具体情况。从一九五五年起，经过几年努力，已经修了大吕家水库，口子水库，“三八”水库和一些塘坝、大井，为建设山区水利化打下了基础，使粮食产量过了“长江”。水利建设迈开了步，土的问题就突出出来了。下丁家大队的耕地，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河滩地、山根地和山坡薄地。河滩、山根地，算是较好的，但有些地块沙石很多，有些地块块很零碎，高低不平。

占耕地绝大部分的山坡地，土层浅，地块小，地面倾斜，有的下大雨就能冲出石硼来。这样的地，浇水如跑马，水过地皮湿，如果不彻底整治，有了水浇条件也不能保证继续增产。治水和治土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必须用治水促进治土整地，用治土整地促进治水。

早在一九五六年，下丁家大队打了第一批水井之后，就迫切地感到了整地的重要，王永幸那时就曾在圈子村带头搞了一次整地的试验。圈子村南边有五亩多的一片地，这片地大小七块，高低不平，虽然地头上新打了一眼井，但浇起水来旱涝不匀。王永幸带领青年们挖的挖，翻的翻，抬的抬，一个劲地干了十几天，把这片大大小小，高低不平的七块地，整成了一块六亩零七厘的平坦大地。六亩零七厘，这在平原是微不足道的，可在下丁家，却是自古以来的第一块大地，社员亲切地把它称为“一大地”。

现在水利条件比过去好了，人们更感到了整地的迫切性。大队党总支决定，大规模地进行整地。

整地的问题一提出，阶级敌人就不断地在背后吹起冷风：“放着挣钱省劲的买卖不干，一天到晚去整那二亩薄地，真是死心眼！”有的人也随声附和说：“咱那地再整也没出息，修修补补算完了，现在天灾这么重，还是打石头去挣钱！”针对这些问题，王永幸组织广大社员群众认真学习了《愚公移山》，他紧密联系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实际出了三道题：

自然灾害重，国内外反动派又乘机攻击三面红旗，我们

贫下中农应该怎么办？

在改造自然、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中，是当“愚公”，还是当“智叟”？

整地，是修修补补，还是彻底革命？

题目一出来，社员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争先恐后发言：

“国内外反动派攻击三面红旗，我们更要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整好地，浇上水，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支援世界革命，让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

“人家老愚公，两座大山能敢搬，自然灾害再大，总没有山大吧？我们有人民公社，一定能战胜它！”

“整地这是千秋万代的大事业，咱决不能修修补补自己糊弄自己，咱有了人民公社，人多力量大，要高标准，严要求，整万古千秋田！”

整修“万古千秋田”，这是多么豪迈的口号，多么宏伟的目标啊！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极大地鼓舞了总支的同志，王永幸高兴地把大腿一拍说：“大伙说得对，为了保卫三面红旗，打击国内外反动派，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立下愚公移山志，千难万险何所惧。严冬风雪交加，下丁家人民日夜战斗在整修土地的工地上。石头硬，没有下丁家人民移山填海的骨头硬，社员们坚定地说：“山再薄，地再穷，只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就能让大地脱胎换骨，薄地变良田。”

一九六一年冬天，六十三岁的老贫农王万珍带着老少五个人，在圈子村河西崖整治一块杂草丛生的河滩地。这块地表面上一层淤泥，下面尽是些沙石，大的石头有几百斤重，小的只有杏核那么大。石头和泥沙搅在一起，连花生都不长，人们叫这块地“沙石窝”。

“哟，这么多石头，哪年哪月才能搬完哪！”两个年轻的姑娘第一次参加整这样的地，真有些发愁了。

王万珍笑了笑说：“石头不可怕，怕的是没决心，咱学习老愚公，石头再多也能搬完！”

两个小姑娘被王万珍一席话鼓起了劲。数九寒天，滴水成冰的日子，风再大、雪再深，他们照样一镐一锹不停地挖，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往外搬。大的石头搬完了，他们又用“大过罗”的方法往外筛小的，支起铁筛子，一锹锹地象建筑工人那样仔细地筛，连手指头肚大小的石子也一粒粒拣了出来。

老少五人，在王万珍的带领下，怀着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从冬到春埋头苦干了四个多月，把一亩六分“沙石窝”整成了有二尺多厚好土的良田，还用从地里拣出来的石头砌垒了一道五尺多高的石堰，人们都赞不绝口，亲切地称王万珍为“活愚公”。

圈子村老党员吕明仁，六十多岁了，整地时负责垒地堰。他个子不高，身子不胖，可浑身象青年人一样，有股使不完的劲。一百多斤重的大石头他一弯腰就端上堰。他鼓动大家，喊着号子，“加油干哪！今天垒一米，明天垒两米，

一米加一米，石墙千万里呀！”工地上被他鼓动得热火朝天。有一次垒地堰时，一不小心跌到山沟里摔昏了，人们正要抬他送医院，他醒来了，挣脱开人们的手，“噔噔噔”地跑上山坡，抱起一块一百多斤的大石头又往地堰上端，在场的社员感动地说：“你呀，真是一个老铁人啊！”

“活愚公”，“老铁人”，这就是改天换地的下丁家贫下中农的英雄形象！

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下丁家贫下中农在整地中，不但发扬了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而且创造了一套科学的整地方法。他们根据土地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有的实行“大开膛”，就是把地下的石头全部挖出来；有的实行“大削平”，就是把倾斜度很大的地削高填洼、彻底整平；有的实行“大过罗”，就是把土里的碎砂碎石全部筛出来；还有的采用了“大起大落”“抽沙换土”“小并大”等等方法。不管采用什么方法，都达到了“两平、石堰，能排、能灌”的要求（两平，即地面平，土层下面的石底也要平。能排能灌，就是有排水沟和灌溉渠）。从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二年春，下丁家人民就用这各种各样的方法，整完了所有的河滩山根地和一部分山坡地。

下丁家的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大队党总支和王永幸的带领下，三年自然灾害，三年大干，粮食产量由解放前的每亩二百斤，增长到八百多斤，连续三年过“长江”；由解放初期每年吃国家二十万斤统销粮，一跃而每年向国家贡献余粮五十万斤。这几年，他们还主动支援了兄弟大

队粮食两万斤，干菜一万六千斤。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当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和国内外反动派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一起向中国人民袭来时，下丁家大队党总支和广大贫下中农顶着黑风上，踏着恶浪行，他们以自己的革命实践表明了：我们的国家，不愧为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的党！

心 红 胆 壮

—

下丁家大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粉碎了“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黑风，战胜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迎来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胜利召开！

伟大领袖毛主席针对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现实，总结了国内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久，毛主席又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伟大的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战斗号角吹响了！

王永幸带领下丁家大队党总支一班人，认真学习了党的基本路线，学习了中央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光辉文件“十条”。毛主席的教导，党中央的文件，使他们心明眼亮。他们联系下丁家的实际，清醒地认识到：十几年来，贫下中农虽然在改变所有制、保卫三面红旗和改造自然的斗争中，不断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但是，阶级敌人并没有死心，时时刻刻都在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在一部分富裕农民中，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还严重存在着。更危险的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阶级敌人还千方百计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党内会出现资产阶级分子，出现象丁玉年那样的蜕化变质分子。现在，毛主席、党中央发出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伟大号召，这对于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无限深远的意义。王永幸经常思考着：怎样才能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更好呢？

一九六三年八月的一天，邮递员送来了《人民日报》。王永幸象往常一样，干完一天活，点亮煤油灯，坐在炕上认真地读了起来。当看到第五版时，“在农村阵地上”——一篇文章的刚劲的标题字映入他的眼帘，激励着他。文章记述的是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和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的事迹。

大寨，陈永贵，这两个名字已经印记在王永幸的心里。两个多月前，《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学习昔阳县广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先进经验，那时王永幸就从报纸上

知道了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是昔阳县干部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一面镜子。今天报纸上又发表了介绍大寨党支部和陈永贵同志的先进事迹的文章，王永幸怎能不欣喜若狂呢？

这篇文章象磁石一样把王永幸的心紧紧吸住了。大寨大队党支部和陈永贵同志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带领广大群众主动同阶级敌人斗，同资本主义倾向斗，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越来越高，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大寨大队党支部和陈永贵同志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干社会主义，出大力，流大汗，改造了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大寨党支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紧密联系群众，把党支部建成一个阶级敌人“磨刀痛骂吓不倒，指东道西骗不过，甜言蜜语迷不住”的战斗堡垒……

大寨的经验真是太丰富太宝贵了！王永幸一口气读完这篇一万多字的文章，高兴地想：路，就应当象大寨人那样走；革命，就应当象陈永贵同志那样干！有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文件指路，又有了大寨的榜样，下丁家的社教运动一定能搞好！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下丁家大队党总支根据党中央的文件和大寨的经验，发动贫下中农对敌情进行了忆、查。一件件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事实，摆在了群众的面前：

“于作元勾结丁玉年破坏集体经济的事，大伙都看到了。咱大队其他的阶级敌人，也和于作元做着一样的梦呀！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叫嚣窜犯大陆那阵儿，大陈家村一个地主分子

领着孩子去认他家过去的地边、房基，看他们复辟变天的心有多切！”

“前两年刮‘三自一包’的黑风时，咱大队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到处伸头探脑地听消息，看风向。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想翻天呀！”

“圈子村曾经鼓动富裕中农跟初级社比赛的伪村长王万更，这几年一直给青少年讲古戏，说坏书，听了他说古道今的人，走路都没了力气。他是往青少年心里灌毒药哇！”

“有的阶级敌人，往干部家里跑，鞋底上涂了油；跟干部说话，嘴唇上抹了蜜。我看这是黄鼠狼子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在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广大贫下中农充分发动起来了，他们敢说、敢揭、敢批。揭着，批着，由党外到了党内，大家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到了丁学考身上：

“丁学考，他算哪号党员干部呀！三年困难时期，他到处买鸡蛋，买白糖，养得肥头大耳，他却说，王永幸胳膊肘子往外拐，社员都要饿死了。他和阶级敌人唱的不是一个调子吗？”

“他从国家医院大把大把地往家拿不花钱的药，哪个社员有了病，他就胡乱送上两片三片，还说：‘社员都是给干部当长工，哪里有钱看病，我同情群众哩。’他这不是挑拨干群关系，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什么！”

“丁学考经常炫耀他那‘老党员、老干部、老贫农’的‘三老’牌子，他那心思却和地主、富农一个样！”

一桩桩，一件件，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现实，进一步擦亮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眼睛。原先还有人认为：解放后，经过多次较量，阶级敌人早已成了臭狗屎，即使搞点破坏，也是牛蹄子小坑儿，翻不了车。现在，他们看到了：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阶级敌人不但用钢刀同我们斗，还用软刀子同我们斗。散布剥削阶级的思想毒素，拉拢腐蚀干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这就是他们同我们斗争的软刀子。这绝不是牛蹄子坑，而是大陷阱！党内竟然有人同阶级敌人一个鼻孔子出气儿，这就更危险！

在群众忆、查大会上，王永幸对大家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最近，毛主席又提醒我们：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种危险的情景，在苏联已经出现了！我们一定要向大寨贫下中农学习，时刻绷紧阶级斗争的弦，抓紧阶级斗争的纲，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

根据群众揭发出来的情况，下丁家大队党总支组织群众狠狠批斗了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并在党内严肃批评了丁学考。

面对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大队党总支深深感到：一个干部能不能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关键是用毛泽东思想

武装头脑，认真改造世界观，自觉抵制阶级敌人的拉拢腐蚀。因此，他们学习大寨大队党支部的经验，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进行了开门整风，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

早在一九五五年阳光社成立时，党总支为了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就制订了“请客不到，送礼不要，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七、八年来，广大干部严格执行这项制度，促进了思想革命化。总支书记王永幸在解放战争时期多次受伤，是残废军人。但他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重活、脏活干在前，修水库、垒地堰、积肥造肥，样样跑在头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得了严重的肝病，仍然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每逢过春节时，他总是跑到饲养场，出粪垫土，照料牲畜，让饲养员回家过年。其他干部如总支副书记张书勤，总支委员张秉义等，也都是劳动的好手。下丁家大队广大干部干活跑在前头，享受却把自己排在后头。他们要求自己：只能比群众多流汗，不能比群众多报酬；只能比群众多挑担，不能比群众多受照顾；只能比群众多吃苦，不能比群众多享受。一九六一年，因为王永幸病很重，总支决定照顾他三十斤小麦。他自己一粒也没留，全部送给了五保户。干部的模范行动，受到了群众的热情赞扬，有力地调动了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但是，也有少数干部，“请客不到，送礼不要”虽然做到了，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总是做不好，认为一手捂不住俩蚂蚱，当干部只要搞好工作，少劳动点不算啥。在党总支整风时，总支委员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干部带头参加集体

生产劳动，“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的教导，学习了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和大寨大队的干部带头参加劳动的模范事迹，对劳动不好的干部进行了批评帮助。通过整风，他们认识到：干部的任务是抓阶级斗争，抓思想工作，带领群众搞生产，肩上挑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担子。如果脱离了劳动，就和实际隔了一座山，和群众隔了一层皮，阶级斗争的动向看不到，社员每天想些什么也摸不清，工作关键在哪里抓不准，就好比是聋子、瞎子，怎么能够做好革命工作呢？更重要的是，一个干部不爱劳动，就不会有劳动人民的立场和感情，就不会时时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就不会关心群众的疾苦。这样的干部，是不可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的。俗话说：一懒生百邪，一个人思想变坏，往往是从懒开始的。一个干部不积极参加劳动，天长日久就会“修”，就会把群众领到资本主义的邪道上去，将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失。认识提高后，个别不爱劳动的干部热爱劳动了，积极参加劳动的，现在干得更加自觉了。他们不占用劳动时间开会，不在劳动时间坐到办公室里办公，各村党支部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交流当天的情况，安排明天的工作。白天劳动时，利用休息的时间开地头会，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参加劳动的经常化，进一步促进了思想革命化，广大干部更加朝气蓬勃地带领群众前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下丁家大队还对照大寨找差距，检查分析了下丁家大队创社会主义大业的情况。经过八年的

努力，下丁家大队在山根山腰修了一些水库、塘坝，又整治了山根、河滩地和一部分山坡地，把山腰以下的土地基本上建成了旱涝保丰收的高产稳产田。但是，高山上还没有水利设施，地处山腰以上的果树和梯田仍然得不到自流灌溉。就整地来说，前几年整的大部分是河滩、山根地，那儿地势较低，土层较厚，还是比较好整的。越往上，地越薄，石头越多，往往掀开几寸深的土层，就露出了乱石硼。这些还没有整修的地，都是些难啃的“硬骨头”。党总支和广大贫下中农决心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东风，学习大寨贫下中农的革命精神，把高山水利关拿下来，把“硬骨头”地啃下来！

就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下丁家大队党总支向全体社员发出了“向高山要水，向石硼要地”的战斗号召。一场更加艰巨的改造自然的战斗打响了。

二

向高山要水的战斗，是首先在口子村北的高坡上打响的。

大吕家村北、口子村西的岔河沟里，接连修了两座水库之后，大部分梯田都成了水浇地，可是在第二层水库上面还有五十亩高山梯田浇不上水。一九六三年秋天，又遇到了大旱，为了抢种小麦，人们扭着沉重的水筲，在陡峭的山坡上，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很多人的膀子都压肿了。往山上挑水要爬半里地的山，七八层梯田，一层高过一层，那一道道

石头地堰，象城墙似的，有的地堰太高，爬不上去，就搭上一块跳板，有时连人带筐一起跌下来。

这一切，党总支委员老吕都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想：为了解放劳动力，为了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我们必须响应总支发出的向高山要水的战斗号召，在这高山上修个水库。

老吕看准了北山上的一个地方，修水库比较合适，他把这想法和口子村的支部书记老战一说，老战恰好也是这么想的。他们和大伙一商量，大家都觉得有“门道”，可是到底行不行，心里没大有底。

第二天，老吕跑到县办的一个水库上，请水利干部来看。老吕和老战领着那位同志，到山上仔细测量了一遍。那位同志说：“这个地方的流域面积，只有零点零五平方公里，常年积水量还不到五千立方。看来，只能修一个容水五千立方的小塘坝了。”

五千立方，显然不能彻底解决这五十亩旱地的浇水问题。可是，总比没有强。说干就干，水库当年冬天就开工了。

大坝一天天高起来，老吕和老战的心事却一天比一天重。因为修这么个水库，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有些高山梯田，还是浇不上水。他俩想：流域面积小、水源少这个困难，难道真的不能解决吗？他俩就在东山上打主意。东面上山，下雨时水势很大，可是水顺着山坡向西南方向的山沟里流去，流不到这个水库里来。如果把东山上的水从半山腰截

住，挖上渠道，引到这边来，积水量不就大了吗？在这个想法的启发下，又联想到西山上的流水也可以截流，结果又从西面找到了两条可以引过水来的小山沟。这样一来，流域面积小、水源少的问题就解决了。最后他们决定：扩大正在修建的工程，加高大坝。

工程完成后，他们又请了县水利局的同志来检查，经过再次测量，流域面积由零点零五平方公里，增加到零点一二平方公里。原来设计的只能容水五千方的水库，变成容水一万二千方，水库控制下的高山梯田，可以自流灌溉了。

向高山进军的道路打开了。下丁家大队的高山水利工程，一个接一个地开了工。

在大陈家拦河坝上面，有一片高墻地，原来也浇不上水，但是这里不能修水库，怎么办？社员们决定修一个扬水站，把泳汶河的水扬到高墻上。

修扬水站要用几千方石头、沙子。大陈家村的男女老少齐上阵，抬石头，背沙子，垒的垒，运的运，干得好不红火。老贫农陈恒日，更是老当益壮，冲锋在前，扛起百十斤重的石头，爬坡登山，四个月不歇脚。到胜利完成任务时，肩膀上脱下一块巴掌大的老茧皮，足有铜钱那么厚，大家惊叹地说：“真是一双铁肩膀。”大陈家的贫下中农用自己的一双双“铁肩膀”，挑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重担，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一个高二十米的扬水站，一下子扩大了一百亩水浇地。

就在向高山水利化挺进的时候，“啃硬骨头”的整地热潮

也一浪高过一浪。要啃动“硬骨头”，首先要骨头硬。英雄的下丁家贫下中农，是具有硬骨头性格的人，被人们称为“穿地龙”的第三队副队长王中学，就是一个代表。

王中学，是个贫农出身的年轻的共产党员。他泼辣、能干，专好打“硬仗”。党总支提出啃“硬骨头”的号召后，从一九六三年冬到一九六四年春，他和第三队的社员们一起，连续整治了圈子村西耩和台儿耩两块地。在台儿耩，王中学抡起他那镐头，硬是把一块块大酥石劈下来。正干得热火的时候，王中学左手的大拇指和无名指被石头砸了。可他没当一回事，不声不响，照样干。第二天，大拇指肿了，他偷偷扎上一圈布，还是干。后来，大伙发现了，催他上卫生院看看，休息休息，可他说：“整完这块地再说。”大伙连推带拉地叫他上了卫生院，因为伤口已经化脓，医生把他的两个指甲盖子都抽掉了。伤口还没愈合，他又到工地上来了。别人劝他休息，他说：“我手不好用，肩膀还能抬。”他又抬起石头来。有一天，他和一个社员抬石头，一块大石头滚下来，又把他的脚后跟豁了个大口子，鲜血直冒，他上卫生院上了一点药，接着又回到工地干开了。大家说：“王中学，你的脚碰了，不能抬了，快去休息吧！”他又说：“我的手已经好了，不能抬，我还能抡镐呢！”王中学就是这样的硬骨头！

整完了台儿耩那块地，王中学又和社员们回到西耩那块地里。在这块地的南边，他们遇上了一块没边没沿的大卧牛石，一镐砸下去，只崩个白点儿，纹丝不动。有的人看着它发了愁。王中学拿起镐头试了两下，确实不好啃。正好王永

幸到地里来了，他看了看那个大圆圈块，又瞧了瞧大家的神情问：“怎么样？”

“太硬了，不好啃。”

王永幸理解大伙的心情。这么大块卧牛石，连个缝也没有，一下子不知从哪里下手。他想给他们点把火，就说：“太硬？到底是石头硬，还是咱们的心软了？愚公能移山，咱还能叫这块石头愁住了？咱们硬起来，它就软了。”

王永幸这么一说，把大伙鼓动起来了：“对！石头再硬，也硬不过咱的决心。”“干！就是块钢板，也要一口一口把它啃下来！”王中学和社员们一起，先在大石头上打上炮眼，炸出几条缝，然后用镐头、钢钎、撬棍一起开。镐头磨秃了，回火加上钢；手震裂了，用桃膘粘起来，最后到底把大卧牛石劈掉了。

下丁家人用这种“硬骨头”精神，劈岭填沟，移山改道，从一九六三年冬到一九六四年春，整修了上百亩“硬骨头”地。

一九六四年春天，下丁家大队党总支全面检查了山、水、田、林的基本建设情况以后，认为比起治水、整地来，治山是一个薄弱环节。下丁家大队共有山岚七千多亩，占总面积的一半以上。俗话说：“水是一条龙，先从山上行，治下不治上，白搭一场工。”下丁家贫下中农认识到了山、水、田、林的辩证关系，从高级社成立后就开始封山造林，并且闸了许多山沟，修了许多谷坊。现在治水、整地的工作向前发展了，治山就显得落后了。因此，从一九六四年春天

起，大队党总支又立即抓治山，大规模地展开了封山造林活动。他们进行了统一的规划，合理地安排农林用地，在山高、坡陡、土薄的地方，封山育林，保持水土；在山腰沟坡、土层较厚但不易耕作的地方，建设果园；在坡缓、土厚、水利条件好的地方，建设高产稳产农田。下丁家的三十六座山头，被描绘得更加秀丽了。

三

一九六四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毛主席的号召，为我国五亿农民树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辉榜样，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方向，说出了贫下中农的心里话。下丁家立即掀起了学大寨的新高潮。

社会主义教育和“**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两股洪流，汇聚一起，祖国的大地上，春潮澎湃，热浪滚滚！这时，刘少奇一伙见势不妙，便接过社教的口号，盗用中央的名义，炮制了一个同“十条”相对抗的所谓“后十条”，抛出了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否认阶级斗争是搞好社教运动的纲，否认社教运动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胡说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刘少奇还指使他老婆搞了一个假四清，真复辟的“桃园经验”。妄图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引向复辟资本主义的邪

路，并且破坏刚刚兴起的“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就在这时，下丁家来了所谓四清工作组。

自从一九六三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来，下丁家的干部、社员就天天盼着工作组的到来。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以后，大家盼望工作组的心情就更加急切了。工作组一进村，王永幸就代表大队党总支把下丁家大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发展史和当前阶级斗争的情况，向工作组作了详细的汇报。王永幸最后说：“我们党总支和贫下中农相信，你们的到来，一定会使下丁家的革命生产搞得更好！一定能帮助我们把大寨的根本经验学到手！”

谁知道这个工作组正是来这里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对贫下中农的要求和呼声哪能听得进去呢？王永幸说完后，只见那工作组的组长忙接上去说：“这次四清，要依据‘桃园经验’来搞。学大寨的事，先往后放一放。大寨这面红旗是真是假，还需要用‘桃园经验’来检验！”

工作组长的这番话，不禁使王永幸吃了一惊：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怎么还能是假的呢？王永幸迷惑不解地问：“你说的这个‘桃园经验’都是些什么？它怎么要和大寨红旗唱对台戏？”

工作组长说：“桃园经验，可是无限丰富罗！概括起来一句话，越是先进单位问题越多！老王，你们这里也是一个先进单位，你们可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呀！”

工作组进村不几天，就按着“桃园经验”搞开了。他们一不找贫下中农开调查会，二不找干部了解情况，专门明来暗

去，到那些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家里去搞什么“扎根串连”。贯彻《十条》时在党内受到严厉批评的丁学考，成了工作组的积极分子。他一天到晚泡在工作组办公室里，以一个“退休老干部”的身份，又是“痛心”又是“惋惜”地“介绍”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帮助工作组了解情况”。工作组的人也三天两头往他那里跑，小路踩得溜滑光。

不几天，工作组就在大会小会到处讲开了：“下丁家搞得不好，是干部象地主富农那样，逼迫社员干出来的！”

“下丁家的干部剥削贫下中农比过去的地主、富农都厉害！”

工作组会上讲，一小撮阶级敌人在阴暗角落里嚎叫呼应：“清官来了，我们报仇伸冤的日子到了！”

工作组的言行及阶级敌人的猖狂活动，引起了贫下中农的高度警觉：在那万恶的旧社会，下丁家山是地主的山，地是地主的地，穷苦人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常常被逼得四处奔逃，流落外乡。解放后，下丁家大队党总支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带领贫下中农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把贫穷落后的下丁家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工作组颠倒黑白，矛头对着下丁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把那些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人看作基本群众，分明要让被打倒的地主、富农再重新骑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贫下中农越想越感到不对劲儿，都纷纷去找他们的带头人王永幸。

山村，冬夜，满天星斗。王永幸的房子里挤满了人，一

个个老党员、老贫农正在愤怒地向王永幸汇报工作组进村后的活动。王永幸听着下丁家这伙创业的老伙家的发言，两道浓眉越锁越紧，他心里和同志们是一样地激动着。他清楚地看到：工作组进村以后，把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远远抛在一边，就象水火不相容，从进村到现在，他们不讲阶级斗争，不讲农业学大寨，不组织社员和干部学习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条”，大会小会嚷的是什么“桃园经验”，是“下丁家问题多”……但是工作组到底要搞什么名堂还需要进一步地观察分析，要发动群众，提高警惕，用毛泽东思想去识别一切。想到这里，他充满了斗争、胜利的坚定信心，严肃地说：

“同志们，毛主席说：‘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我们要努力学好毛主席的书，不管是谁，只要不接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削弱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和他斗到底！”

听着王永幸这铿锵有力的话语，全屋的人只觉得腰杆更硬、斗志更旺了！

工作组进村十几天来，只是串联了几个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人，广大贫下中农谁也不跟他们走，组长的心情不禁一天天着急起来。一天晚上，工作组负责人在下丁家村召开了揭发批判干部大会。会前先念了一阵子“桃园经验”，然后煽动说：“同志们，我们这次到下丁家来，就是搞第二次土改，解放你们来了，你们对干部不要怕，有我们撑腰！”他们满心希望，只要平日串连好的“根子”一带头，群众就能“轰”

起来。

山阴角吹出来的风凉飕飕，工作组说出来的话冷冰冰，贫下中农听了，都不禁皱起了眉头，可是那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地富分子却都乐坏了。

一个富农分子的老婆，越听越顺耳，这些年来的气，可得出出了。前几天她就听到了工作组扎根串连整干部的风声，今天又亲耳听了工作组负责人讲的话，她认为翻案的时机到了。工作组负责人的话音刚落，她就连滚带爬地上了台。那工作组负责人一见有人上台，心下暗自高兴，忙对那富农分子的老婆说：“你有意见大胆提，我们支持你。”这么一讲，那个富农分子的老婆胆子更大了，她脸一变，眼泪往外一挤，指着党支部书记就说开了：“你把俺划成富农，这些年来可叫俺吃够苦头了。”

听到这复辟变天的嚎叫声，贫下中农简直气炸了肺，“住嘴！”几个老贫农满腔愤怒地大吼一声，跑上去，一把将这个富农分子的老婆揪下了台。这一拉一吼，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那主持会的工作组负责人一看他刚才表态支持的竟是个富农婆子，惊得打了一个趔趄。停了片刻，他故作镇静地开了腔：“不管是什人，都要听听他的意见，谁不给干部提意见，就是包庇四不清干部。”这一讲，贫下中农更是火冒三丈，忽啦啦一下子都愤愤地退出了会场。

接连几次的失败，搞得工作组慌了手脚，最后他们自己动手，翻手册，算账本，清仓库，找不出什么问题，就定出“莫须有”的罪名，来扣干部的工分，就连干部家属也没能幸

免。有的干部全家只收入六千分，一次就扣了七千分。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统统靠边站，而有严重问题的丁学考，他们却想让他当村贫协主席。

这些天来发生的情景，一直使王永幸心潮激荡。就在这严冬的夜晚，王永幸拨亮煤油灯，又一次学习了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基本路线。他反复念着：“**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反复琢磨着要“**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句话。忽然间，他又想起了十年前区委书记同他一起学习过的那段毛主席语录：“**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王永幸的心里豁然亮堂了，十多年来经历的斗争，在他眼前连成了一条线：毛主席号召农民“组织起来”，而有的人却鼓吹“发家致富”“发展富农经济”；党中央作出了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有人却大砍合作社，要合作社“停、缩、整”；毛主席指出：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有的人却胡说：所有制的改造完成了，阶级斗争熄灭了；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有的人却胡说：“**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并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黑货；毛主席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而有人却大肆宣扬“桃园经验”，在社教运动中一屁股坐到了地主富农的板凳上……。这一连串的事实，不就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吗？过去，王

永幸曾经想到过：上边是否有人跟毛主席唱对台戏？现在，他深深地感觉到，上边这伙和毛主席唱对台戏的人，从解放后到现在，一直推行着一条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这条路线骨子里的货色，就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目前工作组执行的，就是这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煤油灯跳动着旺盛的火苗，王永幸的心里翻腾着激动的潮水。他把记录着党的基本路线的笔记本紧紧贴在胸前，一股战斗的激情灌注全身。他自言自语地说：“有毛泽东思想指引，我要挺起身子和这条反动路线斗争到底！”

第二天下午，在大吕家小学教室，王永幸领着党总支委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同工作组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会一开始，王永幸就对工作组的负责人质问说：“我问你，你们工作组，不领导我们斗阶级敌人，斗资本主义倾向，却对干部打击一大片，你们搞四清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你们把贫下中农甩在一边，却一屁股和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坐在一条板凳上，你们搞四清，到底依靠谁？你们口口声声说的是‘桃园经验’，闭口不谈毛主席的指示，不讲农业学大寨，你们对毛主席关于四清的指示和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到底是什么态度？”这一连串的质问，把工作组负责人问得坐立不安。但他定一定神之后，马上神气十足地说：“四清解决什么问题？当然是解决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啦！大寨嘛！最近听说这面红旗的旗杆里面生虫虫了！‘桃园经验’可没有错，谁反对‘桃园经验’，就是反革命！”



王永幸一听，火冒上来了，把帽子使劲往桌上一摔，大声说道：“不管是谁，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就要坚决反对！”

“你……你敢！”工作组负责人一听王永幸把矛头对准了刘少奇，以及那个“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臭不可闻的“桃园经验”，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只好把手一扬宣布：“散会！”

擎旗人劈波斩浪，贫下中农斗志倍增。工作组要贫下中农学“桃园经验”，贫下中农就组织起来学习毛主席的红宝书，学习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工作组要依靠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整干部，贫下中农就愤怒地揭露他们的原形真相。工作组硬逼干部承认多吃多占，干部就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坚持斗争。

一天早饭后，口子村党支部书记老战，急忙跑到圈子村，向王永幸汇报了这样一个严重情况：工作组不顾口子村贫下中农的反对，强行扣减了全村干部的工分，他们把扣下的工分逼着贫下中农分，贫下中农拒绝说：“这些工分不能要，我们心里明白，俺大队的干部在王永幸的带领下，一直是‘送礼不要，请客不到’，没有多吃多占的现象。”结果工作组把扣下的工分分给了地主富农。王永幸听完汇报，气得牙齿咬得格格响，再这样下去，政权就会落到阶级敌人手里，资本主义就会复辟。于是他马上从笔记本上撕下了一张纸，给工作组负责人写了一封尖锐的短信：

“×××，你们这样做，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你们要负全

部的责任!……”

这是一封战斗的信，是和错误路线决战的宣言，它象一发重型炮弹，炸向刘少奇“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一封宣誓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决心书，表达了王永幸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怕撤职，不怕坐牢，不怕砍头的坚强决心。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工作组负责人见到这封信，顿时暴跳如雷，一面向上汇报，一面研究对策，并气势汹汹地跑到圈子村质问王永幸。

“我们是中央派来的工作组，你反对我们，就是反对中央，反对四清运动……”一顶顶吓人的帽子铺天盖地而来。

面对工作组的恐吓和威胁，王永幸毫不畏惧，坚定地回答：“没有什么了不起，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脑袋掉了碗口大的疤！”

心中升起红太阳，心红胆壮志如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气焰被打下去了，王永幸和下丁家的贫下中农在斗争中越战越强！

四

一九六五年的春天来到了，严冬的冰雪，在金色阳光的照耀下，化成了淙淙的流水，欢唱着，奔向泳汶河，多么大好的春光啊！

就在这美好的季节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传到了下丁家。《二十三条》指出：四清运动要解决的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打击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王永幸手捧《二十三条》，热泪滚滚。毛主席啊，毛主席！您老人家高瞻远瞩，洞察一切，您主持制定的光辉文件，字字句句说到贫下中农的心坎里。学习了《二十三条》，王永幸的思想又爬上了一面陡坡，他懂得了：那一伙从解放后一直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人，就叫做：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有在上边的，也有在下边的；他们上下勾连，狼狈为奸，要把中国拖到资本主义的绝路上去。党内走资派的累累罪恶，罄竹难书呀！

《二十三条》下达后，广大干部从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解放出来，无限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可是，有的人由于对工作组的所作所为有怨气，不愿意再当干部了。王永幸、张书勤热情地向干部们做工作，他们说：“是谁在四清中打击革命干部、群众，保护阶级敌人的？是谁十多年来一直推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把新中国拖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让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再吃二遍苦，咱们能够答应吗？现在，咱能撂挑子不干吗？咱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他们斗到底！……”

王永幸、张书勤的话，又把干部们的劲头鼓得足足的。他们表示：要继续干，更好地干！一定要同党内那伙反对毛主席的坏家伙算总账，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命根子！

为了彻底贯彻《二十三条》的精神，把下丁家的四清运动进行到底，广泛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上级又派来了新的工作组。新工作组进村以后，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紧紧地依靠党总支和贫下中农，带领广大群众彻底批判了刘少奇“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入进行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现实，深刻地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使他们更加分清了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他们重新整顿了党组织，并且吸收了一批贫下中农的优秀分子加入到党组织中来。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进行批评教育，让个别有经济问题的干部进行了退赔。

党总支又一次重申了“请客不到，送礼不要，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向干部提出了防修防变的更高的要求，还重新进行了财务的清理，调整了财管人员，建立了民主理财制度和财经管理制度。

在深入进行社教运动的时候，党总支又组织群众掀起了大学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并且建立了切实可行的学习制度，组织了二十六个学习小组。不论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家庭院落，不论是在夜校，还是在炕头学习班，到处都是一派生气

勃勃的学习景象。

就在这一派大好形势下，王永幸受广大贫下中农的委托，到大寨去参观学习。在大寨他看到：大寨人民从合作化以来，一天也没有放松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顿过在政治、思想、经济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天也没有放松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回顾下丁家所走过的战斗路程，哪一步不是充满着斗争呢！可是比起大寨来，斗争性还差得很远啊！从大寨回来后，王永幸带领党总支的全体成员，对照大寨的基本经验，进一步总结了下丁家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并向全县发出了学大寨的倡议书。

他们还进一步学习了大寨人坚持大干社会主义、战天斗地的英雄事迹，联系下丁家这些年来的斗争实践，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山河要想变，就得艰苦干，要创社会主义大业，就要舍得吃大苦，出大力，流大汗。

群众的劲头起来了，个个磨拳擦掌，要大干一场。

在大寨贫下中农革命精神的鼓舞下，“向高山要水，向石砌要地”的战斗，以更大的气势展开了。

圈子村东的高山腰中悬挂着八十多亩梯田浇不上水，为了彻底摆脱干旱，党总支决定在高山上修一座水库。

在高山上修水库没有土，没有沙，必须垒石坝，工程非常艰巨。可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四清运动锻炼的下丁家贫下中农说：“就是需要铁坝，咱们也要把它铸起来！”

党总支把这项工程交给了民兵。在民兵排长王中学的带领下，三十多个民兵信心百倍，登山奋战。战斗一开始，就

遇到了困难，开大坝基槽需要打眼放炮，可是多数民兵不会干。他们就“从战争学习战争”，民兵干部带头掌钎打锤。有的人一天手上挨五六锤，鲜血直流，照样干。在干部的带动下，谁也不甘落后，一气干了四十多天，打了三百五十多个炮眼，终于把大坝基槽挖成了。

但是更艰巨的任务，是要把修大坝用的水泥、沙子，从三里路的山下，一包包一担担地挑上山。山高路陡，单人空行也要冒汗，可是，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的下丁家民兵，提出了“山高路陡精神抖，上山不空手，人人挑担走”的口号，一担就挑一百八十多斤。妇女干部小王被称为“铁脚姑娘”，施工中，干得火热，打眼放炮学着干，扛石挑沙抢着干。挑沙时她卷着裤腿赤着脚，踩着石头碴子，来来回回在陡坡上一天就跑百多里。

工地上热火朝天的干劲，鼓舞着全体干部社员的斗志，他们纷纷行动起来，支援修水库。年过半百的老贫农挑着沙子也爬上了高山。儿童们放了学，书包顾不得放，就去给工地抬水泥，就连驻地解放军，也来到工地上拼命干起来。

就这样，突击队和群众相配合，苦干实干，把高山水库建成了。

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下丁家人民乘社教运动的东风，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革命加拼命，修建了四座高山水库，三座扬水站，打了两眼大井，修成了五里多长的环山渠道。同时改造了沙石薄地四百多亩，整出了高标准梯田二百多亩，初步建成了一个以蓄水自流为主的山区水利网，使

全大队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耕地变成了水浇地。

红旗指处歌连天，山山水水换新颜。一九六五年年底，是下丁家人的大喜日子。一天，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和铁姑娘郭凤莲来到了下丁家。人们跑到山村外，迎接几千里外的亲人到来。

在带领大寨的亲人参观时，由于冰雪覆地，山路又不好走。主人遗憾地说：“路不好走哇！”陈永贵同志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就是从这不好走的路上走过来的！”

是啊！革命道路不平坦，征途处处有斗争。要实现那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哪能不经过披荆棘、斩恶浪的斗争呢！听了陈永贵同志的话，人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参观了下丁家的山河新貌，陈永贵同志满怀激情地评价说：“看山山青，看地地平，沟沟有水，库库相连。看人精神焕发，干劲十足！”这对下丁家人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他们干劲更足，信心倍增，决心跃马扬鞭，努力作战，让大寨精神在凤凰山下放射出更加灿烂夺目的光彩！

山村风雷

—

一九六六年，一声惊雷震天地，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红卫兵从四面八方来到了下丁家。

下了家和全国各地一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

一天，在下丁家村头大路口上，围着黑压压几百号人，争着看红卫兵小将转抄来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金字写在红纸上，每个字都闪着耀眼的光芒，映红了天，映红了地，映得每个人的脸上红彤彤！

“是毛主席的大字报！”

“是毛主席的大字报！”

人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交换着兴奋的目光，传送着激动的声音。

站在前面的人，用激越高亢的声音读了起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战斗号令，象催阵的战鼓，响在贫下中农的心里头。人们读着毛主席的大字报，回忆着下丁家十多年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风风雨雨，心里越

来越亮堂了。原来，解放以后鼓吹“发家致富”“发展富农经济”的，合作化时大砍合作社、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三年困难时期刮“三自一包”歪风的，四清时抛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都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对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累累罪恶，下丁家人民再也忍无可忍了！轰垮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下丁家人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炮打司令部”的战斗号令，下丁家人民怎能不欢欣鼓舞？毛主席号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下丁家人民怎能不闻风而动！他们和从全国各地到这里来串连的红卫兵一起，向着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猛烈开炮！

这时，下丁家大队党总支书记王永幸因严重的肝病住了医院。贫下中农多么希望王永幸早日出院，带领他们向资产阶级司令部进攻啊。

党总支副书记张书勤受贫下中农的委托，到烟台看望王永幸。

王永幸心里更着急。耳畔，大海的涛声一阵接一阵；窗外，“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口号一声连一声。王永幸，这个十几年来一直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冲锋陷阵的战士，在病床上怎能躺得住？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当时，王永幸学习了

《通知》，心里就象点了一把火。后来，他住进了医院，红卫兵给他送来了毛主席的大字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王永幸的耳边就好象时刻响着进攻的号角，战斗的激情更加按捺不住了。但他重病在身，又不得不躺在病床上。他一遍又一遍地学习着毛主席的大字报，学习着党中央的文件，有时剧烈的肝疼使他昏迷过去，手里还握着学习材料。

一天傍晚，当王永幸又一次从昏迷中醒来时，睁眼一看，张书勤正满眶泪水地站在自己的床前。王永幸一下子坐起来，拉着张书勤的手，眼里闪着兴奋的光彩，说：“老张，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是啊，终于来到了！”张书勤赞同地点着头。

王永幸把张书勤拉到自己的床边坐下，激动地说：“老张啊！解放后咱们跟着毛主席奔社会主义，每到革命发展的节骨眼上，党内总是有人想拉着我们走回头路。过去，咱们没少议论过：这些坏家伙是谁呢？四清时，毛主席就告诉咱：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毛主席又给咱指出了：这些走资派以刘少奇为头子组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上边有头子，下边有基础，从上而下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四清时咱们看到了，这些家伙搞起资本主义复辟来，真凶啊，简直象刮台风一样！咱贫下中农早就盼着跟他们算总账。现在，毛主席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是对这个作恶多端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反击，真是太及时了！”

停了一下，王永幸又拿起那本不知学了多少遍的《十六条》，指着第五条，继续说：“你看，‘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党中央给咱指出了斗争的大方向。老张，回去要认真组织大家学习《十六条》，带领群众造那些走资派的反！你想想，苏联是怎样变修的？还不是因为赫鲁晓夫那些走资派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吗？走资派，是地富反坏的靠山，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如果不造他们的反，多少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就会变成资本主义，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就会重陷火坑！咱们要接过毛主席交给咱们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家里的同志也是这么想的，”张书勤接着说：“可是，有一部分同志觉得过去工作中受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思想上有包袱。”

“有包袱就甩掉嘛！”王永幸一听这话心里很着急，又翻开《十六条》，与张书勤一同学起来：“你看，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要‘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过去工作有缺点，有错误，这不怕，只要我们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从思想上改正错误，就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带领群众造走资派的反！再说，咱们一些同志过去工作中受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认识了，就更能看到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批判修正主义就会更有力！”王永幸停了一下，沉思地说：“好吧，咱们干部造反，就先从

肃清修正主义路线在自己身上的流毒开始吧！”

两个人一边学习着《十六条》，一边热烈地谈论着。直到时钟敲了午夜一点，护士再一次催促他们熄灯，他们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了《十六条》。

第二天天刚亮，张书勤就急着起身回去。王永幸又把老张叫到床前，叮嘱道：“老张，我们大队过去取得了一些成绩，应当归功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归功于贫下中农。我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告诉贫下中农，欢迎他们批评！”

张书勤回到下了家，组织广大干部认真学习《十六条》，并把王永幸的话转告给大家。广大干部提高了认识，解除了顾虑，决心走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起，造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反！

村村队队，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村村队队到处都可以见到广大干部自觉革命的身影。

大吕家村有一天开批判会，张书勤对大家说：“我是总支副书记，过去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欢迎大家对我批评帮助。”接着，他联系自己过去的工作，带头分析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危害，批判了刘少奇推行这条路线的罪行，并引导群众对自己进行批评帮助。群众批评了他三宿，提出了许多意见，他心里很高兴，虚心地一一作了检查。

党总支副书记陈天福，在大陈家村积极带领群众向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火。他为了肃清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主动登门征求意见。他踏遍了全村几十户贫下中农的门槛，

坐遍了全村几十户贫下中农的炕头。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咱们的干部主动接受群众的批评，就象是好钢又淬了一遍火！这样的干部俺一百个放心！”

大吕家村支部书记张秉义，一连九个晚上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张秉义高兴地说：“我为革命拉车，没拉好，群众抽我几鞭子，应该！肃清了工作中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才能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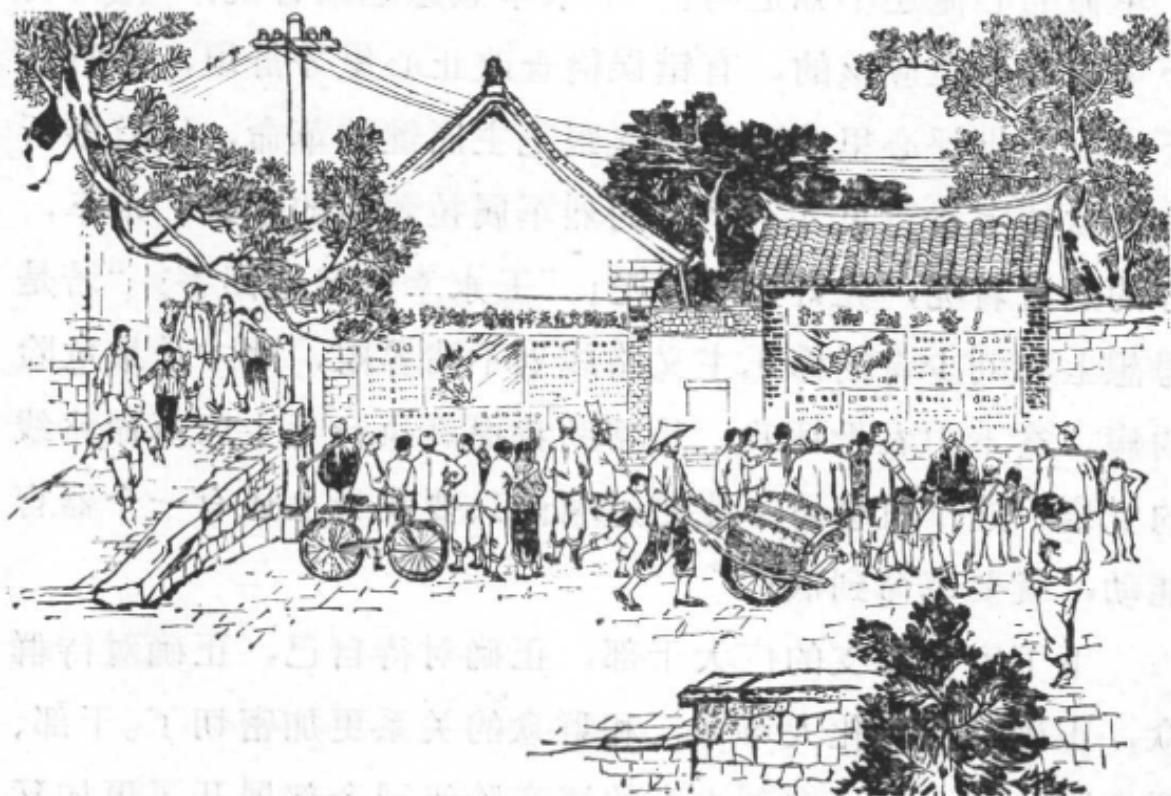
这时，王永幸这个急性子人，在医院里再也躺不下去了，病刚有好转，就不顾医务人员的劝阻出了院。他一回来，就走这个村，串那个户。哪个村开会，他就到哪里去检查；哪个社员有意见，他就到哪家去听取。由于肝疼剧烈，他经常托着肚子，贫下中农心疼地说：“永幸，十几年来，你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心俺还不知道吗？”王永幸诚恳地回答说：“俺为贫下中农操心是应该的，有错误检查改正心里才舒坦，多听贫下中农的批评心里才亮堂。要跟毛主席继续革命，只有多听取群众的宝贵意见才行。”有的烈军属拉着他的手说：“永幸，你的病重着呢，先好好养养吧！”王永幸坚定地回答：“若是思想上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划不清界限，那才是最危险的病。贫下中农批评我，是帮助我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觉悟，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啊！只要我身上还有一个器官能动，就要革命到底！”

下丁家党总支的广大干部，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干部、群众团结在一起，向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展开了更加猛

烈的进攻！

村村举起了革命造反的红旗，处处摆开革命大批判的战场！墙壁上，“打倒刘少奇”的标语，一条条，一幅幅，每条每幅都是掷向走资派的愤怒投枪；专栏里，批判刘少奇的诗文，一篇篇，一首首，每篇每首都是射向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型炸弹！男女老少都参加了战斗，整个下丁家大队沸腾起来了！

在大批判会上，被人称为“活愚公”的老贫农王万珍愤怒地说：“旧社会，咱贫下中农被地主、富农踩在脚底下，被三座大山压在山下边。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咱翻身闹革命，又领咱走上了合作化、公社化的幸福大道。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有了咱贫下中农的今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咱



们的命根子，金不换！可刘少奇这个大坏蛋，处处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时时都想把咱贫下中农往资本主义的死路上拖。什么发家致富、发展富农经济，什么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名堂真不少，一句话，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把咱贫下中农重新搡到地主富农的脚下，让咱重新当牛马。刘少奇是咱贫下中农的死对头，我老汉要跟他斗到底！”

在治山治水的工地上，女青年陈文珍批判说：“刘少奇反对咱们学习大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胡说只有‘工分挂帅’、‘物质刺激’，才能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这是对咱贫下中农的恶毒诬蔑和攻击！大寨的贫农社员赵小和，当拉石头的大车出危险的时候，他为了抢救辕马，壮烈牺牲。请问这样的积极性，是工分能够调动起来的吗？咱们的总支书记王永幸，身患多种疾病，但他为革命东跑西颠，一天也闲不住。这样的积极性是物质能够刺激出来的吗？咱贫下中农干活不是为工分、为金钱，而是为革命！咱站在凤凰山，看到的是全中国、全世界。想的是为全中国、全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刘少奇鼓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他要咱实行的是资本主义挂帅，他要刺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我们贫下中农决不上他的当！”

在大批判专栏上，民兵战士战德利写道：“刘少奇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自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地主没地了，富农不富了，资本家没有资本了，大家都靠劳动吃饭，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地富反坏是被我们打倒了，可他们是屋簷底下的大

葱，皮焦叶烂心不死，时刻都在想复辟，想变天，咱大队的阶级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更是无孔不入，一有机会，就拉咱走资本主义的邪道。这说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不是没有了，而是变得更复杂更曲折了！刘少奇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是给革命人民打麻药针，灌迷魂汤，让咱们昏昏沉沉睡大觉，他们好乘机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决不能只想着山河要改观，忘记了阶级敌人要变天，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粉碎刘少奇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阴谋！”

.....

革命大批判象汹涌的浪涛，荡涤着修正主义路线的污泥浊水；象咚咚的战鼓，鼓舞着贫下中农大干社会主义的雄心！下丁家贫下中农豪迈地说：“刘少奇越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越是要大干社会主义！”一九六六年冬天，他们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在摆开革命大批判战场的同时，又在大吕家村南和圈子村西的两处泳汶河滩上，摆开了移沙搬石填土造地的战场。

工地上，大批判专栏琳琅满目，革命大标语鲜艳火红。白天人们大干一天，晚上又挑灯夜战。有一天，刮了一天的西北风，气温下降到零下十六度，总支决定让大家晚上停工休息。但晚上到河滩一看，人们又都齐刷刷地来到工地。七十岁的“活愚公”王万珍也扛着镢头来到河滩，胡子上结了一串串冰渣。青年们说：“你年纪这么大了，还来干什么？”王万珍笑呵呵地答道：“我给帝修反挖坟来了！”

下丁家贫下中农苦战一冬春，在圈子村西河滩上造出了

十六亩地，在大吕家村南的河滩上造出了二十二亩地。在当时，这是下丁家最大的两个地块。

一九六七年春天，毛主席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经验，发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战斗号令。下丁家贫下中农和全县工人、贫下中农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夺了黄县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建立了黄县革命委员会。王永幸被选为县革委副主任、下丁家大队革委会主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道破浪前进，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

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节节胜利，使一小撮阶级敌人和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惊慌失措。他们象历史上一切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反动派一样，疯狂进行垂死挣扎。

正当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陷于灭顶之灾的时候，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四人帮”一类的蛀虫，刮起了一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妖风，妄图混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界限，破坏革命群众之间的团结，搞垮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当这阵反动潮流袭来时，黄县刮起了一股冷风：“下丁家红旗是假的！”走资派和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砍掉下丁家这面农业学大寨的红旗，为在全县复辟资本主义扫清道路。

这可乐坏了下丁家大队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他们象雨后的蚯蚓，在地下蠕动起来了！

一天晚上，在下丁家村，一个鬼影闪进了一个黑洞洞的大门。

来的什么人？进的是谁家门？

来的是丁玉年，找的是丁学考。

丁学考，十几年来在村里亮出来的招牌是“老区长”“老贫农”“老党员”，实际上是一个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背叛了革命的罪恶累累的老叛徒。一九三九年，丁学考混入党内，不久窃据了我抗日区队长的职务。一九四二年被日本鬼子逮捕后叛变投降，出卖了我党三十一名地下党员。以后日本鬼子放了他，他欺骗组织，重新混入党内，充当敌人的内奸。解放后，他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一直不顺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革命群众揪出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下丁家贫下中农也给他贴了很多大字报，就象一声炸雷在丁学考的脑袋上爆响。面对刘少奇这个大叛徒的下场，想想自己背叛革命的历史，丁学考更是惶惶不安。正在这时，刮来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妖风，丁学考就象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抓住了一片木板，心里不禁一阵狂喜。他咬牙切齿地诅咒道：“你们要造反，要斗走资派，要挖叛徒，我就用这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法宝，布一个黑风阵，让你们斗不成，挖不出，还要把你们的权夺过来！”

丁学考要孤注一掷地大干一场，首先想到了被开除出党的坏分子丁玉年。于是，丁学考给丁玉年捎了个信，让他有

空来“叙谈叙谈”。

丁玉年听说丁学考找他，真是受宠若惊，连忙揣上了三瓶酒，五盒烟，急不迭地窜到了丁学考家。

丁学考正蹲在炕上得意洋洋地吐烟圈，大秃头就象一个大葫芦。丁玉年毕恭毕敬地站在炕前，说：“老区长，你找我有什么事？”

丁学考翻了一下眼皮，说：“玉年，我想问问你，开除你的党籍那阵儿，说你偷了集体的麦子，是不是真有这个事？”

丁玉年两眼滴溜一转，马上说：“老区长，你想，我哪能干那种事？”

“我看也不会有这个事；这还不是王永幸为了独揽大权，对你的陷害！”

丁玉年一听，感激涕零地说：“还是老区长水平高呀，一眼就看出了问题！”

丁学考继续阴阳怪气地说：“最近，从外边传来了个新精神，叫‘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根据这个精神，我首先就怀疑起你这个事。另外，下丁家这面红旗是真还是假？也应当大胆怀疑。你要站出来跟他们干！”

丁玉年指指自己头上的破帽子说：“我头上还戴着这个（指坏分子帽子）呢，公开站出来恐怕不方便！”

“嘿嘿，”丁学考奸笑道：“不干，怎么能摘掉你那坏分子的帽子呢？现在，有人支持我们了，只要证明下丁家这面红旗是假的，就能打倒王永幸。打倒了王永幸，不光能摘掉

帽子，党籍也能恢复。胆小不得将军做，美事一桩，就看你敢不敢干了！”

丁玉年壮了壮胆说：“老区长，只要你挂帅领着干，我就给你打先锋！”

两个人交头接耳地一直唧咕了半夜。第二天，他们就象打足气的蛤蟆一样，肚子一鼓一鼓地朝着贫下中农叫了起来：

“下丁家这面红旗是假的，是吹起来的！”

“要彻底揭开下丁家红旗单位的内幕！”

“要把下丁家的历史颠倒过来！”

黑风吹，狼出洞。平时那些耷拉着脑袋好象是老老实实的地富反坏分子，这时都一反常态，一个个脑袋支楞起来了。

经过长期锻炼考验的下丁家贫下中农，一眼就看出了阶级敌人复辟变天的阴谋诡计。他们纷纷找到大队革委会，说：“四清刚开始时，工作组执行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就说咱下丁家红旗是假的，成绩是吹的。现在，又有人要砍红旗！他们对党内走资派不批判，不斗争，却说咱‘过去走的道路不对’，‘要把下丁家的历史颠倒过来’，这不明明是反对咱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吗？这又是当初刘少奇与地富反坏上下呼应，妄想变天走回头路的阴谋诡计！”

“四清时，就数丁学考跟着那个工作组跑得欢，这一次，又是他带头出来乱嚷嚷！”

“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社

会主义道路，我们就跟他斗！”

贫下中农一言一语，使革委会的成员们深受教育和鼓舞。“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对下了丁家当前出现的这股邪风，看得是多么透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决心，是多么坚定啊！

王永幸手捧《毛主席语录》，对大家说：“解放前夕，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现在，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阶级敌人也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必然进行疯狂反扑！我们要牢记毛主席所说的‘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坚决把敌人的反扑打下去！”

“走，我们找他们辩论去！”人们齐声说。

在丁学考几个人的“办公室”里，人们严正质问丁学考：

“丁学考，我问你：下了丁家大队贫下中农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心走社会主义道路，刘少奇几次刮黑风，俺贫下中农都顶住了，俺贫下中农走的路子有什么错？”

“俺贫下中农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学习大寨大队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凭着一副肩膀两只手，硬是叫穷下了丁家变成了富下了丁家。这红旗有什么假？”

“过去，下了丁家是有名的旱死蛤蟆、饿死老鼠的穷地方。

现在，看山山青，看地地平，沟沟有水，库库相连，贫下中农有吃有穿，每年还给国家贡献几十万斤粮食，几百万斤水果。这成绩是吹的吗？”

“谁要想复辟资本主义，我老汉就跟他拼命！”在鼎沸的人声里，一个老贫农站起来说：“旧社会，咱贫下中农过的是啥日子？那真是吃猪食，干驴活，血泪淹心呀！那时节，我给地主扛了十几年大活，地主家里是肉山酒海，我家里几天都揭不开锅盖，铁锅里都长了青苔呀！地主穿的是绫罗绸缎，可我们两口子只混上一条破裤子，谁出门谁穿上。再看看现在，贫下中农走上了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全都过上了好日子！就拿我家来说吧，住上了新瓦房，盖上了新被褥，银行有存款，家里有余粮，过去连作梦也没有想到有今天啊！这都是社会主义给咱带来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带来的！谁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贫下中农坚决不答应！”

“巴掌拦不住泳汶河，指头戳不倒凤凰山；社会主义的根子扎在俺贫下中农的心里头，谁想阻止俺走社会主义道路，那是白日做梦！”

人们的严正质问象一支支利箭，射得丁学考躲无处躲，藏无处藏。只见他搔了搔大光头，硬撑出一个“老干部”的架势说：“老少爷们！咱们干革命，最要紧的，就是紧跟上边的指示！我是一个老党员、老干部，不是没有根据就乱说乱道的！上边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下丁家大队难道不包括在这个‘一切’里头？”

丁学考的歪巴理刚讲完，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陈文珍带头质问道：“丁学考！你要‘怀疑一切’，你自己该不该怀疑？你要‘打倒一切’，你自己该不该打倒？”

陈文珍一带头，人们又七嘴八舌地质问道：“你的那个上边，是谁？准是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丁学考被质问得瞠目结舌，无言可对！

人们走了之后，丁学考、丁玉年四眼相对，面面相觑。丁玉年心有余悸地说：“他们人多力量大，咱们对付不了呵！”

丁学考眼珠一转，给丁玉年打气说：“玉年，别泄气！咱得串通串通，把他们的人一个个拉过来！”

于是这两个坏家伙就做开了所谓“思想工作”了！

丁学考有一天登上了本村的一个生产队长的大门，假装亲热地说：“哥们，咱们是同姓兄弟，今天我来找你说几句知心话。咱姓丁的是一大户，下丁家大队的权，应当咱姓丁的掌！你跟着王永幸跑，总有一天要犯错误！”

这个老队长是一九三九年入党的老党员，他一眼看穿了丁学考的阴谋，当场驳斥说：“同姓的不都是一家人！共产党员为的是解放全人类，不是为个人。权，应当贫下中农掌！”丁学考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地走了。

又有一天，丁玉年在街上碰到了张书勤。丁玉年瞅着一副甜不索的脸，说：“老张，你是咱大队威信最高的干部，这个谁都知道！就说我这顶帽子吧，戴了八九年了，我从来没有怨过你，我知道那是王永幸给我戴的。你只要想法给我摘

了这顶帽子——”

没等丁玉年说完，张书勤炸雷似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盗窃集体仓库的是不是你？与富农分子合伙盗卖大梨，挖社会主义墙脚的是不是你？偷盗小麦两千多斤的，是不是你？贪污受贿的，是不是你？你想翻案，难上难！你想挑拨干部间的关系，办不到！”丁玉年直吓得满脸流汗，弓着腰，连连说：“我该死，我该死，惹你生气。”夹着尾巴窜了。

还有一次，丁学考遇到了王永幸。丁学考说：“老王，其实，我对你并没有多大意见。只要你能认个错，咱们共同掌权，也就算了。不然，你对抗上边的指示，可要犯大错误！”

王永幸一听，牙咬得咯嘣响，愤怒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站着是一根，躺着是一条！你让我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错吗？那是梦想！你这样卖力地为资产阶级司令部效劳，要好好考虑考虑你的下场！”

丁学考好象一头撞到了石墙上，抱着脑袋滚了。

丁学考、丁玉年上窜下跳地活动了几天，眼看着贫下中农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决心就象凤凰山一样不可动摇，直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丁学考咬牙切齿地说：“是王永幸把贫下中农捏成了一个团，不打倒王永幸我死不瞑目！”丁玉年也恶狠狠地说：“王永幸是棵大树，砍倒大树有柴烧！”

丁学考、丁玉年又施展出新的一手，他们象两只苍蝇一

样，飞东飞西，嗡嗡地叫嚷：“王永幸一向对抗上级领导，是反党分子，是反革命！”“要坚决打倒王永幸！”他们还无中生有地捏造了王永幸的黑材料。

面对阶级敌人的恶意攻击，一件件往事涌上了贫下中农的心头：

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占据了龙口镇。一个青年勇敢地在墙上写下了“打倒日本鬼子”六个大字，只吓得鬼子、汉奸心惊肉跳。那是谁？那是在一个商店里当小伙计的王永幸。

一九四八年，解放兖州的战场上，一个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带头向国民党冲杀。子弹打伤了他的胳膊，鲜血染红了衣衫，但他照常狂风闪电般向敌人扑去。那是谁？那是解放军战士王永幸。

一九五二年，正当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的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走出这家进那家，宣传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个体经济是狗尾巴上的露珠，一甩就掉；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象大树一样，风吹雨打不动摇！”这铿锵的声音，至今犹在贫下中农耳边缭绕。那是谁？那是贫下中农的好带头人王永幸。

大年三十的晚上，寒风刺骨。一个步履矫健的身影，翻山越岭来到小北夼深山饲养棚里，替饲养员照料牲口，让饲养员回家过年。那是谁？那是贫下中农的贴心人王永幸！

二十多年来，王永幸跟随毛主席革命，永往直前。说王永幸是“反革命”，这不明明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吗？

王永幸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限热爱。而对党内走资派和修正主义路线，敢斗敢顶。说王

永幸“对抗上级”，是“反党分子”，这不明明是站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说话吗？

六十四岁的老贫农陈元功听说丁学考诬蔑王永幸，气愤极了。他想起自己从十岁讨饭，一直讨到十七岁，以后又给地主打活的苦难家史，再想想解放后王永幸带领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下丁家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心里明白了：阶级敌人不是对王永幸有仇，而是对社会主义有仇。他想去找丁学考辩论，可是，自己有口吃的缺陷，说话困难。他急得睡不下觉，吃不下饭，怎么办？一天，他看到宣传队在村上演出节目时，用快板作宣传，老汉想：有了！我不是也可以把下丁家大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成绩和王永幸的先进事迹说给大家听吗？这老汉过日子最节俭，平常舍不得花一分钱。这次，他却起了一个大早，来回跑了五十里路，从黄县城里买来了一付新竹板。他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编成了一首快板，逢人就演，逢人就唱：

打竹板，开了言，
我把王永幸谈一谈。
王永幸，铁柱子，
贫下中农的好领班。
革命红旗举得高，
主席教导记心间。
顶黑风，战恶浪，
越是艰险越向前。
改造自然打先锋，

荒山变成米粮川。

人人向他来学习，
个个称赞好党员。

激越的快板，压倒了阶级敌人的嚎叫！

有的老贫农，听说丁学考、丁玉年要打倒王永幸，心想：这伙披着人皮的家伙，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在斗争最紧张的日子里，每当深夜，就为王永幸暗中放哨。

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战胜了阶级敌人破坏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丁学考、丁玉年见他们的倒行逆施得不到贫下中农的支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法宝在下丁家不灵，便象泄了气的皮球，霜打了的地瓜叶，塌了架。

三

正当下丁家贫下中农迎头痛击阶级敌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反扑，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王永幸被选为“九大”代表，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王永幸开完“九大”，从毛主席身边回来啦！这个消息象春风似的吹到了每一个贫下中农的心坎里。

王永幸刚一进村，在田间劳动着的人们就齐乎拉飞奔拥来，把王永幸团团围住，大伙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约而同地问：“见到毛主席了？”

王永幸高兴地说：“见到了，见到了！”

“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可好啊！”

王永幸一迭连声地笑着回答：“好！好！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很好，非常健康！”

大家紧紧地围在王永幸身边，有的禁不住热泪盈眶，他们围着王永幸，笑着，问着，分享着见到毛主席的幸福。

王永幸看着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望着他们曾经付出多少血汗才修起来的层层梯田，他眼眶里饱含着激动的泪水，说：“同志们，我虽然身在北京，可总惦记着咱下丁家的斗争，惦记着大伙哪。”

王永幸水没喝，脚没歇，坐在地头上就讲起了“九大”的盛况，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听到毛主席的指示，人们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一会儿，围拢来的人更多了，一个宣传“九大”精神的地头会就开起来了。

当天晚上，又召开了社员大会。王永幸在大会上说：“毛主席号召咱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我们下丁家大队的全体干部、社员，一定要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们前一段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走资派和阶级敌人还会进行垂死挣扎，我们不能丧失警惕。我们要在‘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指引下，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继续和阶级敌人战斗！”

毛主席的指示，象雨露一样滋润着大家的心。

毛主席的指示，象战斗的号角，进一步鼓起了大家的斗志。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成了大家共同的心愿。

亲自聆听了毛主席指示的王永幸，带头做团结的模范。一天晚上，月光皎洁，王永幸吃罢晚饭就把两个干部和另一个生产队长叫到饲养棚谈心。他一面讲团结起来的伟大意义，一面主动地作自我批评。他的话是那样诚恳，态度是那样真挚，他越讲，大家越激动，最后，四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有个同志感动地说：“今后，咱要好好团结起来干革命，狠抓革命，猛促生产。”

在王永幸的带动下，下丁家广大革命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

革命群众的团结，预示着阶级敌人的垮台。在声势浩大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中，下丁家革命群众通过内查外调，彻底弄清了丁学考的历史，挖出了这个隐藏二十多年的叛徒。

这天，天高气爽，大队召开了批判丁学考的大会。会上，宣布了丁学考的罪恶历史。

丁学考原任我区队长，一九四二年，在某村河滩睡觉时，被日本鬼子包围。这个贪生怕死的可耻叛徒，将自己携带的两颗手榴弹偷偷地掖到了一个群众的苦子底下，日寇搜出后当场用刺刀将这个群众捅死了。

丁学考被捕后，为了保全他那条狗命，向敌人供出了我三十一名共产党员。其中两名同志因此被捕，壮烈牺牲！

丁学考为了日后充当日本鬼子的内奸，向日本鬼子献计，要求将他押往东北然后再行释放。丁学考从东北回来后，编造了一通从监狱的阴沟里爬出来的历史，重新混入了革命队伍。

一九四八年，丁学考因贪污巨额公款，被开除党籍、政籍。

丁学考回乡后，见人说人话，见鬼打鬼腔，拉拢腐蚀了一个区里的干部，非法恢复了党籍，并于一九六三年骗取了退休手续，并混入干部队伍。

一桩桩，一件件，铁证如山，彻底剥掉了丁学考“三老”的画皮，露出了叛徒的丑恶面目。

丁学考的罪恶历史，激起了贫下中农的强烈义愤。

“打倒刘少奇！”

“打倒叛徒丁学考！”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从人群中迸发出来的口号声回荡在下丁家上空。

这口号，宣布了阶级敌人的又一次惨败！

这口号，表明了人民群众团结、战斗的胜利！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象炼钢炉里熊熊的烈火，炼出了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社会渣滓，炼得贫下中农象钢铁一般更加坚强！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下丁家贫下中农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更加深刻了。解放以后，经过合作化和人民

公社化运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虽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代替了，但是，象丁学考、丁玉年这样的阶级敌人还是存在，这个阶级还在，他们时刻都想复辟变天。同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党内还会出现象刘少奇这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走资派，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从内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比公开的阶级敌人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只有时刻不忘党的基本路线，掌握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坚决的斗争，才能不变修，不复辟，不倒退，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红旗在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下丁家大队党总支和革委会带领群众大治沫汶河，大战凤凰山，自力更生架起了二十七华里的高压电线，整造了一批又一批硬骨头地，到一九六九年，使“两平、石堰、能排、能灌”的高产稳产田，达到了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五。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保证了粮食产量的逐步增长，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的四年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九百五十斤。

一九七〇年的秋天，下丁家又是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

大丰收，极大地鼓舞着下丁家广大干部和社员。他们决心更加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夺取更大胜利！

然而，就在这大好形势下，也有一少部分人，头脑不那么清醒了。他们说：“这几年，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了阶级敌人，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以后只抓好生产就行了。”也有的说：“山高总有个顶，路长总有个头，咱这样的山窝地，今年就能过千斤，再还能怎么高！”

这虽然是一少部分人的思想，却引起了党总支的高度重视。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下丁家大队党总支深深感到：如果头脑里松了阶级斗争的弦，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思想，就会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生产就有倒退的危险。他们决定：发动群众，进一步深入学习大寨经验，及时克服这种思想倾向。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参加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并且参观了大寨的党总支副书记张书勤就要回来了。大队党总支和下丁家贫下中农多么盼望他赶快带回党中央的指示，带回大寨和兄弟单位的新经验！

正在路途中的张书勤更是急不可待地往家赶。这次参加北方农业会议，使他心里装上了干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更高的目标。参观大寨时的一幕幕动人景象，时时在心里翻腾。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八年他曾两次到大寨参观学习，现在再到大寨，他惊喜地看到：大寨红旗更鲜艳，大寨山河更壮观。大寨人正在向新的高度攀登。为了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他们搬山填沟造平原，已经有近二分之一的土地可以用拖拉机耕作了。大寨人真是年年都有新套套，一步一重天啊！

老张想到这里，火热的心象是要燃烧起来。他细细地回味着在大寨时陈永贵同志向大家讲的那段话：“社会主义的新大寨，是同修正主义斗，同资本主义斗，同错误路线斗，同天斗、同地斗，七斗八斗斗出来的！”

是啊！路线是决定一切的！大寨之所以不断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关键就是他们认真执行了党的基本路线，狠抓两个

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不停顿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继续革命。老张两次到大寨参观，每一次都有新收获，这一次经过文化大革命，大寨变化更大了，老张对大寨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了。

老张不禁又想到了下丁家。自从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以来，下丁家大队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一步步深入开展，人的思想和自然面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但和大寨比起来还有着多么大的差距啊！此刻，他真想一步赶回下丁家，告诉社员们：大寨又给我们作出了新样子，闯出了新路子。

张书勤回到下丁家，立即召开了有各村党支部委员和群



众代表参加的党总支扩大会，向大家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有关指示，讲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大好形势，还具体介绍了大寨大队贫下中农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自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革命创高产的事迹。接着，为了找差距，王永幸、张书勤便领着与会人员上了山。

如今的下丁家，山青水绿，梯田层层。王永幸和张书勤率领着大家翻西山、爬东山，一不看青山绿水，二不看已经整好的高标准梯田，偏偏要在那些没有经过彻底治理的荒山上、河滩里停下脚步，指指点点，就地讨论。两天的时间，他们跑遍了所有的山头，所有的村庄，查出了应该继续整治的山地梯田有四百多亩，需要开发治理的荒山、河滩有六百多亩。特别是范家村，农田基本建设没有长远规划，只是小打小闹，修修补补，大队里拖拉机隆隆响，可范家的山坡上依旧是羊肠小道和分散地块，拖拉机上不了山，进不了地。水利建设也是守旧摊子，不想往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串完山，查完地，总支扩大会议又回到了办公室。王永幸、张书勤问大家：“比比大寨，我们怎么样？”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比起大寨来，我们差远了。”经过两天的串山查地，人人看到了同大寨的差距，因而异口同声地说。

“咱们差在哪里呢？”张书勤接着问。

这下子，会场上就象开了锅，人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从表面上看，咱和大寨的差距，那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咱整地还有空白点，咱的水利建设也没有真正过

关。咱八个村，农田水利建设有的搞得好，有的就特别差，这也是差距。可依我看，咱最根本的差距是在思想上！”

“解放以后，咱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住的破草棚，现在住的是新瓦房。过去穿的是烂布条，盖的是蓑衣片。现在，炕上堆着新被褥，身上穿着‘的确良’。过去出门拖的是要饭棍，现在走路蹬着‘大金鹿’。想到这些，有的人就象喝了四两酒，成天晕乎乎的。岂不知，这是压在咱思想上的一个大包袱呢！有了这个大包袱，怎么能学好大寨，怎么能进一步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呢？”

“生活好了，就骄傲自满，这说明为谁种田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咱种田，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了一个村，一个队的社员有吃有穿。而是为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如果是为了一个村，一个队，就会觉得亩产千斤，有吃有穿，应该满足了。如果树立了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就会懂得，过去取得的成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咱和大寨贫下中农比，就差在为革命种田的思想上！”

听着大伙热烈的发言，王永幸、张书勤和其他总支委员们心里十分激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的觉悟提高得是多么迅速啊！他们正想引导大伙进一步往深处认识问题，只见一个老贫农站起来，语调深沉地说：

“才解放那阵儿，咱贫下中农穷得叮当响，咱一心一意走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的路。那时节，资本主义的邪风往

咱耳朵里灌了不少，可咱贫下中农不理那个碴，因为咱懂得：‘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咱跟资本主义斗，硬是一步闪，一步雷，斗出了今天的下丁家。可现在，有些人的心思就变了。就拿农田基本建设搞得最差的范家村的干部来说吧。有人对他们说：‘粮食过千了，应该腾出手来抓钱了’，他们觉得有理；有人说：‘苦干了十多年了，应该松一松，改善改善生活了’，他们觉得中听。这样一来，一个心眼往钱眼里钻，资本主义怎能不泛滥，农田基本建设怎能搞得上去呢？现在，咱们生活好了，生产提高了，更应当注意抓好阶级斗争、防修防变啊！”

一场知心话，一场透地雨。老贫农的话，使大家又看到了新问题。会场上更加沸腾了，大家纷纷说：“老汉说得对，咱和大寨比，是一差思想、二差纲啊！”

接着，大家对范家村进行了分析，发现：范家村问题的根子就在党支部的一个领导干部身上。

这个老干部，一九四五年与本村四个贫农子弟一起参加了八路军，在战斗中负了伤，成了残废军人。解放初期王永幸在乡里当总支书记，他当乡文书，后来他当了村党支部书记。有人吹捧他说：“你是功臣啊！”他听了沾沾自喜，自己也以“功臣”自居，只要有请酒的，应声就到。整天盘算着到哪里去喝酒，阶级斗争，农业学大寨，就被扔到脑后去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范家的贫下中农造了他的反，他也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可是不久，他又犯了老毛病，喝酒的圈子越来越大：不光在本村喝，还到外村喝；不光在本大队喝，还到

外大队、外公社喝。酒杯一端，亲人、敌人都成了一家人，好话、坏话都成了知心话，这样，资本主义倾向就在眼皮子底下泛滥起来了。

在党总支扩大会议上，对这位干部进行了热情严肃的批评帮助。大家说：

“你过去为革命流过血，负过伤，那是你的光荣。可是，你却把它当成了资本。你不想想：你过去对革命作出的贡献，比起全党、全国人民在几十年革命中付出的代价，又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滴水！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能靠吃老本！要立新功，你却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你不觉得惭愧吗？”

“大寨的经验和咱下丁家大队的历史都告诉咱，任何时候都要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你不问阶级，乱吃乱喝，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都抛到九天云外。你这不是要领着群众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王永幸、张书勤也一次一次地找他谈话，启发他的阶级觉悟。老王对他说：“范家和你一起参军的四个人，都在战场上牺牲了。不知多少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才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今天，党把革命的重担放到你肩上，你却老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迈步子。你这样做，对得起谁？”

听了大家的批评，这个干部在会上痛哭流涕。为了表示他痛改前非，他说：“散会回到家，我就把酒瓶子扔到猪圈里！”

看到他有了悔改的表现，大家同意继续让他担任范家村

的党支部书记。

这次党总支扩大会议，批评了这个干部，也使广大干部、党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大家从范家村看到了：阶级斗争的弦松一松，资本主义就攻一攻。我们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特别是一个当干部的，如果在胜利之后，麻痹大意，就会认错“线”，走错“路”，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失。因此，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阶级斗争这个纲，永远丢不得！大家对照大寨找差距，还懂得了：过去在生产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可是比起大寨来，差距还很大，离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还很远。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骄傲自满的思想，永远要不得！

二

党总支扩大会议以后，下丁家大队的各级领导班子，更加生气勃勃。他们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大寨为榜样，坚持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他们抓住新形势下出现的带方向性的问题，发动干部群众，开展大辩论，让群众在辩论中自己教育自己，在斗争中分清是非，不断提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

这样的大辩论，接连进行了三次。

一九七〇年冬天，口子村的两个生产队，要在村南和尚岭上整造大寨田，这地方有七亩土层薄、石头多的山耩地，大大小小三十三块。开工以前，大家合计了一下，要把这一片地整成高产稳产田，需要三千五百多个工，三千多方石头。这时，有人觉得用这么多工和这么多石头，太不合算了，不如刨刨山坡，开上几亩荒，把已经打下的三千多方石头卖出去，每户可多分一些钱。有人算了个账：如果把这些石头卖掉，一方四元五，三千方就可以收入一万三千五百元，这样每户能分二百三十元！一小撮阶级敌人也乘机煽动说：“眼看到手的钱，可不能往地里埋啊！”

口子村党支部意识到：石头往哪里用，是整地增产，还是卖掉赚钱，这是阵线分明的两条道路斗争。他们带领干部、社员，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的教导，组织群众进行了一次大辩论。

一天晚上，口子村的场院上，灯火通明，社员大会开始了。“老铁人”吕明仁说：“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咱们治山治水是为了创社会主义大业，不搞建设光抓钱，那可是丢开社会主义大道走邪道啊！”

党支部书记老战说：“明仁老汉说得对，咱们正在深入开展学大寨运动，大搞治山治岭建造大寨田，把我们自己开凿出来的三千方石头用在这一基本建设上，是奔社会主义的百年大计，是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主张卖石头抓现钱的人，反对我们这样干，就跟当年咱开始艰苦创业时，有人鼓动咱

上黄县城开羊肉馆、卖包子一样，是把我们往资本主义邪道上拉。那时我们的回答是：‘宁搞石蛋蛋，不卖肉包子’！今天我们的回答是：卖石头赚钱，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坚决不干！”

共产党员老陈接着说：“咱可不能打个人主义的小算盘，只看到这一年每户能分二百多元，看不到把山岭薄地建成大寨田，一年多打一万多斤粮食，这对国家的贡献多大啊！”

这样辩论，使大家受到一次深刻实际的路线教育，深深感到：合算不合算，要从“线”上看，算盘珠要往社会主义方向上拨，决不能往资本主义道路上摆。如果光从钱上算，不从线上看，拨错了方向，必然走回头路，遭二茬罪。大家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狠批了资本主义倾向，决心要把这三千多方石头用在垒地堰上，要把这片岭地整治好。

决心下定，党支部书记老战带领社员苦战了一冬春，终于把这七亩“硬骨头地”啃了下来，小片连成了大片，陡坡变成了梯田，五道一百二十多米长、四米多高的大石坝巍然屹立在东岭上，使下丁家的山河更加壮观。

一九七一年有一次在检查生产的时候，发现有的队大片粮田里栽上了一排小果树。这件事引起了王永幸和大队党总支其他同志的注意，顺藤摸瓜，他们了解到，原来是有人认为：粮食收得吃不了，对国家贡献也不少，应该多在现金收入上打点主意了。于是他们算了一笔账：亩产千斤粮，价值百元；而一亩大梨一年收入三、四百元。粮、梨都是卖给国家，多栽些梨，少种几亩粮，集体和社员都能增加收入。在

这种思想指导下，梨树栽到了粮田里。

党总支及时地抓住了这个问题，认为这里面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帮助干部、社员端正方向，进行一次路线教育，党总支决定开展一次“树往哪里栽”的大辩论。

王永幸亲自到了这个生产队，他把干部和社员召集到了凤凰山下栽了果树的那片粮田里，指着那片梨树深切地说：“把这么多的梨树栽到粮田里，是执行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呢，还是走的资本主义邪路？”老王提的问题，引起了大家热烈地辩论。

有人说：“栽树收果，同种庄稼打粮食一样，也是卖给国家，为的是增加经济收入，怎么能说是走资本主义邪路呢？”

“老愚公”王万珍反驳说：“毛主席教导咱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我们就应该把好地用来种粮食，利用荒山发展果树。不顾毛主席教导，只顾赚钱，这是走的资本主义死胡同！”

一个小青年紧接着说：“按照国家计划种植，就是搞社会主义，不顾国家计划搞自由种植，就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必须彻底批判。”

大辩论越辩越激烈，道路越辩越明确。最后王永幸严肃地说：“同志们，粮田里种果树这件事打的是为集体的旗号，但是我们应当想一想，全国有成千上万个象我们这样的生产队，这成千上万个生产队只有服从国家计划，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统一指挥，统一步调，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啊！”

我们如果不顾国家的统筹安排，只看到自己这个小集体，怎样赚钱怎样干，那就实际上害了集体。有人说，‘只要为集体，咋干咋有理’，我们说，不对！要是干集体资本主义，是咋干咋没理！”通过这次辩论，大家心胸开阔了，眼光放远了，一致表示：一定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坚定不移地往前走，步步迈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认识提高以后，这个队的干部、社员，在王永幸的带领下，登上了山坡干了起来。他们硬是揭去了一层层的石头，掘上了一排排的大石窝，填上好土，把已经栽到粮田里的梨树，全部移到了荒山上。这样一来，既保证了粮田面积，又扩大了山上的果园。

一九七一年春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下丁家大队一个几十户的村子，有十几户同时提出盖新房。有人说：“集体生产发展了，社员生活提高了，盖房是好事，应当支持。”可是，生产队长算了一下，如果十几户一齐盖房，几十户跟着帮工，不光农田建设没人搞了，连当年生产也要受影响。进一步排队调查，发现有的社员并不是等房住，而是急着盖新房，套大院，图着院里多种点树和菜。一个新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人们眼前：生活好了，劲要往哪里使呢？

党总支意识到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学大寨运动就不能深入。党总支又一次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先盖房，还是先整地”的大辩论。

大家回忆了旧社会的血泪史，回顾了合作化以来下丁家大队的艰苦奋斗创业史，深深感到，在旧社会劳动人民拼命

挣扎着干一辈子，最后死无葬身之地，我们现在的生 活芝麻开花节节高，就是因为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这个革命的路程还长，更光辉的目标还远，我们如果停顿下来，人人热衷于经营自己的小家庭，那社会主义谁来搞呢？停顿就意味着倒退，倒退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有的贫下中农说：“大寨人先治坡，后治窝，创的是社会主义大业，我们有的人光想盖房，不想治坡，建的是个人主义的小家庭，这走的是两条道。艰苦奋斗，继续革命这是咱们的传家宝，丢了它，就偏离了方向走差了道，我们生活好了，劲更要使在社会主义的正道上。”这次辩论，使社员们正确地认识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在思想上又来了个新的飞跃。

通过这三次大辩论，下丁家贫下中农进一步认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大寨的经验，更加深入人心；大寨的红旗，在下丁家的山头，高高飘扬！

三

三次大辩论使下丁家贫下中农进一步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他们决心学习大寨贫下中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继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生产的战斗怎么打？他们决定：在以往整修“万古千秋田”的基础上，建造“人造小平原”。第一步，他们就大胆地

提出了在龙王湾造地的方案。

在龙王湾造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啥叫龙王湾？说的是，沐汶河由南向北，在下丁家村东一头撞在石头山上，被逼着掉头向西。汛期一来，浪激流漩，年久月深，就在这河流的转弯处留下了一个乱石成堆、草木难生的荒河滩。平时看去倒是个造田的好地脚，可是洪水实在是难以抵挡，解放前后，好几次有人试图在这里造块地，但出工费力造起来，一场洪水就把地冲得无影无踪。如今，人们依靠集体的力量要向龙王湾进军了。

这方案一公布，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映。广大贫下中农磨拳擦掌，争着要进龙王湾；一小撮阶级敌人却在背后里吹起了冷风，说什么：“在龙王湾造地，简直是山墙上挂帘子——没门！和龙王爷作对，绝没有好下场！”一些持保守思想的人也害怕投资大，投工多，不合算。

在动员大会上，下丁家村党支部书记老丁向大伙说：“龙王湾造地，这是我们革命深入发展的结果。单干时不敢想的，头几年不敢干的，现在，我们要干了。大干社会主义就是要这么一股劲头，要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就得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对！我们要向大寨人学习，舍得吃大苦，出大力，流大汗！只要有决心，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和怕苦怕难的懒汉懦夫世界观，大家都决心为根治龙王湾，造出稳产高产的大寨田而大干一场！

一九七一年一个隆冬的早晨，一百多名造地的英雄冒着凛烈的寒风，推着车，抬着筐，扛着锨，开进了龙王湾。

整个工地上，运土、压沙的队伍摆开了长蛇阵，车辆、担子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晚上，一排长长的灯火火龙一般，把整个龙王湾照得通明透亮。每天放了学的孩子们，也跑到工地上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工地上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就这样，经过了五十天的苦干就给整个龙王湾铺垫上了一层厚厚的泥土。

工程的第二个阶段，是沿泳汶河筑起一条长二十米、宽三米、高五米的大石坝，以防洪水冲毁新造的粮田。在寒冬季节里，大坝清基任务是最艰巨的。支部书记、副书记、民兵连长，率领青年突击队，打开冰层，跳进刺骨的冰水里，轮番突击，日夜苦战，坚持干了十七个昼夜，如期完成了清基任务，保证了垒坝工程的顺利进行。

在突击垒砌石坝的日子里，社员们中午在工地上吃饭。送到的热饭菜，刚端起就变得冰凉，可是大家吃起来觉得格外香甜。支部书记问大伙：“苦不苦，难不难？”社员们的回答是：“学习大寨造粮田，再苦再累也心甘，立下愚公移山志，誓叫荒滩变粮川！”有一个社员便带头唱起了《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一个唱段：“立下愚公移山志，能破万重困难关……”激越的旋律在山谷震荡。

在这次战斗中，那些被称为“铁姑娘”、“硬大嫂”的妇女们，干得也很出色。她们负责为垒石坝运送石料，扛起那百十斤重的石头腿不软，腰不弯。石头压肿了她们的肩膀，蹭

破了她们的手脚，没有一个吭声的。就是遇到三四百斤重的大石头，她们也千方百计把它抬起来。已是五十三岁的丁大娘和男同志一样跳进冰水里垒石坝，爬到山上扛石料，没黑没白，从不见她说个累，大伙都叫她“女愚公”。高中刚刚毕业回乡的一个女青年推车送石料，手上磨起了串串血泡，垒坝扛石压破了肩膀，可她决不下火线。垒坝用的七千五百多方石头中，就有一千五百多方是十六个妇女，连续苦干了两个多月，从北山上一块一块抬到工地上来的。

大坝就要完工了，可在延伸大坝西端的时候，又遇到了一道难关，在那里挖了一丈多深，仍挖不到石底层，而且越往下挖，河水涌得越猛，流沙也越多。人们称这个地方叫“龙王眼”。这里如果垒不好，汛期来到时，激流就会从这里打开缺口，卷走大坝，冲坏新造的土地。

党支部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抽调了二十多个精壮劳力，组成一支突击队，大战龙王眼。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天又下起了鹅毛大雪。为了使大坝尽快在这个险段合龙，支部正副书记和民兵连长甩掉鞋一齐带头跳入水中。岸上两台抽水机隆隆作响，岸下二三十名突击队员轮流作业。基槽刚挖好，就被流沙吞没，人们不气馁，挥镐重新挖。支部书记大声喊道：“就是一个虎口，咱们也要把它的牙拔净！”一面说着，转身搬起一块三百斤重的石头，压在龙眼上，大伙齐心协助，往上砌垒石块、二十多条硬汉子，象猛虎，赛蛟龙，越战越勇，越干越欢，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大坝终于胜利合龙了。

一块二十七亩的大寨田，终于造成了。原计划要两年完成的任务，现在只用了三个月就胜利完工了。第二年汛期时，只见那昔日龙王湾处，石坝之外，卷起排排白浪，石坝之内庄稼长得茂密旺盛。人们自豪地说：“学了大寨，就是有回天的力量！”

在建造山区小平原的同时，下丁家也开始了向高标准水利化进军，他们总结了山区水利建设的经验，开始闯新路子。过去他们是靠蓄天上水，现在要来一个蓄天上水和挖地下水相结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九七二年全大队十一口大口井在各个村相继动工了。

且说大吕家村经过勘测，决定要在村东山坡下打一个大口井。破土动工那天，北风呼号，六十七名男女社员投入了战斗，他们白天干，晚上也干，架起汽灯，通宵达旦，轮番作业。

这眼井，圆周六丈多，井底有几间房子大。人从井下往外担土运石，需要绕走五十多米长的盘道，名叫井，实际就是个大石塘。那沉睡了若干万年的花岗岩，无边无缝，打个百十锤，钎子就秃了顶，一天只能啃下半尺深左右。

凿到一丈多深，不见水；两丈多了，还是没有水。人们的心开始焦急了。

当凿到三丈多深时，突然一个惊喜的声音嚷开了：“水流……”²

见了水是一件大喜事，然而工程也更艰巨更复杂了。泉水昼夜不息地倾注在井底的低洼处，必须把水抽净，井下才

能继续作业。一天风大雪急，又赶上水泵出了故障，水越积越深，北风卷着雪花，呼啸着扑进井底，又打着漩儿往井口冲撞。文化大革命后被选进领导班子的年轻的党支部委员吕明毅，首当其冲下了井，另一个社员也跟着脱下棉衣跳进了冰冷的水里。他们用手把一块块乱石掏出来，把稀泥巴一捧捧抄出来，排除了水泵的故障，马达又开始了轰鸣。

困难接踵而来。当井打到了四丈深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井壁塌方，把正在盘道上运石头的一个社员的担杖齐斩斩地砸断了。虽然没伤着人，可是井壁的上半部几处出现裂痕，土块随时都可能塌下来。

在井上作业的同志，见此情景，都出了一身冷汗，十分焦急。

夜晚，大吕家村党支部研究排险方案。大家心怀一团火，议论纷纷。唯独吕明毅双眉紧锁，一声不吭。此刻他脑子里正在翻腾着电影《红旗渠》里的情景：英雄的林县人民，象山鹰一样飞吊在悬崖的半空开山凿石……。

他霍地站了起来，把吊空排险的设想讲了出来。党支部听了吕明毅的发言，高兴得一拍大腿说：“好哇！咱就这么干！”

第二天吕明毅带来了一根大粗绳，结好扣，一端拴在地面铁钎上，一端捆在自己的腰间。他头戴安全帽，手握钢撬杠，腰里别着一把小镢头，从容不迫地滑降到了几丈深的井半空。他两脚登住岩壁，将撬杠插入断裂的缝隙，用力掘剥伸悬出来的土石。孔缝越来越大，碎石块扑簌簌地散落着，在即将崩陷的一刹那，吕明毅从容地用双脚一登，象燕

子一样飞闪开来……。

险情排除了。工程又继续顺利进行了，大家信心越来越坚定，干劲越来越足。

经过两个多月的日夜奋战，一眼深二十米的大井打成了。紧接着就砌井壁。在水下砌井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井底下，几台抽水机不停地转动，泉水一个劲地往上涌。要是垒得慢，井壁就有被浸塌的危险。

工程在迅速进展，但就在砌到一半的时候，遇上了一场瓢泼大雨，井壁又出现了严重的塌方。井口由原来的六丈扩大到十丈，给施工带来了新的危险。但是一心创社会主义大业的干部和群众，根本没有把这些放在眼里。支书带头下到井里扛石头，砌石壁，社员们也都争先恐后下到井里干起来，当砌垒到离地面还有三米时，由于井口塌方过大，井壁外需要大量土石填充。全村社员都行动了起来，“铁姑娘”们翻山越岭搬石运土，小学生排着队扛石头，有的社员到外村办事，回来时还扛着几块大石头填上。

当隆隆的春雷催开满山梨花的时候，大吕家村的这眼大井经过广大社员的一冬一春艰苦奋战胜利建成了。那一井春水，象一颗绿色的宝石，镶嵌在锦绣山川之中，把下丁家的山水装点得更秀丽了。

和这眼井差不多一起动工的其他大口井也相继竣工了。这些井不仅记载了广大贫下中农学大寨人，走大寨路，艰苦创业的光辉历史，而且凝聚着下丁家人民的智慧和汗水，显示了他们继续革命的坚强决心。

战斗新篇

—

一九七四年三月，春风又染绿了下丁家的山山水水。果树的枝条上嫩芽竞吐，梯田里的麦苗墨绿葱茏。安放在水库、大口井、泳汶河边的抽水机，隆隆欢唱着，清澈的流水伴着人们的歌声流进了麦田。春天的下丁家到处是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白天劳动了一天的社员们，晚上又川流不息地涌进阶级教育展览馆。通明的电灯下，一件件血迹斑斑的破衣衫，一个个缺边少底的讨饭篮，把人们带回了凄风苦雨的过去；一张张色彩绚丽的远景规划图，又向人们展示着下丁家美好的明天。人们悲愤地讲述着解放前贫下中农的苦难生活，激动地回顾着下丁家大队二十年来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历史，愤怒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罪行！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新的战斗——批林批孔的战斗打响了！

早在一九七一年，林彪叛国投敌，自取灭亡的消息传来以后，下丁家贫下中农就满怀革命义愤对林彪进行了深刻批判。他们愤怒地说：“林彪一伙诬蔑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叫他们睁开眼看咱下丁家的变化！林彪一伙诬蔑农民缺吃少穿，叫他们看看咱贫下中农的幸福生活！林彪在《‘571工

程’纪要》中恶毒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让他们尝尝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批判，使贫下中农进一步认清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更加激发了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干劲。

现在党中央又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战斗号令，无数事实说明：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效法孔老二大搞“克己复礼”，把孔孟之道做为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只有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认清林彪一伙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才能挖出林彪思想的老根，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更好地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下丁家大队党总支带领贫下中农，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号召，立即投入了战斗。可是，战斗刚刚打响，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孔老二的黑话满篇之乎者也，许多人看不懂。这时就有人说：“批判孔孟之道，咱是老牛掉到枯井里，有劲使不上。要批就得有文化的人来批。”

大队党总支认为：这种说法不对！有文化固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条件，但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懂路线，识字不一定能识理。能不能批林批孔不是由文化决定的，而是由阶级立场和路线觉悟决定的。

为了解决批林批孔中的这一问题，总支发动群众想办法。

贫下中农纷纷议论开了。有的说：“孔孟之道别管有多少之乎者也，要害就是‘克己复礼’，林彪贩卖孔孟之道，也是为了‘克己复礼’，咱只要抓住了这个要害，就一定能够把孔老二、林彪批得顶风臭上八百里！”

有的说：“孔老二鼓吹‘克己复礼’，是为了复辟奴隶制；林彪把‘克己复礼’做为万事中最大的事，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搞复辟、搞倒退是他们共同的本质！咱只要抓住这个实质，就能把孔老二林彪的黑心肠一把拽出来！”

有的说：“咱再把旧社会贫下中农的苦难生活摆出来，把咱大队二十年来坚持前进、坚持革命取得的成绩亮出来，把阶级敌人妄想复辟变天的活动揭出来，来一个翻锅底，看看林彪鼓吹‘克己复礼’是安的什么心，代表的哪个阶级的利益。”

贫下中农的议论使总支受到很大启发，他们把群众的智慧总结成三句话，叫做“抓要害，批实质，翻锅底”，决定采用这个办法，广泛深入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首先批臭他们的反动政治纲领“克己复礼”。

为了批“克己复礼”，党总支组织起八十多人的理论队伍，使大批判有了骨干，又发动联中的师生和团总支举办了阶级教育展览馆。展览馆里用实物、泥塑、图画、图表展出了下丁家苦难的过去和贫下中农的家史，展出了解放后下丁家贫下中农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奋勇前进的战斗历程和取得的成绩，也展示出了下丁家大队的远景规划。晚上，各村的社员们纷纷来到这里，展览馆成了批林批孔的重要阵地。

大吕家村老贫农刘新春，已经七十多岁了。听说展览馆展出了他的家史，每天晚上他都拄着拐棍来到展览馆，给人们当讲解员。

一看到墙上那一幅幅心酸的图画，刘新春的眼里就涌满了泪水。

刘新春老家在招远。他四岁那年，地主夺走了全家仅有的一亩地，父亲便用两个篓子，一头挑着锅，一头挑着四岁的新春，领着刘新春的母亲和七岁的姐姐去逃荒。迢迢逃荒路，处处饥寒声。那时节，贫下中农哪有余粮剩米接济成群结队的逃荒人呢？刘新春一家只好沿着海边往东走。饿了就吃人家倒白菜窖时扔掉的白菜帮，渴了就从流向大海的小溪里捧一捧水。

在逃荒的路上，爹爹病倒了，差点送了命。

在逃荒的路上，姐姐卖掉了，一个七岁的孩子只换了一斗红高粱。

后来，在一个老贫农的帮助下，刘新春一家来到大吕家村，住在一个四面透风的碾棚里。

刘新春十四岁就给地主当长工，三十多岁才跟一个带着孩子逃荒来的妇女成了家。

不久，刘新春得了病，一连两个月下不了炕，全家喝了两个月的苦菜汤，一个个饿得皮包着骨头。刘新春抓住妻子的手，眼含热泪说：“孩子他妈，你领着孩子逃个活命吧！”

妻子也扑嗒扑嗒地直掉眼泪：“孩子他爹，要死咱死在一块儿！”

“孩子是咱穷人的指望，不能等着饿死！为了孩子，你们走吧！”刘新春从炕上挣扎着爬起来，把妻子送到了村北头。妻子领着孩子，迎着刺骨的北风走去，一步一声泪，一步一回头……

直到解放后，刘新春才又结了婚，过上了好日子。现在老两口成了队里的五保户，有吃有穿，住的是新瓦房，炕上是新被褥。村里的青年们争着给老两口挑水、扫院子，全村的青年人都是老人的孩子啊！

每当刘新春向人们讲述完自己的家史，总是拳头握得叭叭响，说：“旧社会那是穷人的地狱，我一想起来就咬断牙根恨断肠！新社会是咱们贫下中农的天堂，我眼里看着喜，



心里觉着甜，恨不得把黑夜当成白天，跟着毛主席往共产主义奔！可林彪这个大坏蛋反对革命，反对前进，口口声声叫嚷要‘克己复礼’，他要‘复’什么‘礼’？就是要让咱社会主义往后退，退到旧社会去，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去，让地主资本家再骑在咱们头上，让咱们再受地狱里的罪。林彪的心肠真比虎狼都狠，比蝎子都毒啊！”

刘新春老汉对旧社会的控诉，对林彪的批判，象四射的火星，在贫下中农中间点燃起熊熊烈火。每天当刘新春讲完自己的家史，人们就自然地在展览馆里开起了批判会：

“旧社会，咱大队象刘新春家这样卖儿卖女、家破人亡的真是数都数不过来啊：‘南山根，草大哥，吃猪食，干驴活。’这几句歌谣说的就是咱贫下中农的生活。如今，咱们成了国家的主人，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瓦房崭新，电灯明亮。这都是新社会给咱带来的，是毛主席给带来的。林彪却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要让那吃人的旧社会再回来，咱坚决不答应！”

“咱下了山过去是‘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一亩平，灾情年年多’。如今，‘看山山青，看地地平，沟沟有水，库库相连’。咱大队过去一亩地打不了一二百斤粮食，现在亩产到了一千四百多斤，这巨变是咱学大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革命，坚持前进的结果。林彪却把‘克己复礼’做为万事中最大的事，同孔老二一样，反对革命，反对前进，真是咱贫下中农的死对头！”

“孔老二为了‘克己复礼’，复辟奴隶制，叫嚷要‘兴灭国，

继绝世，举逸民”。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也叫嚷要对地富反坏右“一律实行政治上的解放”，真是两个和尚一个庙，两个喇叭一个调，两个时代一条道！”

一句句发言，一把把匕首，挖出了林彪一伙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黑心。

一声声批判，一颗颗炸弹，炸碎了林彪一伙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

一石激起千重浪。阶级教育展览馆里的批判，很快普及到四面八方。

大吕家村一个贫农社员，带领全家参观了阶级教育展览馆，参加了展览馆里的批判会以后，回到家里又向孩子讲述了自己小时候讨饭的历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出生的小儿子，听说爸爸十来岁那年就到几十里路外的地方讨饭，睁大了眼睛问：“爸爸，你到那么远的地方讨饭，是坐谁家的拖拉机去呀？”

听了孩子天真的问话，这个社员掉下了眼泪。妈妈对孩子说：“傻孩子，要是有拖拉机坐，就不去讨饭了！你爸爸长到十来岁没穿过一双囫囵鞋，三四十里山路，冰天雪地，都是赤着脚去讨饭呀！”

孩子听了，眼睛里泪花一闪一闪。

爸爸接着说：“在毛主席领导下，咱贫下中农过上了好日子，你和你哥哥你姐姐，都上了学。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就是要让你们和你爸爸小时候那样，再去过逃荒要饭的苦日子！”

孩子听了，两只小拳头紧握紧攥。从此，他和红小兵们一起，编儿歌，画漫画，成了批林批孔的小战士！

总支副书记陈天福的老伴朱桂兰参观了展览馆后，想起自己当童养媳的历史，恨不得一口气写出一篇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文章来。可是，自己从小没有上过一天学，过去在工作中学过的几个字远远不够用。朱桂兰白天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晚上就在政治夜校里使劲地学，学，学！夜校散了之后，回到家里，又坐到电灯底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写！有时一个字一个词拦住了路，朱桂兰就把上中学的女孩子叫醒，问一问，有时到了雄鸡三唱的时候，朱桂兰才放下笔。终于，朱桂兰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写出了五六篇批判文章，成了批林批孔的理论骨干。

二

正当批林批孔运动在下丁家大队形成汹涌澎湃的浪潮的时候，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搞“三箭齐发”，转移斗争大方向。这股阴风立时就刮到了下丁家。

一天夜里，有人偷偷地在贫下中农写的批林批孔大字报上盖上了几张破纸片，上面写着什么“王洪文指示”、“首长讲话”，内容除了煽动“乱、乱、乱”以外，还借机攻击下丁家大队党总支“用提高粮食产量掩盖路线斗争”等等。

到底是谁贩来的黑货？一查，是反革命分子陈天荣干的。这家伙拿着鸡毛当令箭，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扬言他“上头有人”，“下丁家要乱够！”蹦蹦跶跶要搞山头，成立什么“指挥部”。他以为抬出王洪文就会把党总支和贫下中农吓住了，真是错打了算盘！贫下中农对着这个反革命分子，手指着那几张写着昏话的纸片，一个个火冒三丈，一连串的斥责，象连珠炮一样发射出来：

“什么这个人的指示，那个人的指示，党中央的指示红彤彤的字，正大光明发下来，句句说的是贫下中农的心里话，你那些黑货从那个歪门邪道贩来的？”

“什么首长讲话，不批林，不批孔，乱搅和，明明是扶持四类分子上台的言论！”

大家越说气越大，操起铁锨，嚓、嚓！一阵猛铲，把个“首长讲话”铲得稀巴烂。在大队党总支的领导下，群众起来揪斗了煽阴风点鬼火的反革命分子陈天荣，一张张揭发他反革命的大字报，从村头直贴到他的家门口。

这时，刚从外地开会回来的王永幸，知道了有个所谓“首长讲话”，对这个“讲话”他一不听，二不传，三不办。就把总支委员召集起来，反复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联系这个所谓“首长讲话”，边学习，边对照。党中央的指示是照妖镜，照得这个“首长讲话”现了原形。

“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叫咱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这个‘讲话’为什么非要把大好形势搅乱不可？”

“毛主席叫咱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这个‘讲话’为什么竭

力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革命队伍？”

“毛主席叫咱抓革命，促生产，这个‘讲话’为什么处心积虑要煽动停工停产？”

一连串的问题明摆着，就是有人要和毛主席唱反调。党总支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针对着所谓“首长讲话”，一致通过了五条规定：

第一，组织群众深入学习党中央的指示，联系本大队斗争实际，深入批林批孔；

第二，干部带头，站在第一线，抓革命，促生产；

第三，任何人不准扔下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外出搞串连，偷着溜走的就是违犯纪律，回来要接受群众批评；

第四，对外来串连的，不打不骂，让贫下中农对他们耐心地教育帮助，动员他们回本单位，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搞好革命和生产。对少数不听劝说，到处煽动搞派性的人，给他接受贫下中农批评教育的机会，待他承认了错误，写出书面检查，马上放走；

第五，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就坚决打击。

五条决定在群众会上一宣布，广大干部群众人人拍手叫好，大家说：“这几条章程，符合毛主席的教导，照着毛主席指示的去干，不怕一时乌云翻！”

果然不出所料，没几天的功夫，阴风一阵紧似一阵，怪事一桩接着一桩。

有一天，从外面窜进几个人来，吵吵嚷嚷到处游说，什么“下丁家还得乱哪”，“不要为错误路线生产”哪，说得唾沫

星子乱飞。下丁家的干部，下丁家的社员谁也不离开工作岗位，倒是把这些人留下来，一个一个地批评教育。这当中有一个县城来的干部，社员们领他回村，没收了他的谣言传单，让他吃饱了饭，给他一条扁担，叫他和社员一起上山挑水栽地瓜。地头休息时，为他开了一个批评教育会，几个老贫农，耐心地跟他说道理。

这个说：“你身为国家干部，穿着工人织的布，吃着贫下中农种的粮食。不听毛主席的话，却到处跑着造谣言！你看看贫下中农是怎样闹革命的？你呀，就该在这里学一学什么叫抓革命，促生产！”

那个说：“毛主席要咱们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一肩挑。你说什么，你是抓革命的，俺是抓生产的。让你饿着肚子瞎张罗，看你能张罗几天！”

“你呀，认不清方向分不清路，盲人骑瞎马，走下去危险！”又一个人接上说。

这个干部经过了几天同劳动，同学习，提高了觉悟，承认了错误，向贫下中农写了书面检讨，悄悄走了。

过了几天，又传来个引人注意的消息，说是曲阜县的一个“名人”，亲自从北京的“首长”那里领了意旨，说“下丁家乱得不够”，要带着人马到下丁家来传达“首长指示”，让下丁家“乱起来”。消息传来，一小撮阶级敌人蠢蠢欲动，几个资产阶级派性缠身的人又喜形于色，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又气又急，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面对这妖雾横飞的形势，下丁家人胸有朝阳，坚信毛泽东

思想能战胜一切妖魔鬼怪。王永幸再次召开了总支委员会，他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咱下丁家的广大贫下中农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谁想来这里搞修正主义，我们坚决和他斗到底！”

他向大家说：“刘少奇推行‘桃园经验’，给咱下丁家扣过‘反对中央’的大帽子，咱们害怕过没有？”

“没有！”大家一个声。

“林彪搞‘打击一大片’的时候，咱下丁家被骂成是‘复辟的根子’，把咱们吓倒了没有？”

“没有！”大家齐声回答。

王永幸更坚定不移地说：“这就是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任何围攻，任何威吓，给他个横眉冷对斗到底！过去这样斗过来，现在照样斗下去！什么‘首长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统统是些昏话；什么‘名人’‘红人’，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到头来就会变成历史的罪人。”

一席话说得大家沉静下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决定了一个“迎接”“名人”的办法。他要来，由他来。来到下丁家，可就由不得他了。一不见他，二不管饭，他要胡言乱语，批判完了轰他滚蛋！

定了这个办法，人人心里痛快，想到“名人”到下丁家来将会大出洋相，大家忍不住哈哈大笑。这笑声中迸发着对反动潮流的轻蔑，这笑声中，回荡着革命者的锐不可挡的英雄气概！到底是邪不压正。下丁家党总支这个“迎接”方法一传出，那个“名人”知道一来就得碰壁，只是阵阵鼓噪，到底没

敢到下丁家来。他们要搞乱下丁家的阴谋，也象肥皂泡一样，很快地破产了。

三

排除了错误路线的干扰，下丁家的干部、社员更加英姿焕发，大家决心为革命种田作出更大成绩，以新的胜利回击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为毛主席争气。这种气壮山河的革命志气，变成了冲天的干劲，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着“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以更加雄伟的气势向前发展。

古历七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天热得象个大蒸笼，连山顶上也没有一丝风。玉米地里，一进去就是一身汗。人们正在干活，忽听前面玉米叶子哗啦哗啦地响，接着就是一阵凉风掠面而过，抬头一看，只见东南天上乌云滚滚，有经验的人知道，台风马上就要来临了。人们抓紧时间把地里的活干完，还没走出地边，越来越强的台风就把人们的草帽刮跑了，紧接着就是铜钱大的雨点劈头盖脸地打来。

狂风暴雨把山坡上的庄稼整整折腾了一夜。天一蒙蒙亮，人们不约而同地上了坡，只见满坡的玉米，被刮得东倒西歪，有的被水冲得露出了肥嫩的白根，人们真是心疼啊！

下丁家贫下中农从来没有被困难吓倒过。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把玉米一棵一棵地扶起来，并用土把玉米根全部培了一遍。在人们的辛勤管理下，只过了半个月，玉米就窜出了一人多高，玉米棒也拉得足有一尺多长。人们心

里的那股高兴劲儿真是没法再说了。

八月初头的一天早上，如烟似雾的曙光笼罩着山头。当太阳的第一束光辉射上凤凰山顶，迷蒙的烟雾逐渐隐退的时候，人们忽然看到东南天上象一口大锅倒扣下一样，黑乎乎地直向凤凰山压来。暴风雨又要来到了！

行动快的刚下山，行动慢的刚出地，大雨就象瓢泼似地倒下来。八级的台风，象脱缰的野马一样，呼呼地奔驰着。刹时间，风裹着雨，雨绞着风，恨不得把山川、田野一口吞下去。梯田里的水开锅似地暴跳着，山坡上不时传来梯田石堰的倒塌声。

第二天，风停了，雨住了，只见玉米比上次倒得更厉害，有些地方的地堰倒的倒，塌的塌，靠近地堰的玉米，连砸带埋全没了。

人们刚刚战胜了第一次台风，又来了第二次，对人们的打击真不小啊！个别人说：“十几天前，咱扶玉米扶了好几天，老天吹口气就把咱好几天的成绩吹没了。今年咱下丁家命里注定该倒霉！”“老天叫你收八升，你就别想收一斗啊！”

是命里注定要倒霉吗？二十多年来，下丁家贫下中农不信天命干革命，硬是改变了穷山恶水的面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了“天命论”的贫下中农，更不会相信“天命”的鬼话了！暴风雨过后，干活之前，人们又在地头上批判了“天命论”。

有的说：“孔老二宣扬‘天命论’，说什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目的是让劳动人民听天由命，不反抗不斗争，俯首

贴耳受宰割，咱不信那一套。”

有的说：“下丁家解放前山穷水恶，现在是山青水秀。咱贫下中农过去受苦受难，现在当家作主。是咱过去命不好，现在命又好了吗？不，这是咱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斗出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就是能胜天！”

有的说：“大寨大队一九六三年的水灾比咱们眼下的灾情大多了，人家发扬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硬是战胜了天灾，夺取了大丰收，咱要向大寨贫下中农学习，就是再刮一次台风，也要把天灾踩到脚底下！”

对“天命论”的批判，使贫下中农的劲头鼓得足足的，会一散，人们就扶玉米的扶玉米，垒地堰的垒地堰，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人们把玉米从地上一棵棵扶起来，然后用水把叶子上的泥沙洗净。有些叶子和烂泥沾在一起，拉也拉不动，就用剪子把埋在泥里的部分剪掉，把露出地皮的玉米根培好。人们迎着困难上，全大队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把玉米全扶了起来，很快又把倒塌的地堰全部修好了。

秋天，玉米丰收了。虽然两次遭到台风袭击，全年亩产仍然达到了一千三百七十斤。

大丰收并没有使下丁家大队贫下中农在前进的道路上停顿下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了“克己复礼”，批判了儒家反动没落的世界观，他们深刻认识到：历史上一切反动派都是主张复辟，主张倒退的。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要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必须大破因循守旧、懒汉懦夫的世界观，坚持永远革命，永远前进。大家说：任何成绩只能是

继续革命的新起点，革命路上永远没有终点站！

初冬的一天，下丁家大队党总支在泳汶河滩上召开了“战山河誓师大会”。一千多人齐上阵，十五项工程齐上马，村村有战场，队队打攻坚战，一个规模空前的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掀起来了。

胶东半岛的冬天，冰天雪地。十五项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却是热气腾腾。白天，南山、北岭，西耩、东坡，不时地腾起一道道烟柱，响起一阵阵开山炸石的炮声；夜里，从圈子村到大吕家村，六七里的泳汶河滩里，从北夼的深涧到大吕家村的西山，一片又一片灯火。灯光下，无数的钢镢在飞舞，无数的小车在飞跑。

在县办的北邢家水库的岸边，一座大型的扬水站动工了。下丁家贫下中农决心翻两座山，过一条沟，凿石劈山修四华里长的环山渠，把北邢家水库里的水扬进口子水库，这样，大旱之年，口子水库也可以有新水源。

扬水站一开工就遇上了硬仗。四华里长的暗管明渠，全开在花岗岩地带，几十盘钎子叮叮当当打眼放炮，干的全是硬活计。在工地上担任指挥的大队党总支副书记张秉义，和社员一起掌钎抡锤打突击。有一天，他正掌钎，一个偏锤擦到他的手上，大拇指指甲被打掉了。十指连心痛，当时只见他额头上滚下豆大的汗珠来，可这条硬汉子，不叫苦，不说痛，包扎一下，怎么也不肯离开工地。伤痛折磨得他好几天睡不着觉，可是，天不亮，他又出现在工地上。

在干部的带动下，工地上人人敢打，个个敢拼。在突击

砌渠的日子里，工地上十个石匠，一连二十几天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天天搬砌棱角锋利的花岗岩石，大家的手都磨得渗血珠，没有一个人退缩。社员们感动地说：“这真是钢筋铁骨石匠班！”

再说在大吕家村西，三个生产队联合铺开填湾造地的工程。这里原来是一个夏天水汪汪，冬天白茫茫的死水塘，群众叫它蛤蟆湾。填平了这个湾可以造成四十亩连片的小平原。可是，要填这个湾，要从一里以外推十六万四千车沙土，要跑五十二万八千里路，困难确实不少。困难算得了什么，一百一十个社员迎着困难上阵来了，他们豪迈地说：“跑万里路，推万车土，造个万里万车的小平原，庆祝批林批孔的伟大胜利。”工地上道路成网，车如穿梭，社员们起早贪黑越干越热火。十六生产队长全家人一齐上工地打突击，正闹得热火朝天，不料女婿探亲到了家门。他回家对女婿说：“工地上火炮连天，坐在家里说啥，要我说，咱干脆破了孔孟之道的旧规矩，你跟俺一块上工地，我看这么探亲有意义！”女婿跟上他，到了工地就抢重活干，正在干活的人个个叫好，大干的热潮更轰动起来。

圈子村南泳汶河畔，别是一番壮观的景象。这里原是洪水横行的地方，过去计划几个村联合在这里垒坝造田，估量了几次都没敢干。这一次，圈子一个村一百四十名社员，决心要在这里干一番。这一项工程，造地二十亩，要垒一条一千零六十米长、三米宽、五米高的护田大坝，要从一里以外的山坡上运来客土垫地。最艰巨的任务还是大坝清基。社员

们在五米深的基槽里踏着冰水日夜突击。圈子村党支部委员王永胜，年过半百志不衰，在大坝清基的日子里，他胳膊窝里生疮，可他瞒着大家领先下水苦干，直到后来，胳膊肿得抬不起来了，吊着一只胳膊他还是出工抬石头。

一九七四年冬天的下丁家，到处都是火热的战场，到处都有紧张的战斗。在下丁家接待站大楼的坝基上，不知谁刷下了一幅大标语：“人民公社无冬天，地冻三尺战犹酣，孔孟之道脚下踩，当代愚公能胜天！”二十八个斗大的红字，生动地描摹出了贫下中农战山河的壮丽情景，表达了他们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

经过一冬一春大干，到一九七五年春天，十五项工程项项提前完工，有的队还铺开了新工程。

到了夏季，他们战胜严重自然灾害，夺得了小麦大丰收，亩产比上一年增加二百多斤，达到八百一十九斤，一季跨过了“长江”。社员们高兴地说：“这真是批林批孔结硕果，战天斗地创新篇。”

勇 攀 高 峰

—

一九七五年春天，正当下丁家大队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阔步前进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王永幸学习着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节录，心情万分激动。回想下丁家二十多年来的作战历史，劈开了多少拦路的荆棘，踏平了多少惊涛骇浪，哪一步不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指引？解放初期，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发展富农经济”，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那时，刚刚从部队复员回乡的王永幸，一遍又一遍学习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的伟大教导。是毛主席的话，鼓舞他带领贫下中农，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一九五七年，在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掩护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发起了猖狂进攻，农村的地主、富农煽动闹粮、闹社的时候，是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光辉著作，使王永幸和阳光社党总支的成员，透过“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迷雾，看清了阶级斗争并没

有熄灭。一九六一年，刘少奇一伙大刮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又是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指示，使他们识破了“三自一包”的反动实质。在刘少奇推行假四清、真复辟的“桃园经验”的时候，他反复学习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回顾解放后经历的种种斗争，懂得了隐藏在党中央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一直推行着一条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家伙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毛主席一系列光辉指示的指引下，下丁家贫下中农同全国人民一起，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二十多年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象一盏灿烂的明灯，引导着他们的思想从一个高坡登上另一个高坡，使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一步一步有了越来越明确的认识。

在党总支会议上，王永幸对大家说：“咱下丁家大队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现在，毛主席又向我们发出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我们一定要认真学好，让我们的思想登上一个新的高度！”

党总支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都和王永幸有同样的体会，他们纷纷订出了学习计划，下定决心，坚持不懈，认真研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一些识字不多的老同志，也立志攻破文化关，攀登理论山。

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使全国知道”的教导，党总支又深入发动群众，使广大贫下中农，都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但有的人说：“上边管‘线’，下边管干。咱庄稼人又不当理论

家，学得再好能派啥用场？”也有的说：“咱贫下中农阶级感情深，早就认定了社会主义这条路。不学理论，也下不了道！”

这种说法对吗？广大贫下中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一天，圈子村的社员在山上劳动。理论辅导员指着山上的梨树对一个中年社员说：“一九七一年咱大队开展‘梨树往哪里栽’的大辩论以前，咱村的一些梨树栽到了粮田里。栽树时，你去了没有？”

“队里干活，我哪能不去？”中年社员答。

“把梨树栽到粮田里，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那时可不该去栽树！”理论辅导员严肃地说。

中年社员一听，急了：“你这伙计，说话倒轻巧！我那时哪能知道这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

“是啊！你说是上边管‘线’，下边管干，学不学理论没关系。你看看，上边不光有走资派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咱在下边干活，也有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光管干，不管‘线’，哪能行？如果不学理论，分不清什么是革命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想管‘线’也管不了。学理论不是没啥用场，而是大有用场啊！”

理论辅导员的话，使这个中年社员开了窍。在场的社员也从这浅显的例子上看到了学习理论的重要性。

一天晚上，一个女青年到了她的大爷家里。女青年张口问她大爷说：“大爷，您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

大爷正在吃饭，一听这话，气得胡子一撅一撅的，说：“你这是问的什么话？社会主义道路是毛主席给咱指出 来的幸福路，我怎能放着社会主义道路不走，去走那资本主义 的死路呢？”

“听说一九六一年工作组在咱村推行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搞山岚下放那阵儿，您曾表示愿意把山岚分开。分了山岚，那可是走的资本主义道路啊！”

大爷沉痛地说：“那阵儿，我也觉得分山岚不对 劲。可是又一想，工作组是上级派来的，还能指着火坑让咱跳吗？幸亏王永幸、张书勤和贫下中农顶了他们，不然，我那时就糊里糊涂地把山岚领来了！”

“大爷，您不是说贫下中农认定了社会主义道 路，不学理论也掉不了道吗？您看，如果只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不学习革命理论，就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 义道路。当走资派往资本主义道上引咱时，看不透，也会跟着走啊！”

大爷一听，心里明白了，笑呵呵地说：“好闺女，你 说得对，这革命理论是得好好学！”

通过深入地分析讨论，广大群众提高了认识，全大队很快出现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大队党总支为了使广大贫下中农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全大队培训了一百三十多名理论学习骨干，进一步办好九处政治夜校，有一千二百多人在夜校学习。不能进夜校学习的老人和孩子多的妇女，举办了联户学习班和炕头学习组。

党总支的成员争做带头学习的模范，他们除和群众一起参加政治夜校学习外，每月还集中学习两天，请辅导员辅导，交流学习体会。王永幸更是如饥似渴，每天工作再忙，身体再累，一有空就掏出书本学起来。

在干部的带动下，广大贫下中农也学得热火朝天。小陈家村女社员赵丽荣，负责组织、辅导几个联户学习班和炕头学习组的理论学习。丽荣眼睛近视，山村的路又崎岖不平，晚上学习完回家时，经常跌破手脚。她爱人说：“你眼力不好，还去学个啥劲呀？”丽荣说：“在坎坷不平的路上走路，眼睛近视就会跌跤子。革命的道路更加坎坷，如果政治上近视，可要摔大跟头啊！”她爱人提高了认识，每天晚上自己在政治夜校学习完后，就挑个灯笼，去接丽荣。

一九七五年春天的下丁家，到处是动人的学习景象。和煦的春风撒下了点点春雨，滋润着田里的禾苗伸枝展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是落在人们心头的红雨，哺育着共产主义思想茁壮成长。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下丁家大队党总支和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着力搞清楚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什么要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问题一提出来，各处政治夜校、炕头学习组都进行了热烈的学习、讨论。

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他们的

反抗，由于自己被推翻而“凶猛十倍”。回想下丁家大队阶级斗争的历史，不正象列宁所说的那样吗？解放以后，原来骑在贫下中农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富农虽然被打倒了，但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时刻刻都在梦想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合作化时期，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合作化运动。一九五七年，他们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相呼应，妄图搞垮合作社。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同刘少奇相配合，大刮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要砍倒下了丁家这面农业学大寨的红旗。直到最近，有一个阶级敌人还在群众中宣扬：干一天活，就是为了一“竖”，一个“圈”（即十分工），散布剥削阶级的思想毒素。学习列宁的教导，回顾本大队阶级斗争的历史，贫下中农纷纷说：“那些被推翻的阶级敌人，就象水皮上的鸭子，表面上安安稳稳，实际上那两只黑爪子在水底下拨弄得紧着呢！”

贫下中农还看到，要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仅因为老牌的阶级敌人时时刻刻图谋复辟，更重要的，还因为“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党内还会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贫下中农说：“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藏在社会主义大树里的蛀虫，是长在我们身上的毒疮，比公开的阶级敌人，更危险！”

为了引导大家认识这个问题，大队党总支和贫下中农一起对圈子村党支部的一个主要负责人蜕化变质的事实进行了

分析。

这个党支部的主要负责人合作化时曾经是积极分子，被人们称为“革命闯将”。

一九六二年，这个人当了生产队长。有了职，有了权，阶级敌人便象找着缝子下蛆的苍蝇那样，不断地对他拉拢腐蚀。见了他，有的把大拇指一伸，赞扬说：“甘罗十二岁当上卿，你是二十多岁当队长，真是年轻有为呀！”

这个干部犯了错误，受到党组织的批评，有的阶级敌人假装表示“同情”，说：“官高必险，树大招风，历来都是如此。你，可得有防人之心啊！”

不久，这个干部当了党总支委员、村支部书记。职位越来越高了，阶级敌人对他的拉拢腐蚀进行得也越来越紧了。有的三天两头把他叫到家里，吆三喝六，吃酒划拳。这个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和一个阶级敌人，好得就象“两个身子一个头”。

这个干部的所作所为，党总支再三提请他注意，可他都当作耳旁风过去了。

在阶级敌人的腐蚀拉拢下，这个干部处处维护阶级敌人的利益，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有一个阶级敌人对他说：“我那小儿子，你要拉他一把。”这个干部便把大腿一拍，拿出旧社会那种江湖弟兄的腔调，说：“你放心，有我干的，就有他干的！”并且不顾贫下中农的反对，把这个人安排到一个生产队担任会计。有一个被开除党籍、政籍并被人民政府依法拘留过的坏分子，浇地时只浇两头不浇中间，

施肥时，把肥料倒进沟里。群众纷纷要求批判这个坏分子的破坏行为。这个干部不但对群众的要求置之不理，反而在大会上表扬这个坏分子“劳动积极”，怂恿他继续破坏集体经济。

这个干部对阶级敌人言听计从，而在群众面前却摆出一个官老爷的架子，横眉竖眼。自他当干部以来，被他打过的社员就有二十多人。

他在政治上当了“官”，在经济上也想发财。他不但利用职权安排自己的亲属干那些既轻快又多挣分的活儿，而且带头去搞投机倒把活动。

为了掩盖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这个干部大搞阴谋诡计，不择手段地分裂党的组织，并且玩弄两面派的手法。当党组织发动群众批判阶级敌人的罪行时，他在大会上发言厉声厉色，甚至动手拳打脚踢。但是一散会，他又跑到阶级敌人的家里赔礼道歉，一个桌喝酒。当党组织发现他的严重错误找他谈话时，他两眼一立楞，蛮横地说：“那些事我都没有做，把脑袋上打个眼我也不会承认！”

随着政治上的变质，这个干部在生活作风上也堕落了。他生活糜烂，道德败坏，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这个干部蜕化变质的事实，擦亮了广大群众的眼睛。他们说：“早在解放前夕，毛主席就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咱大队大多数干部，都能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努力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经过文化大革命，

他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更加自觉了。可是总有一些人，要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下蜕化变质。虽然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仍然会有这种情况。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咱可不能看不到这一点呀！”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理论，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现实，使贫下中农深刻认识到：只要社会上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只要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只要还会出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必须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二

一九七五年，是下丁家大队贫下中农大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年，也是大干社会主义的一年，大队大干促大变，这一年粮食亩产达到了一千六百七十斤，实现了“双过江”，创造了历史上的新纪录。

正当他们庆祝一九七五年大丰收的时候，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胜利闭幕了。他们认真学习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的《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为了认真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大队党总支带领群众，制订了革命和生产的新规划，决心奋战一九七六年，争取更大胜利。

不料，前进的路上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了艰难险阻，下丁家人又面临着新的考验。

按照华国锋同志报告中的精神，大队党总支开展了整风活动。全大队并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农田基本建设，大吕家村的风凌口，下丁家村的龙王顶，大陈家村的西阜山，圈子村的柳沟夼，纷纷铺开了建造山区小平原的工程，也就在这时，什么“整顿就是复辟”，什么“唯生产力论”等奇谈怪论相继袭来。

这接二连三的怪现象，引起下丁家党总支一系列的联想：为什么报纸上“农业学大寨”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不常出现了？为什么宣传大寨根本经验的报道没有了？为什么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根本不提了……？

大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树起来的一面红旗，下丁家在开展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曾经六次到大寨，大寨的同志也曾多次到下丁家传经送宝。大寨人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寨人一心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寨人拚上命大干社会主义，这一切，下丁家人都看在眼里，刻在心头。大寨是毛主席亲手树立的一面红旗，大寨的道路，是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道路，学大寨没有错。不管前进路上有多大艰险，就是要沿着大寨道路走到底！

在严峻的斗争中，下丁家人想念大寨人。在复杂的斗争中，下丁家人更迫切需要大寨的根本经验。下丁家人有一条规矩：“路线是非不明白，登门请教学大寨。”

一九七六年八月，党总支开会毅然决定：第七次上大寨学习。他们说：“越是有人反大寨，越是报纸上不提大寨，我们越是要学大寨，上大寨。”这次上大寨，人数比前六次

都多。

一九七六年的八月十六日，“四人帮”不准宣传大寨的妖风正紧，下了丁家二十三人组成的赴大寨学习队出发了。

下丁家的贫下中农热爱英雄的大寨人，下丁家的贫下中农和大寨人心连心。听说派人上大寨，社员群众纷纷前来送行。

老贫农们嘱咐：“到了大寨，代表俺向大寨人问好，告诉大寨人，大寨的红旗全中国的贫下中农一齐擎！”

小伙子们叮咛：“早去早回，取了大寨的经，回来领着我们抓阶级斗争！”

虎头山下，战友重逢，真是阶级情深心贴心，同仇敌忾分外亲。郭凤莲、贾来恒等同志，亲自接待了来自下丁家的客人。郭凤莲亲切地问候下丁家的贫下中农好，还说，很想再去下丁家看看。张书勤代表三千下丁家人坚定地表示：“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过去学大寨，现在学大寨，将来还是学大寨！”

下丁家人上虎头山，进狼窝掌，认真地学习。在大寨七天，大家亲眼看到，英雄的大寨人，在种种压力面前，在自然灾害面前，不信邪，不怕压，照样大批资本主义，照样大批修正主义，照样大干社会主义，充满着胜利的信心。下丁家来的同志，人人被这种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所感动，个个心头燃起了熊熊的火焰。

临别的时候，大寨人语重心长地告诉下了丁家战友：“既要大讲革命，又要大干革命，只讲不干不是真革命。”“既要大

讲社会主义，又要大干社会主义，只讲不干，也不是真搞社会主义。”这虽是大寨人说过多少遍的话，但是，此时此刻，在风云变幻的时候，在斗争严峻的关头，下丁家人听得出来，话里还有话，字字千斤重啊！他们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大寨人把自己当亲人，他们坚信自己学大寨没走样，坚信大干社会主义没有错！

几个老同志，满把攥着虎头山上的土，深情地抚摸，他们要把大寨的肥沃土壤带回去，把学大寨的根再深扎一层。

几个年轻的同志，急骤挥笔，把大寨人的话记在本子上，在自己的心里深深地埋下了大寨人坚持斗争的火种。

从大寨回来，大家心里踏实，方向明确，干劲十足。对照大寨的经验，联系下丁家的斗争，总支会上，一条一条明辨是非，作出了决议。

党总支整风，揭露问题，批评范家村党支部书记，能不能说这样的整顿叫做“复辟”？

“不能！”

这个问题一提，人人心中有气。

这个说：“范家村出现了资本主义倾向，难道不应该斗争吗？！”

那个说：“范家村党支部书记中了修正主义的毒，屡教不改，难道不应当批吗？！”

“什么‘整顿就是复辟’，明明是喊着‘反复辟’口号，干着真复辟的勾当！”

大家一致决议：总支的整风要继续进行，范家村党支部

书记的问题要解决彻底。不管谁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都要象大寨那样，和这种错误的东西斗到底！

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能不能说是“唯生产力论”？

提起这件事，大家的感情更难压抑。

“这是什么歪歪理！难道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才算革命吗？”

“咱们大干社会主义，他们骂咱是‘唯生产力论’，就该让他们喝西北风！”

“不能听见兔子叫就不种豆子。不管它怎么叫，咱们就是象大寨那样，坚持大干社会主义！”

下一步干什么？这几年革命和生产的发展给下丁家提出了新的任务。

种地，过去一季一亩地施肥只有几千斤，现在亩施万斤肥、双万斤肥；打粮，过去一亩地几百斤、千把斤，现在一千八、九百斤，粮多了柴草也多；水果，过去年产几十万斤，现在年产三、四百万斤。送粪上山，运粮草，水果下山，成了大难题。下丁家是出名的山高坡陡，山上无路靠肩挑，一个社员挑上挑下，一年之内肩上要过十几万斤，可还是忙不过来。要再增产，要办更多的事业，要对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非解决山区的交通问题不可，人人朝思夜盼，就是要修一条环山公路。

一个修建环山公路的方案制订出来了。

凤凰山上，号旗飞舞，新建环山公路的测量工作开始了！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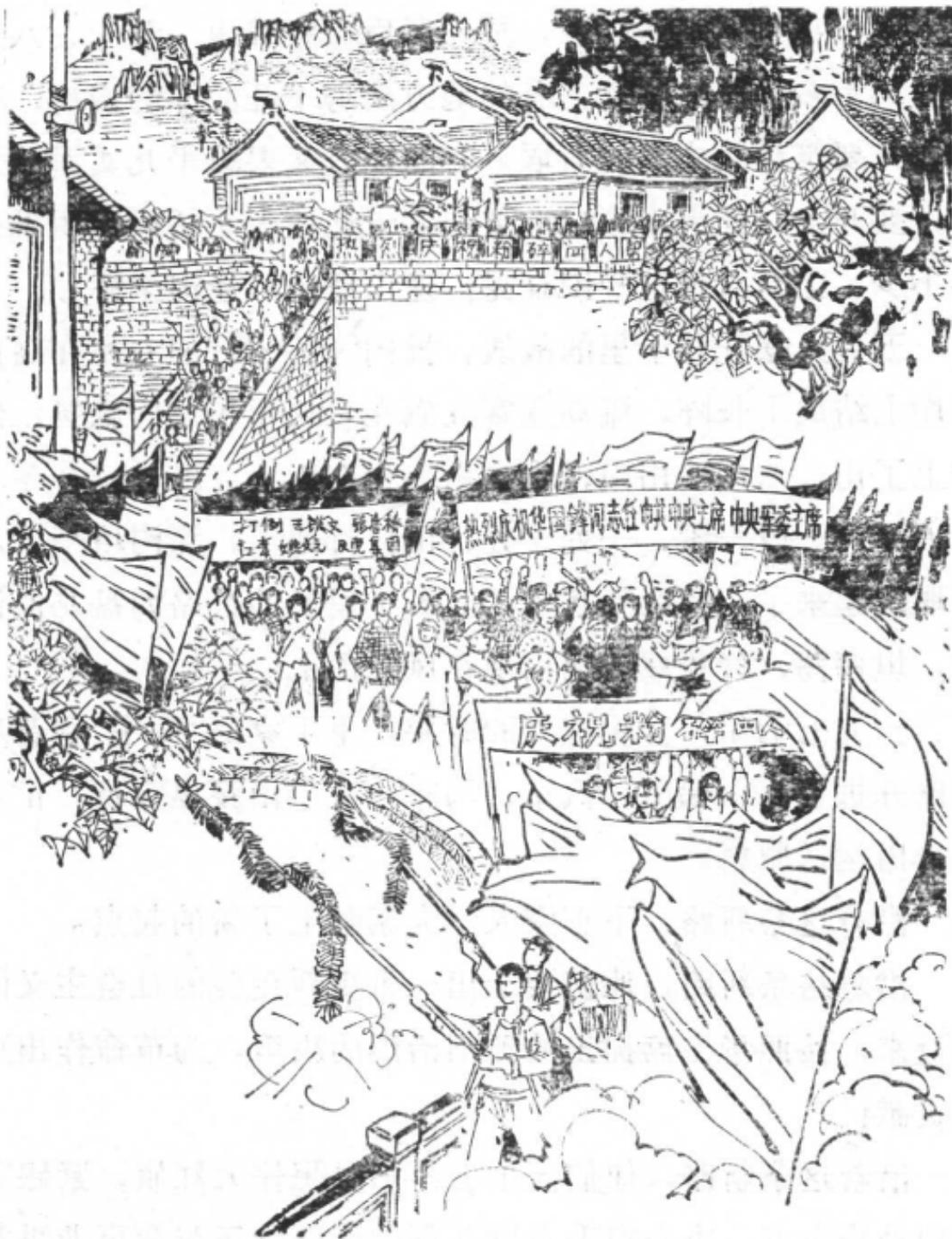
一九七六年的十月，是下丁家终生难忘的岁月啊。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果断地采取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

欢庆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欢庆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泳汶河高歌，凤凰山起舞，鞭炮锣鼓通宵达旦，歌声笑声，激荡在山谷。

毛主席逝世后一度压在人们心头的沉重的忧虑，被十月的风吹散，大快人心的日子到了，好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

十一月十二日，在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步步深入的时候，五百名筑路大军登上凤凰山，隆隆的炮声报道：下丁家三十多华里长的环山公路动工了。

筑路工程开工不久，下丁家的带头人王永幸出席了华主席批准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并且光荣地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两次见到了英明领袖华主席，亲自聆听了华主席的讲话。华主席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华主席把毛主席亲手树立的大寨红旗更高地举起来，华主席亲自率领我们学大寨。这一切使得王永幸精神倍增，心潮澎湃。还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他就给在家的同志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从北京回来，他冒着风雪，奔上工地，给社员讲述见到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幸福情景，传达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



会议的精神。喜讯传开，群情振奋。跟着华主席继续走长征路，使下丁家在学大寨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这一项新的筑路工程，要在凤凰山腰辟出一条七、八米宽，三十多里长的路基，有的地方要劈下几丈深的岩崖，有的地方要筑起几丈高的石堰，有的地方又要填平几丈深的大沟，要开上百处大小山口，要架六十几座大小桥梁。困难确实不少。怎么对付这些困难呢？逢山劈山，逢沟架桥。

五百人摆开几十里的战线，批判“四人帮”的专栏在高山陡崖上结成了长阵，流动竞赛红旗在青松翠柏之间飘扬，红炉上了山，炊烟遍山岗，吃在山上干在山上。经过一个冬春的大干，一段一段，一处一处，山口打通了，深沟填平了，高堰筑起来了，桥梁架起来了。三十里长的公路如盘龙似银蛇，坦荡荡，气势威威地出现在凤凰山上。

一九七七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下丁家的“铁牛”顺着环山路开进了高山梯田，汽车、马车，在半山腰里穿行，忙着为春田运送肥料。

沿着这条新路，下丁家人学大寨踏上了新的起点。

沿着这条新路，他们要干出一番更新更美的社会主义的事业来，按照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决策，为革命作出更大贡献！

沿着这条新路，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决心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